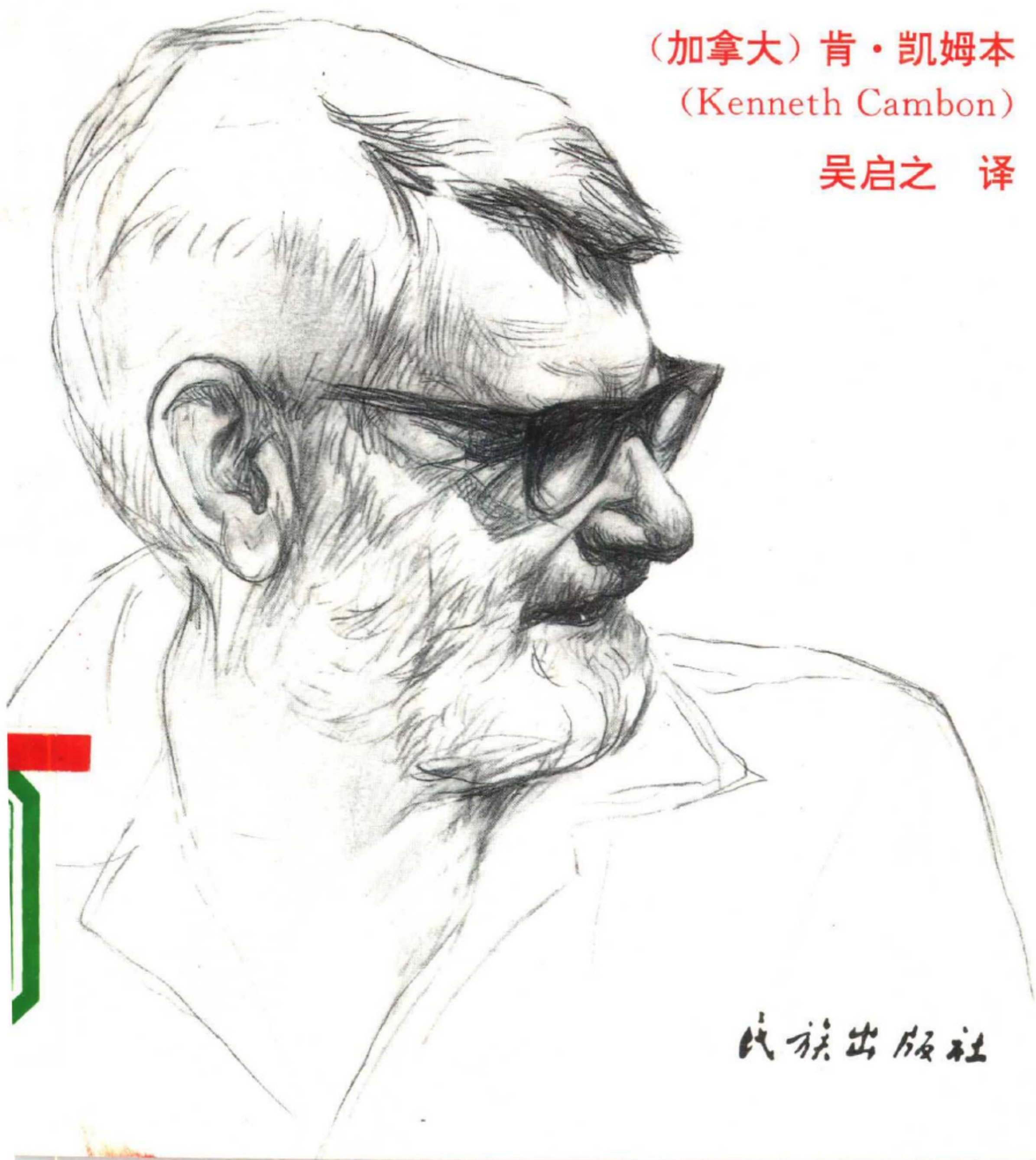


天皇之客

香港沦陷与加拿大战俘

(加拿大) 肯·凯姆本
(Kenneth Cambon)

吴启之 译



民族出版社

天皇 之 客

(加拿大) 肯·凯姆本
(Kenneth Carbon)

吴启之 译

民族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4 号

本书根据加拿大 PW 出版社 1990 年版本翻译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皇之客/(加拿大)肯·凯姆本(Cambon, k.)著;
吴启之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书名原文:Guest of Hirohito

ISBN 7-105-02301-5

I.天… II.①肯… ②吴… III.纪实文学-加拿大-现代 IV.I71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8401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5 号 邮编 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中央民族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5.75 字数:16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定价:7.20 元



作者前言

对我来说，写这本书既是一次冒险又是一剂泻药，称之为冒险，是因为以前我从未涉足于此；作为泻药，它尽管像许多其它的药一样，来之迟迟，但仍对我大有补益。

我应该感谢许多老战友和那些不胜列举的朋友们，他们鼓励我的写作，并给我以各种帮助。尤其值得感谢的是雷诺·赫德先生和《加拿大皇家步兵》一书的编委会，他们允许我复制香港战役各个阶段的地图，他们的著作为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各种统计资料，被遗忘的姓名和一些被我搞错或曲解了的数字。当然，本书的任何错误都应由我个人负责。

我的两个朋友——在美国三藩市、墨西哥曼萨尼约市的海诺出版社工作的豪和色·拉森为本书设计了美观大方的封面。

现住北爱尔兰，霍利伍德郡唐县的威廉姆·斯特沃特少将为此书提供了在日本新泻时的照片和他当时的部分日记。这些第一手材料记录了他作为医生在新泻 5B 战俘营的某些经历。

我的姐姐诺伊·艾·凯姆本校读了此书的手稿，我在战俘营时的难友简·索利克核对了书中的史实，纠正了语法错误。手稿中许多蹩脚的语句，在他们的手中变得通顺畅达，一些肖伯纳式的拼写，在他们的手中重返规范。只有那固执己见的个性特征仍残留在字里行间。

特别值得感谢的是，我的朋友奥斯卡·奥尔中校，作为审判

日本战争罪行的加拿大代表，他允许我使用战犯供词的副本，作为本书正文之后的附录。

我的妻子艾琳和我的两个女儿，诺伊和玛俐，对我的写作始终给予理解和支持。在我学习如何操纵键盘，如何驾驭那桀骜不驯的文字处理机的战斗中，她们的鼓励使我克终此事。

最后，我还要感谢温哥华印刷厂的休·克尔女士，由于她耐心细致的工作这本书才得以问世。如果发生了小小的奇迹，这本书的出版会有所赢利，那么，这一收益将捐献给香港加拿大老战士联合会。为了帮助幸运者返回加拿大，这个联合会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序

我最后决定将这部个人回忆录付梓出版时，心中对此选择是缺乏把握的。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士兵在香港战役中的遭遇，记载了他此后在香港和日本的战俘营中渡过的漫长岁月。我本想把它留给自己的儿孙和老友，如果不是改变主意的话，它可能已经成了他们的筐中物了。但是人们说服了我，为了把正义和公道还给我的同志，那些逝去的和尚存的战友，将1941年底加拿大赴港分遣团中最年轻的战士之一的种种经历做一番回顾，并非无益之举。

因为事情几乎过去了50年，所以书中一定有不少错误，特别是日期和地名。我尽量把我的评论和看法限制在我个人经历的范围之内，本书的附录是个例外。附录中所收的文字，选自于“二次大战罪行审判”的副本。

选收这些文字出于两种考虑：一者，我不想将此书写成枯燥繁冗的日军暴行录，尽管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二者，我想用这些文字告诉那些出生于二次大战之后，除了原子弹之外对战争一无所知的人们——不仅原子弹造成的惨剧不能重演，就是其它类型的战争也应永远绝迹。

耶稣劝告人们去爱自己的敌人，对此，马丁·路德·金做过更明睿的评论：“宽恕并不意味着忘记过去的罪恶，也不是为恶行贴上虚伪的标签。它勿宁意味着对方过去的恶行不再成为相互关系的障碍。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的邻敌，那些害人者的恶行并

不能代表他们的全部。即使在最坏的敌人身上，我们也可能发现一点美德的痕迹。”

比起许多回到平民生活中的战友们，我要幸运得多。这部分是因为我那时尚年轻，并且心情开朗。对此，我的战友并不会都做如是观，这我是可以理解的。

肯·凯姆本，M. D. (医学博士)

温哥华，B. C.

一九九〇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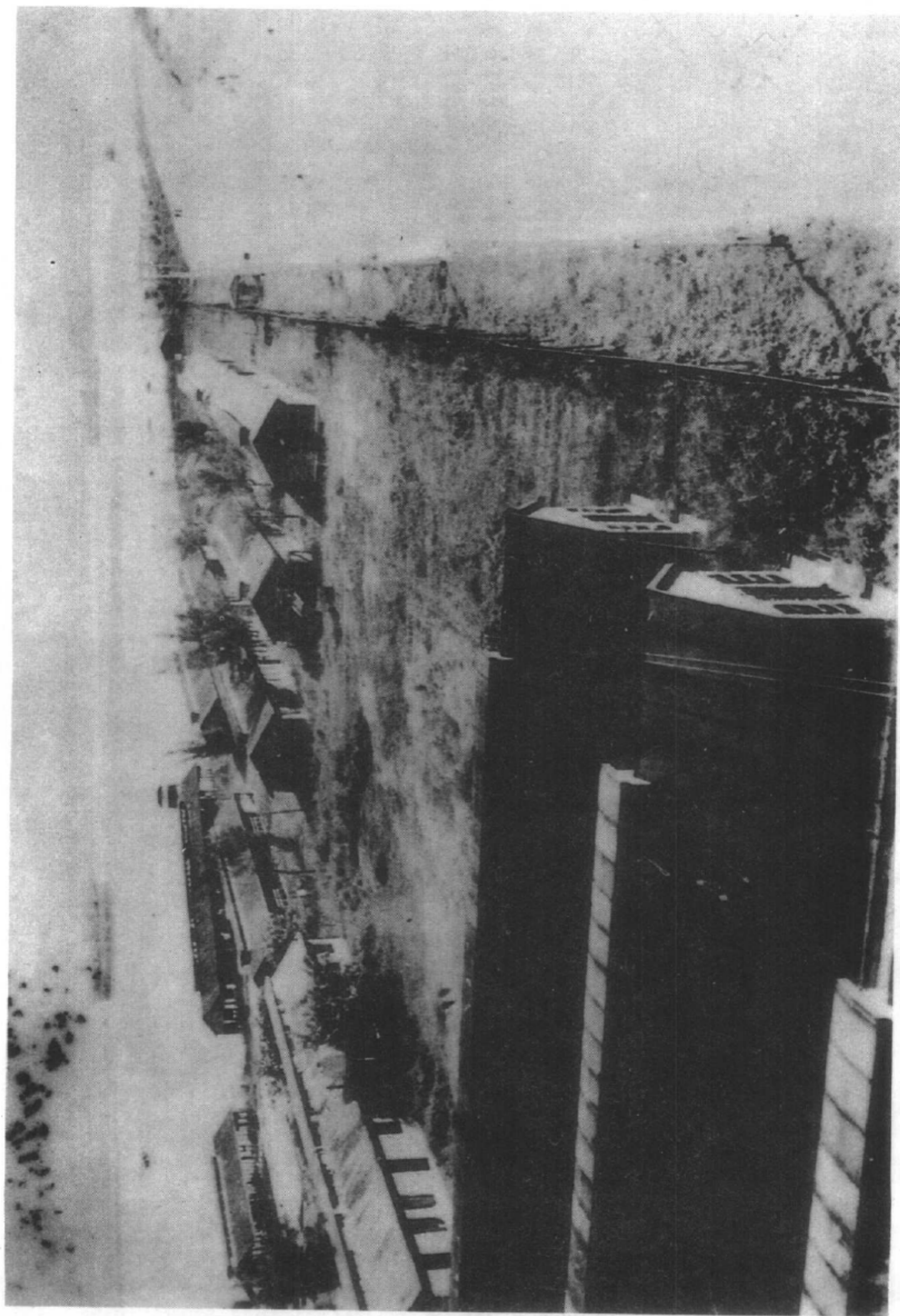
绝不要沉湎于传记之中，它无情地揭示了那盛行一时的疯狂。

——1959年7月2日詹姆斯·赫本
致罗杰·安吉尔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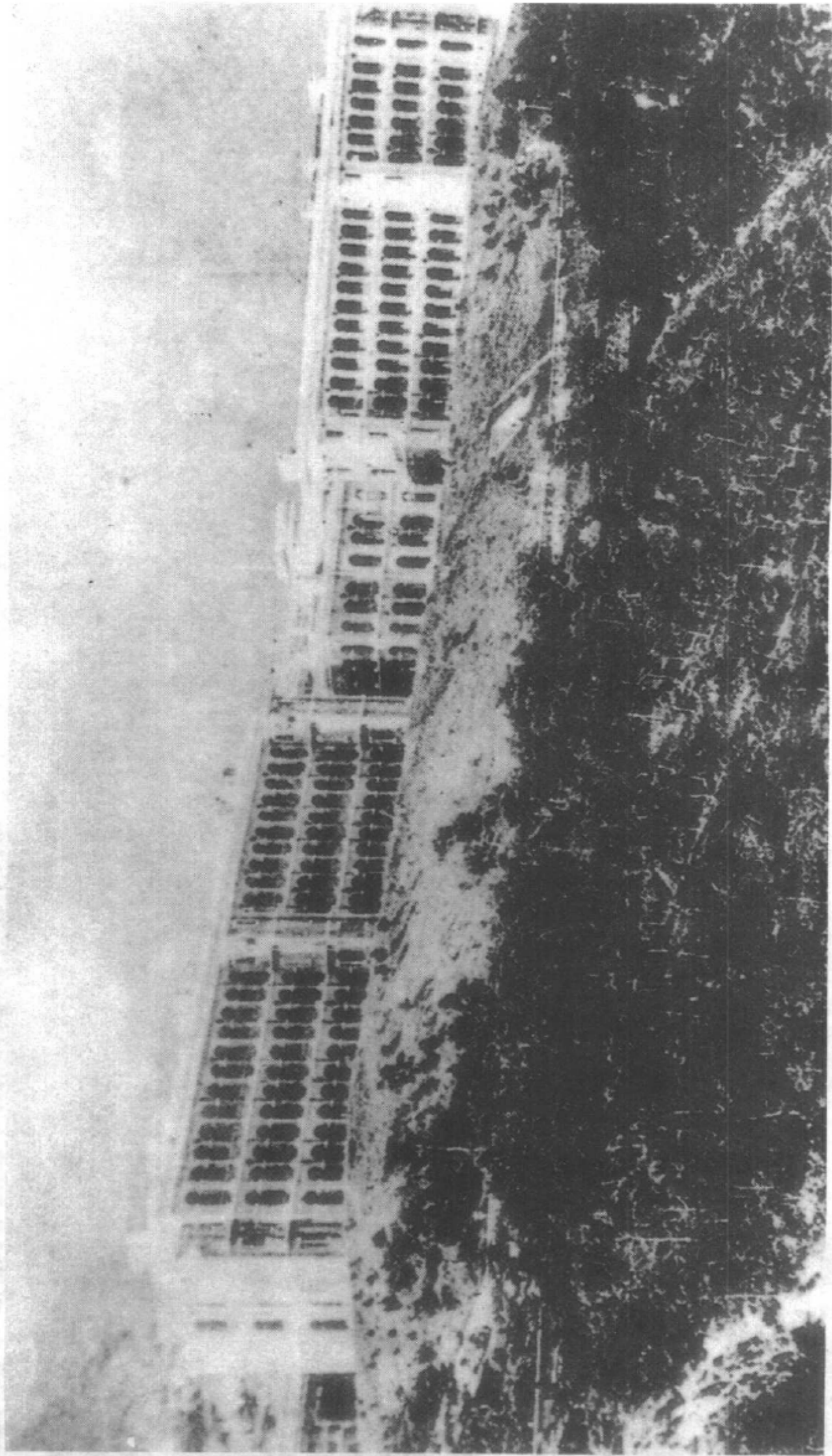
兹以此书留赠我的子孙，希望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健全、更合理的世界里。

——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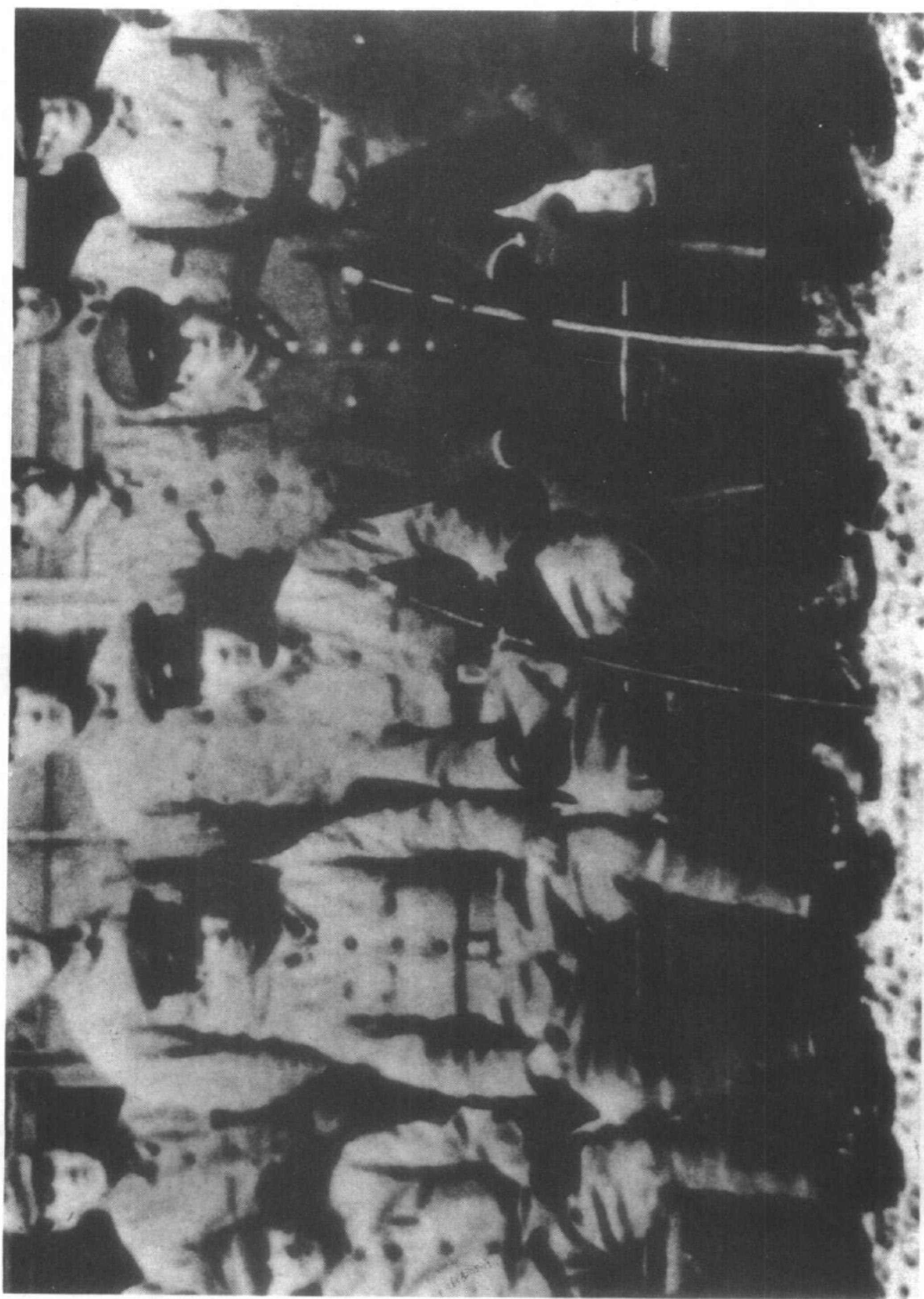




香港北角集中营。现已旧貌无存，原址处建起了高层公寓楼。



实云道英陆军医院。战前刚刚建成，在1941—1945年的二战期间，基本保持完好。



日本新泻5B战俘集中营的日军军官。身着深色军装的是第一任指挥官吉田中尉，坐在他左边的依次是伊藤中士，竹尾高桥下士。



战俘时的本书作者，1943年秋于新泻5B
战俘集中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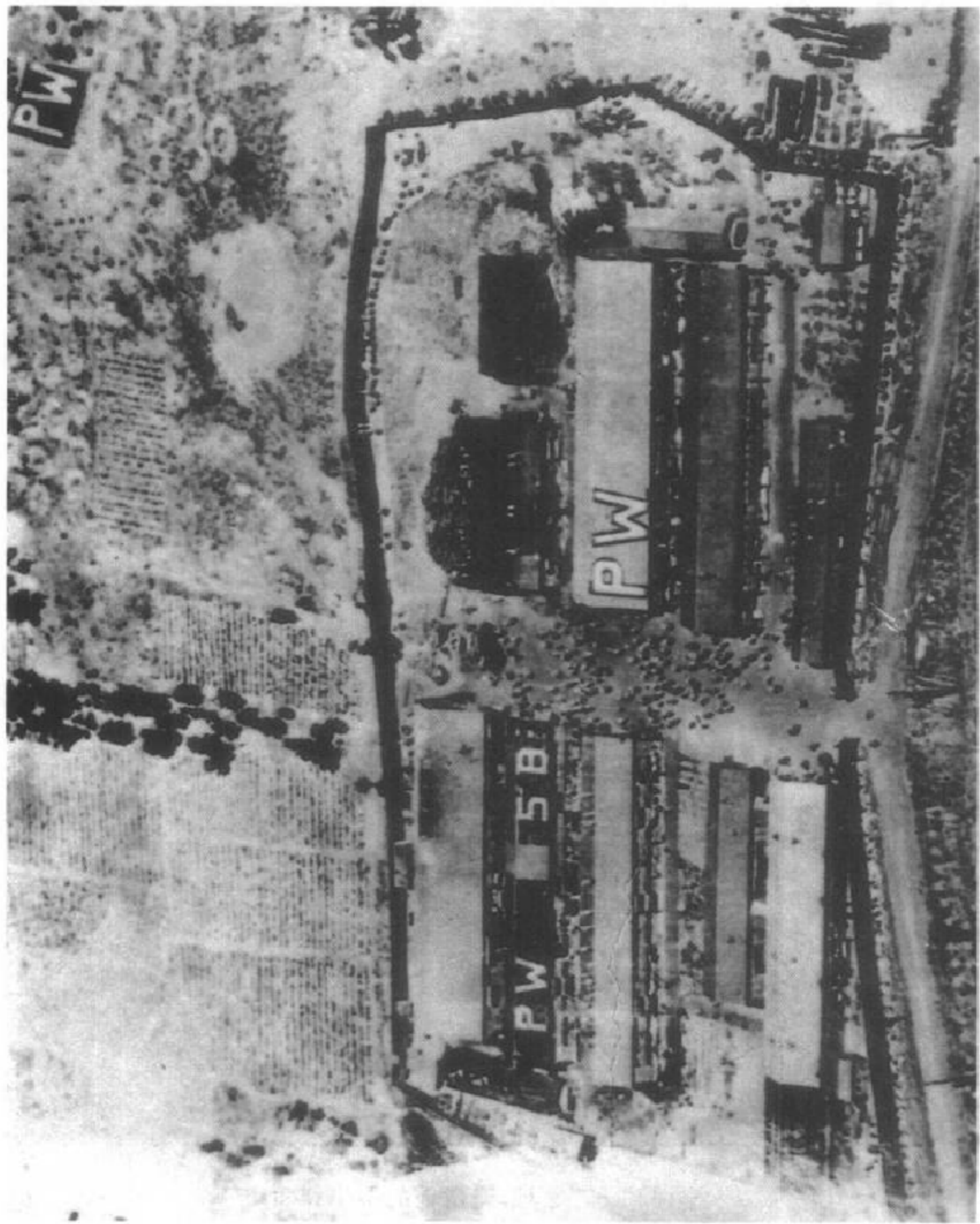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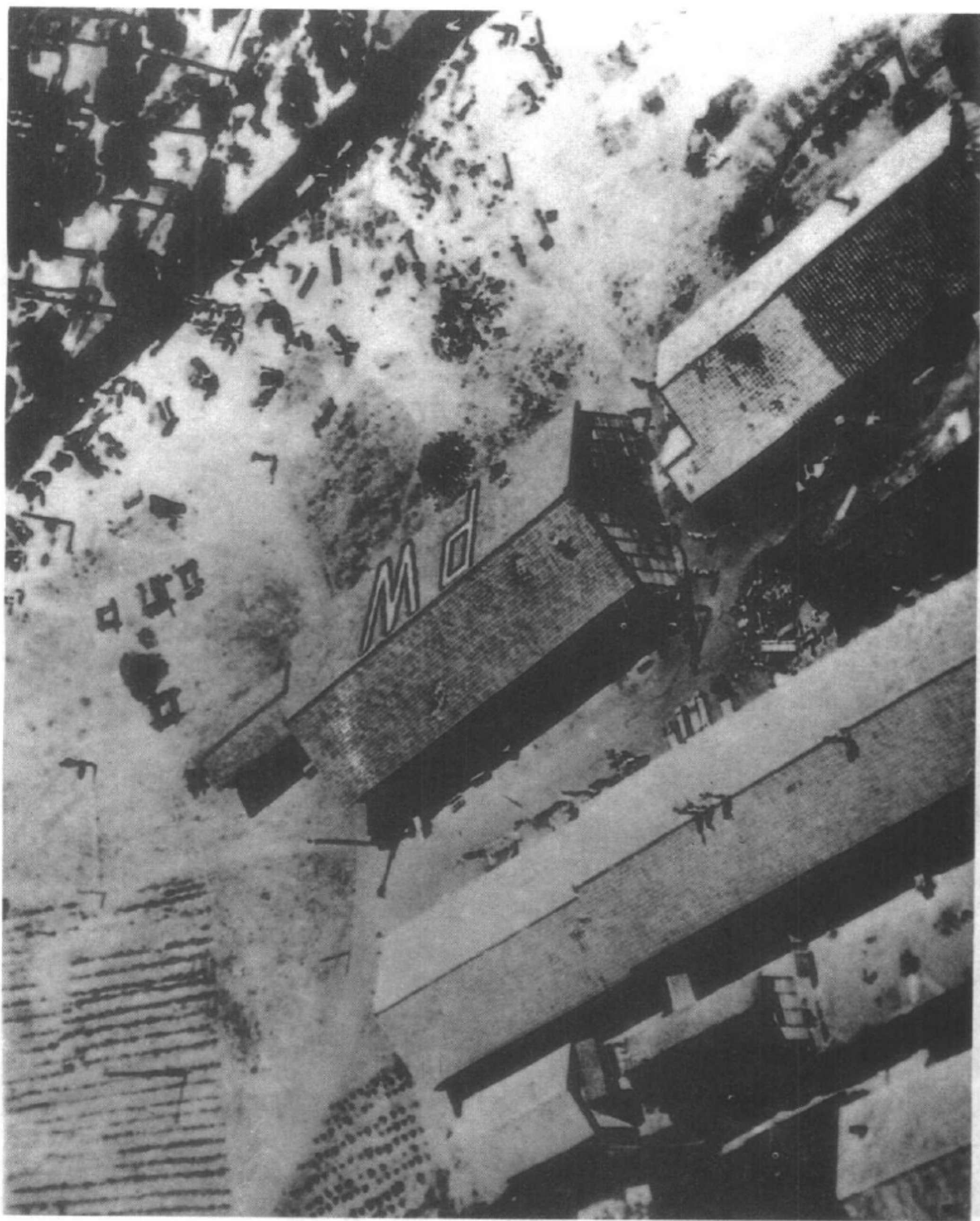
刚刚获得自由的本书作者。1945年8月下旬，与一开乐器商店的日本女士合影。这位日本女士在战争期间曾帮助过盟军战俘。



1945年12月,退伍前的本书作者。

新泻 5B 战俘集中营。照片是美国空军飞行员从空中拍摄的。集中营前右方的大坑，是日方强迫战俘们挖的，日方原计划一旦盟军登陆，即杀戮全部战俘。这些大坑就是为了埋战俘们而准备的。





日本宣布投降几天之后的新泻战俘集中营。房顶上的屈窿是美军空投物资时，因降落伞未能及时打开砸的。



1945年10月返回加拿大时的情景。

目 录

作者前言	(1)
序	(1)
第一章 战前	(1)
第二章 我的战争	(15)
第三章 香港战俘	(26)
第四章 没有艺妓，没有樱花	(47)
第五章 担忧，希望和自由	(65)
第六章 另一个世界	(91)
第七章 尾声	(107)
附录：战争罪行审判摘录	(124)
译者后记	(163)

第一章 战 前

你还年轻，我的孩子。随着岁月的流逝，时间将会改变以至推翻你的看法。因此，当你以为自己的想法最了不起，并要大喊大叫地宣布的时候，请忍耐片刻。

——布莱托

波音“747”上，坐在我旁边、靠近窗口的是一个指甲修磨得无可挑剔的日本女人。她已经在波士顿工作五年了，她自豪地递给我一张名片——“健美按摩专家，田中女士”，她此行是回东京看望父母。她的父亲因中风而不省人事，不久，母亲又摔裂了坐骨。两个老人住在同一所医院。

听了她的介绍，我用日语对她说：“对此我深表同情”。听我说日语，她很惊讶，但是，她并没问我在哪儿学的。

我发现她的话很难懂，这与她的口音有关，但主要是由于飞机发动机的干扰，那没完没了的嗡嗡声，使我无法听清她话语中的高音。她喋喋不休地讲着她的事，十分坦率地告诉我，她出身于一个古老的武士家庭。

我欣赏着她那精致而线条分明的脸庞和脖颈，她那细腻白净的皮肤，在乌黑发髻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白皙。然而，我的思绪

却回到了五十年前的另一次越洋旅行中。

* *

* *

* *

* *

那是1941年11月，近两千名加拿大士兵正在前往香港的途中。作为同盟国的成员，加拿大两年前即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对于同盟国来说，这是惨败的两年。鉴于日本对美、英、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虎视眈眈，企图据为己有。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力量，我们被派往香港。盟军方面希望日本因此而改弦更张，然而这一武力威胁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这支加拿大皇家步兵部队的第—营来自魁北克，同船的还有来自温伯尼的掷弹兵和一些参谋人员。我们是加拿大方面派遣的—批参加二次大战的军人，我是个列兵，是这些人中最年轻的。我们塞满了M. V. “艾瓦提”号货轮的船舱。和平时期，这艘加拿大——澳大利亚轮船公司的货船或航行在澳大利亚各大城市之间，或从事远洋贸易。只是在近来，它才成为军队运输船。

还有些士兵挤在轮船深处的吊床上，吊床下面是一张张大餐桌。他们对顿顿羊肉的单调食谱满腹牢骚，对享受特权，居处奢华，占据着专用高级沙龙的军官抱怨不已。—天晚上，食宿间的巨大差异引起了士兵的骚乱，只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渴望跨洋打仗，这场骚乱才未酿成暴动。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平息众怒的理由似乎难以置信，但那时我们确实盼望打仗。

有—连皇家步兵在H. M. C. S. 罗伯特王子护卫舰上，他们的食物较好，但护卫舰体积小，颠簸不定，很多人晕船，结果，不少人难以享用这些美食。

为了摆脱污浊的空气和枯燥无味的闲聊，晚上，我常常溜上甲板，裹着毯子，仰卧在热带天空之下。随着黎明的到来，出现在海面上的飞鱼和海豚以及船头划破海水发出的飒飒声响，还清



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船上出现了不少谣言，有人说，前面可有遇到敌人，我们得在海上作战。这种谣言既令人惊异，又让人迷惑。我不无嘲讽地想，这仗该怎么打？我们所有的武器装备都在后面一艘慢吞吞的货船上，而我们这艘船还有不少船舱空着。上头错误地把人、枪分了家。当初在总司令部，这种令人难以相信的愚蠢安排就遭到了一些人的激烈反对。这些人是了解我们的危险处境的。

加拿大最高指挥部的这类举措失当和荒谬安排，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与这个衙门打交道的经验告诉我们，更倒霉的还在后头。驻扎在新西兰的加拿大皇家步兵的遭遇就是一例，1940年到1941年的冬季，设在新西兰的渥太华陆军司令部竟忘了给那里的部队送去急需的军装。结果，打仗时许多人衣衫褴褛，军装上打着补丁，而弹药和其它必需品更是屡屡供应不上。那些当官的，在战争伊始就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军队最高层是如何把那些无能昏聩之辈都搜罗进去的，至今让我迷惑不解。

船上给我们讲课的军官郑重其事地向我们保证：香港就是太平洋上的要塞——直布罗陀。日本人都是眼睛近视的侏儒，个个戴着瓶子底似的厚眼镜，他们最怕短兵相接。其夜战一向臭名昭著，根本无法与身高体壮、武器精良的白人士兵相抗衡。他们的飞行员胆小怯懦。他们的飞机已经老掉了牙，是用木头做的，很容易成为我们的靶子。（日本人的零式战斗机确实是木制的，但是，其性能比美国生产的飞机好得多。这种状况直到二次大战后期才有所改变。）

1941年11月下旬，我们抵达香港后，一个参谋对士兵们发表了一番简短的讲话。他告诉士兵们：日本人在中国取得的成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中国方面的抵抗不堪一击。中国的炸弹质量差，空军很少进行夜间飞行训练。侵入中国边境的五千日兵的装备相当差，其战斗力是大可怀疑的。

这个参谋还强调说，日本人没有夜战的经验，他们的大炮陈旧过时，炮弹匮乏，飞机破旧落后，飞行员都是近视眼，这意味着他们不能进行俯冲轰炸。

这就是英国式的智慧，这种灌输就像骗术一样，产生了令人鼓舞的效果。从那时开始，加拿大军队可能就已经不识自身真面目了，实际上我们的“胜利”也从此被这种骗术抽空了。

在扛枪当兵之初，我就认为，盟军在希腊克里特岛上的失败是一大耻辱。在这次战役中，盟军领导缺乏智慧、勇气和判断力。我甚至还说，如果我在那儿，我会重创敌人的。这种话出自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列兵之口，是难以被人们接受的，不用说那些当官的，就是我的朋友也不以为然。我学会了把这类想法埋在心里。……我几乎快修炼成功了，但是，如果面对着这样的事实——训练方法和武器装备只相当于一次大战的水平，思想观念还要时不时地退回到布尔战争时代，那么，不满情绪是很难抑制的。

船上还盛传着另一种谣言——德国的武装快艇在这一带十分活跃。这种谣言使我们对如何使用救生船兴趣盎然，至少，有了更明显的目的性。

每天在甲板上，我们都积极地投入体力训练、小型武器训练、布郎枪射击以及一些队列练习等。大家尽管有牢骚，但是士气高涨。

船上的啤酒很不错，在此之前，我没喝过澳大利亚的啤酒。当我再次品尝这种啤酒的时候，已经是战后的事了。战后在澳大利亚影星克罗克狄欧·邓迪的大力促销下，澳啤已经通过电视广告走进了千家万户。我记得这种啤酒有一种浓郁的香味，而现在的澳啤则和加拿大的差不多了。这是时间流逝带来的另一种损失。……也许这只是因为我品酒的能力已趋成熟。

赌博虽被禁止，但照例盛行不衰。“老一，老末”是那时流行的玩法，但我迷上了“二十一点”。一个来自马格蒂林岛的伙伴是

个打牌高手，他教我怎么玩。在这次旅程将尽的时候，我已经赢了五十元，这可能是我六年军旅生活的最高记录了。也可能是我的戎马生涯中所交好运的顶点。此后，我的牌运一直走下坡路。到了香港，我倒真的爬上坡了。然而，这种上坡路带给我的只是灾难。

香港方面为我们举行了盛大而热烈的欢迎仪式。我们的船穿过狭窄的水道，驶入宏伟的港口，形形色色的帆船和舢板尾随着“艾瓦提”号云集港湾，迎接我们的鱼雷快艇“嘟嘟嘟”地叫着，像海豚一样簇拥着我们的船。几架老掉牙的水陆两用飞机从船上掠过，显然，喷气式战斗机和飓风式驱逐机还没有投入使用。

可悲的是，这种陈旧过时的飞机只有区区五架——两架水陆两用战斗机，三架“野蜂”号鱼雷轰炸机，组成了香港全部的空军力量。

这天天气很好，晴空万里，阳光普照，但不闷热。那雄伟的山峰和四周的山峦似乎在向我们证明当官的所言不虚——香港这个要塞，坚不可摧，固若金汤。

我们两个营头戴钢盔，不可战胜似地整队穿过弥顿道。九龙的主要街道两侧排列着欢迎的人群，人们挥舞着小型的英国国旗。半路上，我们的连队夹在了两个军乐队的中间，这两个乐队自顾自地奏着同一个曲子，在前往深水埗兵营的两公里长的路上，我们不得不像跳芭蕾舞一样，不停地改换着脚步，以适应不同的鼓点。

我们曾在加拿大的兵营里生活过十八个月，与那里比较，白人士兵在香港所享受的优厚待遇令人吃惊。在这里，即使是下等兵也有自己的单人床，床单、蚊帐一应俱全。每天早晨，你还没起床，来自东印度的勤务兵就把茶送到你的手里，还主动给你刮胡子、擦皮鞋…。往往没等你从“大人”、“先生”、“老爷”这类令人震惊的称呼中醒转过来，印度兵就已经等在那里了，他们干

这些事只是为了一点微薄的小费。

英国军队在远东战争初期之所以连连败北，与此不无关系，英国军队的养尊处优在日本军队中是不存在的。他们强调自给自足和远离本土的生活能力。

英国军队有一些古怪的规矩，令人无法理解。军中规定：太阳下山前，不许戴钢盔；太阳升起后不许穿短袖。上级强迫我们订做考究的军装，但是，我们却没有适合地形地貌的实用性军装。因此我们第一次投入实战时，穿的是精心浆洗并经过漂白的军装，穿着它站在山坡上，就像圣诞枝上的灯火——成了现成的靶子。

不幸的是，我们在安乐乡里的生活不过是蜻蜓点水，抵港不到一周，我们就被调到了前沿阵地。这一调动使我们对岛上的山川地形比那些生活在都市里的当地居民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令人悲哀的是，在这方面我们也远远地超过了大多数英国军人。

尽管如此，我们也领略了湾仔和苏丝黄之家的魅力，后者在香港那里更为著名。浓装艳抹的当地姑娘在水银灯下显得分外迷人，她们身着开口直到大腿的旗袍，脚下是木制凉鞋。姿色透人，仪态优雅，美不胜收。虽然在船上给我们上课的军官曾告诫我们：这类香港女人不但染有各种性病，而且身上还带着东方特有的致命的病毒。但是这些危险似乎并没有妨碍加拿大官兵与香港女人发生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

因为我们出手比较阔绰，香港的应召女郎对我们十分欢迎，这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英国军人的嫉妒，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冲突，这是迄今尚未披露过的香港的第一次战斗。战斗发生在新新咖啡店，这个咖啡店坐落在湾仔的一个不大起眼的商业街上。

这场战斗，就像后来与日本人打的那些仗一样，在后来的战俘营里随着年年月月一次又一次的讲述，其程度和范围也逐步升级，最后，整个英国驻军都被扯了进去。从这些讲述中，人们得到了某种满足。

其实无须任何夸大,仅仅其真实情况就足以令人终生难忘。冲突是由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引起的——英国兵总把那些侍女视为水性杨花的浪女人,而加拿大人对此不以为然,于是,在一个桌子上引起了争论。很快,争吵蔓延到整个咖啡店,大约有一百个人在争吵、打骂。我则是第一百零一个。其实,把我算进去是不够公平的,因为我当时正在拼命地逃离战场。

瓶子四处乱飞,缀着沉甸甸的铜扣的皮带在空中挥舞,桌子、椅子、镜子被那些不能夺路而出的人们打碎、砸烂。狂呼、尖叫,震耳欲聋,店里本来已经烟雾缭绕,在这种环境下打架更让人呼吸困难。咖啡店老板以为关了灯就能保住店里的东西,结果是乱上加乱。军警赶来时,正值战斗高潮,交战双方此时竟联合起来,把军警打得落花流水。

我的头上至今还留着一道伤疤,伤口是那天凌晨由一个毫无同情心的医生缝合的。我分辩说自己是无辜的,可他毫不理睬,不给我打麻药。如果按照美国军队现行的授勋标准,我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即使比不上入侵格林纳达的英雄壮举,也足以赢得一枚紫心勋章。

我过去总以为香港是中国南海中的一个岛屿,出乎意料的是,香港实际上只是这个殖民地的一小部分。岛上大多数居民住在维多利亚城和与其一水之隔的九龙——大陆的一个小小半岛。香港与中国大陆接壤的部分叫新界,那里除了几个孤零零的村落之外,大部分地区是无人居住的荒地。新界两侧各有一条通往中国大陆的公路。今日香港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岛上摩天大楼林立,新界熙熙攘攘,到处都充满了活力。

英国总参谋部认为,香港不可能抵御日本人的任何进攻。1938年日本人占领广州,陈兵新界的边界上时,这个论断更显得确凿无疑。不久,当陆军少将A. E. 格拉塞特被任命为香港驻军总司令后,这个结论被改变了。格拉塞特十分乐观地认为,香港完全



可以坚守，直到援兵的到来。他计划在新界的南部设防，以便得到蒋介石军队的援助。可是，因为蒋介石千方百计地避免与日本人打仗，所以，这种希望是相当渺茫的。然而，当格拉塞特1940年被免除总司令职务时，他说服了伦敦当局，给这个殖民地增派了两个营的兵力。也许是因为他生在加拿大的缘故，他推荐了两个加拿大营。

关于香港之战，加拿大的参加者没有留下多少记载。我所读到的书给人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加拿大军队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实际上没有武器，被日本人打得溃不成军。事实恰恰相反，我们连队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入伍一年以上。虽然应该承认，那时的军事训练并不令人满意，缺点、不足甚多，主要沿袭一次大战的经验模式。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绝非对打仗一窍不通的新手。

后来，我读到了莱曼·达夫法官领导的委员会撰写的赴港加军装备、训练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使我对军队内部的黑暗感到失望。战时的训练方法战前是否在加拿大军队中推行过，我深感怀疑。同样的情况可能在英国军队里也存在。

那时，只有极少数加拿大人受过使用实弹、手榴弹和自动武器的训练，迫击炮的实弹演习几乎没有，因为那时在加拿大几乎找不到三英寸直径的迫击炮。

毫无疑问，战斗打响的头几天，日本士兵干得比我们漂亮。但是，从敌人不断的袭击中，我们迅速地学会了战争，这种袭击成了我们的基础训练课。

我们所缺乏的是具有参谋水平的领导，我们所有的战斗都是以排为单位，各排很少联合行动，没有连与连之间的协调，更不用说全营了。结果，即使在敌人强行登陆时，我们也未能协调一致，进行反击。

* * * * *



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之后，我们与日军之间的小规模战斗很快开始了。五十架左右的日本飞机袭击了香港的一些重要目标，停放在启德机场的四、五架老式飞机毁于空袭之中。说老实话，即使这些老掉牙的飞机免于此难，它们也不会起多大作用。

我们在深水埗的营房也遭到了空袭，但因营里的大部人已经到山上驻防，所以只造成了一、二个伤亡。从那时起，我们就不断地遭到炮击。开始是头上的飞机，后来是地上的迫击炮和重型火炮。

令人丧气的消息传来，那天夜里，日军快速地向前推进，通过了新界并突破了苏格兰皇家部队的防线。日本人避开了大路，在夜里熟稔地穿过穷乡僻壤，把精心安排的大陆防卫部队搅得一团混乱。这个地区在两天之中根本没做任何抵抗。

新界防线的英、印部队被船接回香港岛上，看着这些面容憔悴、疲惫不堪的同志们从我们的防线前走过，心里真不是滋味。可奇怪的是，我们的士气仍然很高。

很显然，保卫香港的关键在于，必须防止岛上出现任何永久性的登陆地点。一旦日本人在什么地方站住了脚，他们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运送人员、储备大炮和其它重武器。

同样明显的是，日本人从大陆到香港岛的合乎逻辑的登陆地点是香港东北端的鲤鱼门，大陆至此处的直线距离只有五百米，是理想的登陆地点。可直到最后，英军驻港总司令马尔比少将仍希望日军从海上来进攻。香港岛上很少暴露给大陆的那部分却是严密设防、地雷密布。

可以居高临下地观察所有的登陆地点的柏架山，最初竟然只置了很少的兵员，甚至连一个适当的观察哨也没有。其实，柏架山是个很理想的战略要地，有了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整个地区。在这个制高点上，只须重机枪和轻型火炮即可将任何登陆之

敌消灭干净，然后，再用一支机动部队即可很容易地将残敌置于死地。而军事当局却把水边的地堡作为御敌于港九之外的第一防线，其无能愚蠢简直让人费解。

香港岛东部的防卫力量由四部分组成：加拿大皇家步兵、英国密德塞斯营、拉其普特印度营一部和香港志愿团一部。因密德塞斯营的大部后来撤到了赤柱，所以日军袭击鲤鱼门时他们不在那里。我对战争的评述将仅限于我所在的东部地区，当时战场上极其混乱，因此，任何第二手的叙述都不宜轻信。

加拿大兵团司令约翰·罗逊少将和他的大多数参谋在战争一开始就牺牲了，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从此，两个加拿大营就不幸地分置于两个司令的领导之下。英国香港陆军司令马尔比少将看不起加拿大人，而我们对他的评价还是以不提为好。可悲的是，大多数述及香港战争的出版物都以马尔比的日记为根据，这些日记是他在被俘期间设法保存下来的，它们显然是替自己的主人说话的。

香港与大陆相连的地区沦陷后，敌人的炮火立即加强了，来自空中的轰炸也更加猛烈。我们后来才知道，日本人之所以能如此神速地把大炮调到准确的位置上，是因为早在战前，日本商人就已经在九龙的货栈里画好了大炮的位置图。

沿海修建的地堡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下迅速崩溃瓦解。从地堡的破裂处和洞孔中可以看出它们根本没有用钢筋加固。其质量之差是一目了然的。贪污受贿在这种情况下使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种地堡不管是愚蠢的暴露，还是笨拙的掩饰，对于保护生命来说，都没有多大意义。

没完没了的“战斗准备”和愈演愈烈的轰炸，使睡觉甚至吃饭都发生了困难。许多中国难民在周围转来转去，给这个地区增加了混乱。据后来的报告说，难民中有一些是第五纵队的人，对此，我不甚了解。



12月5日，日本军队渡过鲤鱼门，对我们发动了第一次进攻，但是没费什么劲就被我们击退了。随后，空袭和炮击更加猛烈，部队在那里几乎寸步难行。海边的油库和油漆厂着火了，滚滚黑烟，笼罩天空。在这种理想的条件下，八个营的日军登陆成功。那天是12月18日。

派往海边的印度营准备进行一次勇敢的反击，可是他们在兵力和组织上都无法和日本人相比，日军迅速地冲上了山头。

日本人占领我们山上的营盘时，与我们发生了第一次接触，日军的到来使守卫要塞的英军大吃一惊，几乎没有做任何抵抗。C连的一个排发动了一次进攻，遇到了自动武器射来的猛烈火力。

过了一阵子，许多日本兵在占领的阵地上撤了下来。他们士气低落，队伍混乱，不能继续留在战场。

C连连长梅杰·毕曾是大战受过勋章的老兵，他冷静沉着，不轻易动怒，从不知道害怕。他打电话给安全地躲在赤柱的马尔比将军，要求炮火支援并增派部队以进行反击。马尔比将军警告他别歇斯底里，还派人一探究竟来看看是否日本人真的到了前线。遗憾的是，这不但不是事实而且已经太晚了，此时，日本人已经建起了坚固的滩头阵地。

当日本人向我们的阵地发动进攻时，我正在前往大潭峡的路上，离阵地大约一公里左右，没能赶上这场战斗。为了抗击日军的进攻，C连伤亡惨重。战斗结束后，他们接到马尔比将军的命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带着伤员撤到了大潭峡。

马尔比这时才命令两个排去占领柏架山的制高点，可是太晚了。日本人已完全控制了这个地区，甚至在柏架山上架起了轻型火炮。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我们似乎整天爬山，却不知自己在什么地方；上头不断地给我们下达战斗命令，而我们不但不知道敌人在哪儿而且老挨打；有时是自动武器，更多的是狙击手零星的射击和迫击炮的轰炸。

后来，我们连接到命令，撤到棕树别墅。那里有一幢很不错的房子，位于大潭峡和赤柱之间。我们排的排长 J. E. D. 史密斯连哄带骗地弄来了一辆被抛弃的汽车，我们十几个人都上了车，两个爬在前车盖上，一个伏在车顶上，别的人或挤在车里，或站在踏板上……轻轻松松地到了目的地。我们的好运气使那些全靠两条腿跋涉而疲惫不堪的人们十分嫉妒。

日本人用两个团的兵力拦住了我们，使我们不得不后退。日军的另外两个团趁机向前快速推进，攻打我们的旅部。加拿大旅长，我们的兵团司令，约翰·罗逊少将在突围时牺牲，同时阵亡的还有他的大多数参谋。我们的英国旅长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下命令发动快速反攻。

这时，我们退守山下，与西旅天各一方，彼此隔绝。而日本人占据的恰恰是他们最熟悉的地形，他们的武器又比我们好。更要命的是，皇家炮兵只剩下了三块阵地，既无法进行战斗，又不能与旅部保持一点可怜的联系。这种情况导致了一系列的失误——皇家炮兵的英国军官牺牲后，仅有的三块阵地也丢了；而取代牺牲者的印度军官又误解了上级的命令，率领炮兵撤出了战斗，撤退前还把塞住了火门的榴弹炮统统留给了敌人。从此，我们再也没有了炮火支援。

因为敌人已经包围了这个地区，所以我们打算用几天的时间打通上山的路，赶走敌人，然后再悄悄地下山。我们的后勤工作极差以至于根本不存在，打完仗绝大多数人吃不上一顿热饭，而旅参谋所在的赤柱要塞一切东西应有尽有。听说回到赤柱的英国军队还在那里大踢足球。也许，这只是一种不怀好意的谣言。

当我拜读我们的英国旅长马尔比将军的战时回忆录时，我不能不为书中的内容惊诧不已。在他的笔下，所有的事情都进行得极其顺利，所有的文献都对子孙后代负责，一切的一切都在证明着他如何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处处显示着他那杰出的军事才能。

事情果真如此吗？

不用说别的部队，只消看看我们的经历就可以明了，在上级的指挥下，我们的整个战斗成了一个声音杂沓的“大合唱”——矛盾百出的命令、混乱无章的组织、拖泥带水的作风。直觉告诉我，我们连并不是唯一的例外。

这种“大合唱”没完没了、不断重复，使我们所有的人都厌恶透顶。我们从来没有在战场上见到过参谋人员。上级给我们的援助既少又迟，其向我们下达反攻命令时，对地形既无真切的了解，对敌人的兵力和位置又一无所知，甚至对自己部队的战斗力和基本情况都不甚了了。

我怀疑，英国最高司令部的头头们是否离开过那深藏在地下的掩体。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真实情况，直到最后，他们也没弄清登陆的日军有多少。

有人争辩说，战争伊始就为失败奠定了基础。但是，如果我们能以更少的伤亡换取更大的战果，如果我们的指挥官不那么平庸，战斗组织不那么混乱，只要在滩头阵地上发动一次强有力的反攻，日本人的登陆就会被挫败。一旦登陆的敌人被击退，山上的日军就会成为瓮中之鳖。可是，在那至关重要的最初的几小时中，毕晓普少校提出要求炮火支援的反攻计划却被上级拒绝了。在这些当官的看来，毕晓普过分严重地估计了敌情。

日本人后来承认，他们在攻打C连时，伤亡了百分之六十五的官兵。由此看来如果当时上级给予有效的支持，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

我们的运输供应是如此的糟糕，由于官僚主义的干扰，能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履带式小型装甲车始终没有运到我们手里。

我们的总司令认定，日本人的主要进攻将来自海上，因此，在整个战役中大量的兵力始终集中在岛的南端。我们的统帅不是亚

力山大。

马尼拉和新加坡发生的故事是这一灾难的翻版，只不过比香港更糟糕而已。在菲律宾的美国军队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



第二章 我的战争

战争中的兴奋和混乱，总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数量的多少，距离的远近，攻击的成败以及各种事情发生的时间。

——沃尔特·洛德：
《难以想象的胜利》

除了日本对香港之战的大肆宣传外，历史学家对这场战争并无多大兴趣。因为它在战争的全过程中作用甚微。尽管近五十年后，我对这场战争的记忆已经不甚清晰，但我仍清楚地记得，我们大部分时间，似乎都消耗在爬山上，我们不断地爬上爬下，不时地挨冷枪和炮击，却不知道战斗在哪里进行。

连队回到棕树别墅的情形，我记忆犹新，我永远忘不了回去后的第二天。旅部最后下令反攻，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徒劳之举。因为我们放弃的制高点已经被日本人占据了。而排里的人们却热切地盼望着反攻，以为打败日本人轻而易举。大家拿早餐开玩笑，我也只能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好像一点也不害怕。我们的早餐是英军吃的那种冷罐头，每人只有半听，美其名曰：肉炖菜。

那天，我们费力地爬上龟山（我记不清楚这是否是它的准确的名字），敌人在那里已经挖了战壕。那里的地形复杂，我们对它一



无所知，我们的目标是另一个山头，从山上可以俯视日本人的阵地。我们紧贴地面匍匐前进。这时，我们已经扔掉了那些足以使我们成为日本人靶子的鲜丽的黄军装。至于那些防毒面具和其它没用的装备很早以前就被扔掉了。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又累又饿，可是，大家仍旧抖擞精神，士气不衰。几天来，我们已经领教了日本帝国军队给予我们的一切，现在该轮到我們进攻了。这正是大家所期待的。

日本的步枪和机枪发出的声音与我们的大不相同，子弹飞过时发出一种特殊的呼啸声。（我们对自己的步、机枪声音很熟悉，因为两个小时前，一排印度兵就把我们当成日本人，朝我们开了火。）

幸运的是，在这个崎岖不平的山上，有许多地方可以隐蔽，还有很多野生植物可以藏身。为了免遭日本人的枪子，我贴着地面，很快地向前爬着，我的脸经常埋在土里，脏兮兮的。

子弹或是从头上呼啸而过，或是尖叫着钻进身边的土里。这种生死间的体验无法令人忘记，要躲开这些四处横飞的子弹，必须极其冷静地判断子弹落地的位置，即使只有一、二英寸的误差，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为了点燃地上的草，日本人用机枪发射曳光弹。幸运的是，他们并未得逞。

如果这时候有迫击炮支援，或者有地面火力网掩护，把日本人赶下山头是不成问题的，然而这只能是空想。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日本人的飞机还没有出动，如果它们这时出现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只能从拼命苦战走向灭顶之灾。

我们刚刚绕过头一个山峰，敌人的火力就急风暴雨般地倾泻过来，在这铺天盖地的枪林弹雨中，我看不到一点生还的希望。多亏一条水沟救了我们的命，那隆起的沟沿挡住了日本人疯狂的扫射。我们这个小队居然没有人受伤，真是奇迹。

我正琢磨这一天可能又快熬过去的时候，一颗手榴弹落到了



离我不远的地方，它三下两下滚到我躺的洼地里，在我的脚边停住了。我又急又怕，一脚把它踢到下边大约六英尺远的坑里。

我把脸埋在松软的土里，心惊胆战……等着它爆炸，足足两分多钟，我缩成一团，半身麻痹，一动也不敢动，心中充满了厌恶和恐惧。结果，却是个“臭蛋”。

排里的中士肖特·波普在我前面，他回头看了看我，我以为他在给我鼓劲。后来才知道，他只是暗示我跟上来。根本不知道手榴弹的事。

我们慢慢地向前爬，爬向敌人的上方。这时我们连的处境更危险，因为弦们完全暴露在日本人的火力之下。如果有迫击炮，最好是大炮的火力支援，我们的行动会奢易得多。然而，什么也没有。我们的迫击炮并未全部运抵香港。因此，像我前面提到的，我们始终得不到火力支援。

好像过了好几个小时，我们终于爬上了山顶。从山上往下看，日本人就在离我们五十码的地方。大约有七十五人。他们聚集在一块平地上，正仰头注视着山上的路。奇怪的是，他们对我们和他们上面竟毫无觉察，还在朝山下掉队的个别战士开枪射击。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观察这些日本人，他们帽后的帘子一直盖过脖子，使我想起法国的外国军团的故事。从上往下看，他们显得很小时。他们的指挥官十分显眼，因为他军装的颜色较深。奇怪的是，他站在那里，军装大敞着，露出里面的白衬衫与他那些伪装得很好的士兵形成鲜明对比。他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挎军刀的日本军官。只见他手持战刀，四处挥舞，就像一个B级电影里的什么角色。他挥动战刀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的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一砍！也许他只是在热情地鼓励他的战士们。

我们约有二十几个人，大多是皇家步兵，也有几个香港志愿防卫队的人，他们在我们之前爬到了山顶。我们有两挺布郎式轻机枪（当时一种常见的机枪），因为我们仍背着笨重的子弹袋，所

以弹药很充足(后来,有的人嫌子弹袋太不方便,影响在山上的行动,就把它扔了)。

我手脚展开趴在地上,枪口瞄准敌人。此时此刻,我浑身是汗,疲倦、焦急又极其兴奋,只等着肖特·波普下令开火。

我们的突然开火,使日本人大吃一惊,借着子弹扬起的烟尘,他们忙不迭地四下奔逃,寻找藏身之处。我们的子弹追赶着那些往山的另一边逃窜的残兵败将。

我毫无悔意地射杀着敌人,从没有想到死在自己手下的人中,可能会有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他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可能和我一样。用今天的话讲,我们当时个个斗志昂扬,精神抖擞,为把日本人赶下山而庆幸。

虽然我们的小队没有伤亡,但是,连里的伤亡很大。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排长和连长都挂了彩。尽管如此,这次胜利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把日本人赶下海的希望。

我们快弹尽粮绝了,水也所剩无几,珍贵异常。我傻乎乎地背了一路的一壶郎姆酒,这时可派上了大用场,没一会儿,就一人一口喝个精光。刚刚当上代理中士的哈里·辛普森不禁得意忘形,大喊大叫,一个香港志愿防卫队的下级军官,名叫萨拜坦的也口出狂言:“这些狗杂种,算不了什么,……把他们统统赶到海里去!”

不久,一个下士班长来到了我们的阵地,他带来了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我们不但得不到盼望已久的饭、弹药和补给,还不得不退到山下去,为明天的另一个反攻做准备。

我的心沉下去,嘴里又干又渴,不由自主地骂起街来。我无意识地重复着那些脏话,这些话没有一句是我的发明,没有一句不被人们挂在嘴边。天开始变得昏暗起来,无形中增加了人们的忧郁情绪。不久,下起了雨。

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着,脚下打滑,时

常跌进岩石缝中。不敢肯定部队是走向棕树别墅，还是走进了敌人的埋伏圈。我扛着布朗机枪的备用枪筒，不止一次地想把它扔掉。岩石路面坎坷不平，我们常常摔倒。我一边走一边发牢骚、骂大街……。比尔·巴克利突然对我说：“凯姆本，看在上帝的份上，你闭嘴吧！你来这儿倒底为了什么？”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至今难忘。

这几句话教育了我，几个月后，在战俘营里，他临死前，我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使我回到了正轨。他不是个老退伍兵，只比我大几个月，但是他长得比我魁梧，思想明显比我成熟。虽然在许多人看来，这件事可能难以理解，但是对我来说，比尔·巴克利的这几句话是极其重要的。我变得现实起来，不再想入非非。我知道，一旦被捕会发生什么事。我下定决心，竭尽全力和大家一起下山。而不再沉湎于怨艾和哀鸣之中。

雨下得很大，我们浑身透湿，终于走上了大路，朝棕树别墅进发。在棕树别墅大门口，欢迎我们的是哨兵的子弹。多亏他过于紧张，枪打得不准，没给我们造成伤亡。万幸的是，当这些端着威克枪的家伙又要朝我们开火的时候，我们的喊叫声起了作用——他们认出来是自己人。

我们饥寒交迫，衣衫透湿，而等着我们的却是露天宿营。乔·德莱尼和我查看了周围的环境，决定找个更好的地方。我们偷偷摸摸地溜进一栋豪宅。令人惊讶的是除了一个满脸皱纹的中国老太太之外，这所大房子里竟无一人。老太太不会说英文，非常怕我们。

我一边笑着一边拍着肚子，示意老太太我非常饿。她慌忙出去，带回了一些罐头和饼干。我们饱餐了一顿饼干和炼乳……就是在今天，这些东西我也会吃得津津有味……有时我还真想再吃它一回。乔向老太太表示他想喝点儿什么，于是老太太又拿来一瓶威士忌，我喝了两大口忽然觉得十分难受，乔则没事。我们的

新朋友看到我那副样子，一定感到很抱歉，因此她又弄来了一瓶桔子苏打水。我喝了这瓶水，又吃了些饼干和炼乳，觉得舒服极了，很快恢复了体力。

我检查了这所房子，发现楼上有几间布置得很漂亮的寝室。天黑如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到这里来。后来我们才发现，狙击手整夜都在监视着这所房子。

我们躺在床上，脱光了衣服，钻进洁白的被子。变化太大了，这一夜，我们是东旅中最幸运、最知足、最满意的成员。

清晨，我从难以形容的梦中惊醒，四周一片不祥的静谧。我叫醒乔，穿上还没干的衣服，拿起枪跑下楼去。我们满以为会因为擅自离队而挨批评，奇怪的是，四周一个人影也没有，连那个中国老太太也不见了。

我们抓起剩下的几听罐头，乔带上了还有半瓶的苏格兰酒，跑出了大门。

一辆小型装甲车在路上来回地兜着圈子，整个东旅也没有一辆装甲车，这肯定是敌人的。我们急忙躲进路边的壕沟，这个沟实际上是水泥甬道，我们刚跳进沟里，一阵猛烈的扫射就随之而来，敌人发现了我们。

我们沿着沟往赤柱方向跑去，我心想，可不能死在这个鬼地方。虽然我们没法摆脱装甲车，但已不像以前那样惊慌了，正当日本人下车来抓我们的时候，一支威克枪在前面的拐弯处开火了。日本人应声倒地。

这是密德塞斯营开的枪，他们正在掩护我们连往赤柱方向撤退。事情的全部经过都被他们看在眼里。

“蠢货，你们到底在什么狗娘养的地方？”这种问话是他们挂在嘴边的最文明礼貌的语言了。远东的英国士兵的语言之粗野下流是臭名昭著的。他们之所以要这样说话，并不是因为他们酷爱某种特殊的句法，而是因为他们喜欢在句子中间加上三个或三个

以上音节的粗话。

我们谢了他们，乔宽宏大度地把那半瓶苏格兰酒送给了他们。然后，我们又继续小心地沿着路边向赤柱走去。

我们排的人聚在赤柱村附近，见我们回来，并没有显出多惊讶。史密斯中尉胳膊上吊着绷带，已经从医院回来了，并成了这个排的排长。他是士兵中的勇士，是许多杰出的人物之一。我能从战场上和战俘营中生还，要归功于这些人。

史密斯放弃医院里的舒适生活，回到我们中间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但是，他的这一选择，也救了他一命。因为许多圣士提反医院的伤员在日军肆虐的时候，都被刺刀活活刺死了。（详见本书附录）

史密斯看了我一眼，说：“凯姆本，团部正需要人值班，你去吧。”作为排里最小的一个，我总要不断地反抗各种特殊的照顾。但是，这次我没反对。我搭上了一辆运水的货车，怀着复杂的心情踏上前往赤柱要塞的路。

车子在坎坷不平的路面上颠簸着，我的心情随着车子的起伏而忐忑不安。从敌人没完没了的进攻的折磨中脱身，固然大可宽慰，但是离开排里残存的战友，又使我深感内疚。我后来听说，为了反攻，我刚离开，他们就又上了山。尽管伤亡惨重，但是他们完成了任务。

到达赤柱之后，我发现这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我怀疑，麇集在这里的大群英国士兵是否见到过一个日本兵，是否打过一枪一弹。在这儿的的第一天是如此漫长，仿佛过了一年。我吃了一顿好饭之后，就到了营指挥部。指挥部坐落在兵营的第一层，兵营倚山傍崖，比较安全。起初，日本人的迫击炮还只是零零星星地打来，后来，则构成了一个密集而固定的火力网。

我的工作是在看电话，因为仅剩下的一条电话线要留给旅长和他的参谋用，特定的线供给司令部。其实，这种工作并无多大意

义，因为营部与赤柱村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直接的联系，与西旅之间的联系也全部中断。但是这工作对我却很有趣，通过来往的电话，我进一步了解并证实了，加拿大方面与英国参谋部，特别是英国旅部之间的对立关系。

那位英国旅长指挥过新界防线，这个防线有一个滑稽可笑的名字——“杜松子酒鬼防线”。我认为，新界防线的位置非常有利（虽然我没在新界呆过），可是，那里的情况却一塌糊涂，整个阵地未加什么抵抗就送给了敌人。我想，日本人一定会感到奇怪——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如此轻易地放弃新界的整个阵地，而现在却要为了争夺一个小岛拼死拼活？或许，我们的英国旅长以为他由此会成为士兵们眼中的拿破仑，事实恰恰相反。

另外，那个英国旅长习惯于指挥殖民地的军队，对我们加拿大官兵有一种骨子里的优越感，这种陈旧过时又愚蠢可怜的优越感是殖民地统治者典型的心态。毫无疑问，他有领导才能，也有不少优秀品质，可是这些好东西并没显示出来。

我们营的A连困在了浅水湾，已濒于绝望，其它的连队也疲惫不堪，没有给养。上周的战斗使我们伤亡惨重。营长霍姆中校决定让士兵休整一下，并制订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准备与西旅联合行动。旅长起初坚持要我们继续做那种无用的努力，后来他终于同意让加拿大士兵撤到这个半岛的一个狭长地带，略事休息。

能够与排里的战友们重逢令人欣慰。我们营现在所做的，是迈着沉重的步伐，跋涉到山上的要塞去。我估计，全营剩下的不超过三百人。我们只有一些冷饭和一些消过毒的水。我在队伍里找了半天，不见乔·德莱尼的影子，原来我离开不久，他就牺牲了。他是我的挚友，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听说蒋介石的军队正在向九龙接近，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然而，这种心情没持续几天就消失了。几架异样的飞机从我们的



上空飞过，我们不禁欢呼起来，向它们挥手致意。当飞机上的日本驾驶员掉过机头，朝我们扔炸弹时，一定以为底下的人是一群疯子。

许多年后，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读了史迪威将军在马尼拉塔奇曼时的传记。从中得知，蒋介石确实宣布过，他将派一支部队援助香港。但是就像他的绝大多数对日作战宣言一样，他根本没打算将其付诸实施。他和他的夫人，宋美龄女士极尽花言巧语之能事，哄骗美国的传媒，同时千方百计地避免与日本人打仗。宋氏家族的故事和他们如何榨取美国几千万美金的伎俩，已经成了破坏同盟的典范。他们在另一条战线——公共关系上取得了节节胜利，而对日本人则避之唯恐不及。

从那以后，我对各种传闻一概无动于衷了，对那些美妙的许诺则总抱着怀疑态度。可叹的是，只有温哥华证券交易所的好消息才能使我一改常态。

事到如今，即使在最大的乐观主义者看来，我们的前景也是暗淡的。这种前景并没有因为邱吉尔的那番讲话——要求我们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个人——而有所改观。一夜之间，一些声名狼藉的家伙突然变成了非常虔诚的教徒，毫不羞愧地当众祷告。尽管如此，我对“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的说法仍不能首肯。从十四岁开始，我就是个无神论者。我没能找到任何动力把自己变成上帝的信徒，这并不是因为我感觉不到害怕和恐慌，也不是因为我具有超人的勇气……。

我产生了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刚刚十八岁，还有许多人人生乐趣没有品尝。失去了它们让我感到羞愧，许多伟大的著作我还没有读，古典音乐我还没有机会欣赏，但是这些并不是真正的遗憾。我最先想到的是，我认识的姑娘寥寥无几。我回忆起和姑娘们在一起时自己的笨拙可笑，想到自己失去的几次机会，后悔和心爱者在一起时，没有采取主动；我回想起少年时代在魁北克

度过的美好时光，想象家里人此时此刻在干什么。我下定决心：如果我能活下来，我将冲破一切阻碍，去尽情地享受人生。今天我可以这样说，我以自己的有限的成功实现了当初的愿望。

我们在营地安置下来，但没过多久，日本人的迫击炮和大炮就开始对我们狂轰滥炸。与此同时，日军向英国部队发动进攻，机枪猛烈扫射，使用得极有效的手榴弹四处爆炸，日军势如破竹，英军一片混乱，只能撤退。

凌晨时分，我们再一次向赤柱退却。一路上，迫击炮和榴弹炮紧跟着我们轰炸。无论如何，这种频繁的轰炸不那么令人鼓舞，因此，我们走得很慢。当部队沿着路右边的水沟往前走时，我们的第二任营长马洛·普赖斯少校来到了路当中，他大模大样地挥动着手杖，就像在魁北克的特雷斯大街散步一样。他的行动大大地鼓舞了士气，当时我们的士气确实需要提高。

D连向前推进，对赤柱村周围山上的日军发动了一个漂亮而代价巨大的反攻。在没有任何火力支援的条件下，他们把山上的日军从被其占据的房子里赶走，从坟地上打开一条通路，最后靠白刃战夺下了几座房子。在这场战斗中D连死了二十六人，伤了七十五人，死伤人数占全连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此后发生的事，是一场噩梦。日军增援部队大批抵达。我们不知道，岛上别的部队这时已投降。迫击炮不断地猛烈轰炸我们所在的整个地区，日本轰炸机呼啸着俯冲下来，高兴得嗡嗡地吼叫着，庆贺它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厨房已被摧毁，吃的东西成了宝贝。以往的经验使我早就知道了食物的重要性，在营部时，我就把几听混合罐头（其中包括肉和菜）塞进了背包。我也因此成了连里的著名人物。水很少供应，因为日本人控制了水库。我们的弹药也十分缺乏。

当这一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排又开始向山下移动，去援助山下的防线。日本人已将大炮和迫击炮弄到了前沿阵地。我们在



大路的拐弯处看见下面的村庄里已经出现了日本兵，更要命的是，他们也能很容易地看到我们。我们等待着厄运的降临……等待着这一切的结束。夜幕降临，炮火连天，弹片横飞，炫目的曳光弹彻夜不息。

这一切终于到了尽头，战争结束了。但不是我预想的那样。一辆参谋部的汽车出现了，车上飘着一面大白旗，汽车穿过弹坑累累的道路，枪炮声停止了。车上的两名英国军官带来了一个消息——香港其它守军已于头一天投降了。这个圣诞节确实不同寻常……它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头。

直到第二天，我们才最后放下武器。但是在此期间没有了任何战斗。

我在一个营房里发现了一张床，竟然奇迹般地完好无损。我倒在床上，很快睡着了。我的真正的战斗生涯从此寿终正寝。

第二天，我们在和平之中享用了自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顿热饭。随后，我们把全部武器堆放在广场中心。来福枪已经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从入伍的那一天起，它就伴随着我，与它告别让我特别难受。我记得在加拿大时，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擦枪。开战以来，我从未擦过它，它跟我在泥里雨里摸爬滚打，从未出过毛病。

在这种日子里，每个人的精神都非常紧张，任何异常的声响都会吓人一跳。我的感情十分复杂：能填饱肚子、喝上水，固然令人欣慰，但它无法补偿放下武器的耻辱和惨败留下的痛苦；能从这场战争中活下来，虽然让人感到惊奇和振奋，但是这种心情并不能抵消勇敢的战友们战死疆场，而自己却向敌人举手投降带来的负罪感。没有枪炮的和平，被忧虑前途的阴霾所笼罩。从已做了战俘，饱受日本人的摧残的战友那里，我们了解到日军的暴虐和凶狠，前途漫漫，难以测度。

第三章 香港战俘

最严酷的老师是为人贱俘。

——俄国格言

这些青年将了解战争的真实面貌，将面对令人厌恶的现实——将军的愚蠢把士卒们的牺牲变得一钱不值。结果，士兵们奉献了最后一腔热血的殊死战斗，既与报效祖国无缘，又把这些爱国者变成了一群傻瓜。

——布鲁斯·科顿：
《林肯先生的军队》

停战两、三天后，日本人不再理睬我们。他们显然有足够的力量对付整个香港。卡车运来了饮用水，吃的东西也不缺。多数人认为战俘的生活顶多维持几个月，到那时，美国和英国就会来援救我们。蒋介石的军队再也没有人提起了。

长官告诉我们：日本军官来过了，他们非常有礼貌。对加拿大军队深表敬佩，加拿大军队的勇敢善战使之尤为赞赏。如果日本人说的是真话，那么他们在圣士提反医院对伤员的所作所为则为此做了相反的注解。

圣士提反医院位于赤柱下方，圣诞节前夕被日本人占领。日



本兵在医院里进行了野蛮的屠杀，他们用刺刀把躺在病床上的伤员活活刺死，枪杀医生，强奸护士。我当时虽然不在现场，但是几个侥幸逃出来的人告诉我们那里发生的一切（其悲惨的细节见本书附录）。

1941年12月30日，日本人把我们集合起来，让我们按原来的编制排队。至此，我们加拿大皇家部队至少有500名步兵死在要塞，130人在战场上丧生，227人受伤，伤亡率37%。我们排只剩下一半。排好了队后，凡是能走动的赤柱驻军在日本兵的押解下都上了路。我们走过那熟悉的大路，经过了曾拼死保卫过的地区，经九龙、过海湾、到达北角。令人吃惊的是，战俘的队伍是如此浩荡，从头到尾长达一公里。打仗的时候这些人都在哪里呢？

这是一个长长的忧郁的队伍，经过赤柱村，穿过棕树别墅，大潭峡和鲤鱼门，在狭窄、曲折的道路上蜿蜒而行。沿途一些藏在山上的幸存者陆续加入我们的队伍。我记得有一个小伙子，他曾被日本人抓住过，日本兵用刺刀捅穿了他的肚子，把他扔在路边等死。他爬进了一个废弃的碉堡，在里面发现了一些郎姆酒，靠着这点酒他维持了一个多礼拜。我们经过时，他从碉堡里爬出来，爬进我们的行列。人们做了一个简易担架，没人指望他能活下去，但是都轮流抬担架。后来，他竟然奇迹般地复原了。

英军服务团里有一个准尉，是个大胖子，他大腹便便，步履艰难，跟不上队伍，越落越远，成了全队的尾巴。我揣想，日本人有意让他掉队。因为他那滑稽可笑的样子，很适合作为一个典型的“殖民猪”出现在日本的宣传小册子上。就我所知，日本人在马尼拉迫害战俘的残暴行径，在这次行军中倒没有发生。那个英国准尉总算到了战俘营，一连几个月，他都没能复原。

沿途的家家户户都挂起了太阳旗，此情此景，尽管令人沮丧，但是我们知道，居民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安全。

我们这长蛇般的队伍，只有不多的几个日本兵押送，这令人感到耻辱。我猜想，日本人是有意这样安排的，他们要向中国人进一步证明，大日本皇军的威力。

那天下午天气很热，我们经过筲箕湾最后到达北角。这里是日本人进攻香港的另一个登陆地点，当地的所有建筑物和碉堡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这一次行军我们走了十二公里，到达目的地时我们又热、又渴、又累。我的全部衣服只有一件衬衣和一条从赤柱弄来的英军短裤。但我的背包里还有几听罐头和一些饼干。

我们的新家——战俘营到了。战俘们排着队，依次走进营门。我站在较靠前的地方，发现看门的日本卫兵挨个儿没收战俘的手表，我迅速地摘下表，塞进粗布袜子里。这是我做过的可数的几件聪明事之一。后来我用这块表做成了一桩很不错的买卖。

北角在城郊，有一些为三百个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修建的临时住所。战争把这里破坏得很厉害，有几个草棚子已被烧成了灰烬。没被烧的棚子已洗掠一空，只剩下一个空架子。日本人则雪上加霜，把这里当成了牲口棚。到处是马粪，臭气熏天。更糟的是，这个棚屋区的一头是个垃圾场，而屋架子上的陈旧废物没遮没挡，成了苍蝇的乐园。棚屋区的另一头横七竖八地躺着中国人的尸体和被抵抗者打杀的日本人的宠物。

第一个月在混乱中度过，营地里没有供水设备，水只能从别的地方用卡车运来。吃的也靠运送，但是没有准点。来北角的头两天，什么吃的也没发，所有的情况都令人黯然。

住宿条件也很差，起初所有的英国人、印度人、加拿大人都混在一起。在一间住30个难民的棚屋里竟塞进了我们200人。窗上没有玻璃，有的棚屋的屋顶开了大洞，我们多数人没有毯子，水泥地上更不可能出现美锐斯提床垫。十二月的香港空气潮湿，天气很冷。

营地里没有任何排便设备，没有马桶，我们只能蹲在海边的



防波堤上大便。我是最先感染上痢疾的人之一，在铁丝网下我度过了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生命之潮至此降到了最低点。海湾里仍旧漂浮着许多尸体，我发着高烧，身体非常虚弱，不得不紧紧地抓住铁丝网。肚子里上下翻腾，一阵阵的呕吐感不断袭来，大肠杆菌引起的腹痛把我折磨得难受极了。我看了一眼下面的海水，一张泡得膨胀起来的死人脸正在朝我飘来，我大吃一惊，不禁毛骨悚然。香港的黎明寒冷而潮湿，它加剧了因痢疾引起的一阵阵寒热，也加深了我的失望。

印度旅的军医，高恩博士向我伸出了援助的手，他给我一些珍贵的磺胺，这些药救了我的命。他后来死在另一个集中营。很久很久以后，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我给了他一个小小的回报。

当我第一次在温哥华做临床手术时，遇到一个急需动手术的年轻的英国女士。她刚到加拿大，既无现金又无保险。她的名字和高恩博士一样，真是无巧不成书，原来她就是曾经救过我的高恩博士的女儿。我有幸给她做了手术，并见到了她的母亲。这件事对这位军人的遗孀来说，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我们团里一些幸存的军官和老军士们为战俘们做了不少好事，他们有资格得到应有的荣誉。在北角，日本人让战俘中的军官管理集中营的内部事务，很少干涉他们。这些军官组织了几个索物小组，这些组织的工作很有效率，他们从附近的军营里要回了大批食物和其它物品。他们还得到允许，组织了别的小组，寻找战友们的尸骨，将其埋葬。

一个月以后，大多数英、印战俘被押往九龙，最后北角只剩下了加拿大人和一些荷兰潜艇兵。

几周之内，公共厕所建起来了，经过修理抽水马桶也能使了，厨房也有了，所有的材料都是索物小组要来的。这一时期，集中营里有一种合作精神和纪律性。在后来的集中营里，尤其在日本，这些好作风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狗咬狗”。

我永远感激一个真正的朋友，步兵 J. S. 希基，大家都叫他曼尼。我记不起当时不知怎么搞的，我既没有鞋，也没有靴子。脚上还长了很严重的水泡。曼尼不但是个天才的音乐家，而且还是个技术高超的工匠，他给我做了一双便鞋。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材料和工具。直到离开香港，到达日本一年多，我仍保留着这双鞋。

曼尼在医院工作，所有的痢疾患者都被送进了这所医院。感谢上帝，在我得痢疾时还没有这所医院。曼尼曾经领着我在这所医院转悠过，这里原来是个仓库，位于集中营的一头，里面很黑，光线暗淡，还有一种怪味。厕所是用装花生油的旧桶做成的。凡是得过痢疾的人都知道，痢疾病人要频繁地光顾这些花生油桶。我想，曼尼和其他在这儿工作的人都应该获得勋章。

尽管调走了不少人，北角集中营仍是人满为患。伙食很差，每人每天只能摄取 900—1000 卡路里。但是除了几个病死的以外，当时集中营里还没有流行严重的传染病。大多数人仍旧相信美国和英国几个月之后就会将我们救出苦海。集中营里士气很高，洋溢着乐观主义情绪，而我却乐观不起来。我想，我们这一代加拿大人很少有人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饥饿。这里所说的饥饿不是正常的食欲得不到满足，也不是连续几天因得不到食物而忍饥挨饿，它是在长时间里因为你的胃接受的只是少得可怜的食物，而引起的一种深深的不间断的痛苦，以及对未知的明天的忧虑。

这可能也是一种黑色幽默——人们的谈话题目总离不开食物。这种现在看来不可想象的事，在当时却是人们日复一日，时复一时，没完没了讨论不休的问题。人们研讨各种各样的老食谱，甚至创造出新食谱。我们排的一个家伙严肃地提出，他要把稻子引进加拿大。这种想法并不算太离谱，因为那时的加拿大水稻只是做甜点心的原料，不像现在是我国的主要农产品。

食物从大木桶里分配到各种各样的不寻常的容器里，很少有



人还保留着原来的军用饭盒，茶缸子更是罕见。多数人用的是罐头盒，但也有人用形状古怪的瓷盘。一双双锐利的眼睛紧盯着分饭人的勺子，看他是否有偏心眼。我有一个铁皮缸子和一个勺子，这两件东西一直伴着我到战争结束。在北角，我用一个旧饼干盒吃饭，后来到了日本，我用它换了一个美国饭盒。

食物匮乏引起了一个没有多少幽默感的结果——令人疼痛难忍的“电脚”。这是一种神经炎，是因缺乏必要的维生素和蛋白质引起的。症状是腿上感到尖锐的刺疼，但脚上的刺疼更甚。任何重量压在脚上都会使痛苦加剧，即使是最薄的毯子盖在脚上也会疼痛难忍。为了减轻痛苦，有的人将双脚泡在冷水之中，如果他们十分幸运，能找到水桶的话。但是我觉得这样做只能加剧病情，因为冷水会将皮肤泡软。奇怪的是，虽然随着伙食的改善，神经炎很快消失，但是在以后很多年里，我睡觉时仍把双脚伸到被子外面。很显然，这是心理作用造成的，很多战俘都有这种经验。

这种脚气带来的严重浮肿，也在脚面和踝骨处显露出来。此外还有因心力衰竭引起的气短，我估计，就我们的战俘营而言，这种病在日本比在香港更常见。维生素B的缺乏还引起了一种更奇怪的病，此病几乎无人幸免，我们称之为“草莓球”。其症状是皮肤表面出现蜀黍红斑，这种红斑主要长在阴囊上，阴囊由此变红、变湿、奇痒难忍。为了寻求解脱，这个位置适于采用的解痒办法，诸君可以自己想象。

食物匮乏还引起一个不很普遍的结果，即丧失平衡感。我不知道这种病的病理，它可能并不直接作用于内耳，因为患者很少失聪，这与那些因迫击炮轰炸造成的耳鸣及高音失聪不同，后者直接作用于内耳。平衡感的丧失可能与营养缺乏有关，营养缺乏导致了脊髓神经的损坏。得了这种病的人，有时即使扶着拐杖也不能走路，有的能东倒西歪地行走，但经常跌交。

失明的病例有一些，更多的是视力的部分丧失。有时即使补

充上适当的营养，视力也无法恢复。角膜溃疡更为常见。

尽管集中营里食物匮乏，抽烟却十分盛行。香烟总是供不应求，以至于有些人不惜用本来就很少的饭票换烟抽。这种作法等于把生命间接地换成了香烟。有的人为了争夺卫兵扔掉的烟蒂而老拳相向。在集中营里，我认识的两个吸毒老手，都成功地戒了毒，而某些瘾君子却不能戒烟。我们的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讨论烟草是否算毒品的问题，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最好再成立个委员会讨论讨论水是不是湿的。

可能除了极个别的特权人物，集中营里不存在性的问题，也许，下面的表述更准确些——性生活的缺乏在这里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我难以理解，在民众长期营养不良的第三世界国家里，为什么还会有那么高的出生率。在集中营里，隐私权毫无保障，同性恋者因此失去了勇气。

我和比尔·M成了好朋友，他只比我大一点，但是他有丰富的经验。他告诉我，他在一所很著名的教养院呆过。尽管如此，他具有一种非常迷人的个性，他长得英俊，人又聪明，读了不少书。当我们驻扎在活勒卡特时，他从附近的法——加军官食堂里偷了一箱威士忌。他头戴羽饰装模作样地用偷来的酒款待全排官兵，我们度过了一个不平常的苏格兰式的夜晚。

他曾偷了一只手枪，并把它带进集中营。他的一个朋友，美国佬伯恩斯弄到了一只左轮。集中营初建时，出入较容易。他和他的朋友夜里溜出去干过几次杀人越货的勾当。一次外出远征，他们正在偷仓库里的东西，被一个警察发现，他们杀了警察。因为我们交上朋友是在这些恶作剧之后，所以这些征伐探险我都没赶上。

他喜欢跟我谈他回家后，将如何抢劫多伦多商业银行的某个分行的行动计划。他毫无保留地讲述了计划的各个细节。我相信，



他如果干的话，一定能得手。

战后，我在多伦多的时候，参观了那家银行。我发现比尔的计划十分完备。如果他付诸实施的话，抢这家银行真是易如反掌。不幸的是，白喉夺去了比尔抢任何一家银行的机会。

他和我在北角计划过一次重大行动。这次行动既让我感到骄傲，又让我感到羞愧。在集中营里有一个很活跃的黑市市场。流行的商品通常是香烟和果酱包。集中营里有个黑市“大腕”，住在棚屋的一头，他床底下有一个装满货物、又大又沉的箱子（当时棚屋里有不多的几张床）。

一天晚上，我们等他睡熟后，悄悄把这个大箱子拉出来，然后把它抬到棚屋外，等哨兵过去后，快速地抬着箱子溜进新设的洗澡间。比尔相当准确地计算过这个时候没有人来，卫兵也不可能来。我们把箱子里的东西统统放进从美国佬伯恩斯那里弄来的棉布口袋。箱子腾空后，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口袋藏在洗澡间。比尔坚持把空箱子放回原处，我觉得这实在有点多余，但还是照他的话办了。我们抬着空箱子又溜回“大腕”的床底下，事情安排妥当之后，我几口就吞下了弄来的三个果酱包。

第二天早晨，在人们的渲染、夸张下，这个恶作剧在集中营里沸沸扬扬地传开了。参谋副官威胁说，干此事的人犯一旦查获，一定严惩不贷，就是将其交给日本人也在所不惜。他们开始搜查棚屋，我胆战心惊，十分忧虑。比尔则自信得很，再三向我保证没事，因为他已经想到会有这一手，早就做了防备。果然，我们始终没被发现。偷来的战利品，我们明智地与美国佬和几个值得信赖的朋友细水长流地共享。若干年后，我在蒙特利尔遇到了那个事件的苦主，向他承认了我在那个盗窃案中扮演的角色。他宽宏大度地原谅了我。

不管从哪方面讲，比尔都是我们排里最杰出的战士。当人们惊慌失措时，他总是出奇的冷静。他对汤姆冲锋枪的鉴赏力是第

一流的，这种枪他用得最好，当初学会使用这种枪时，他十分得意。我曾经坚决主张，军事当局应该承认并表彰他在战争期间表现出的勇气和创造性。然而，一个年轻士兵的看法在授予奖章时并不被重视。

排里另一个我很佩服的家伙是个法裔加拿大人，叫伯纳德·卡思顿盖。他年纪不大，身材矮小，但是相当顽强。打仗的时候就像个墨西哥土匪，胸前挂着沉甸甸的子弹袋，满不在乎地四处转悠。我相信，他的勇敢是大家公认的。

在集中营里，我帮助他学英文，他读起书来废寝忘食。他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但是，我在蒙特利尔再见到他的时候，却悲哀地发现他已经成了盲人，再也不能读书了。然而，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帮助别的盲人的活动之中。

到北角大约半年后，日本人把战俘编成劳工队，扩建启德机场的跑道。对于香港来说，那时的启德机场比现在更具有威胁性。日本人开始只选那些身体合格的人修跑道，去劳工队干活的战俘只有一小队。后来，一方面劳工队的人数增加，另一方面，符合条件的人数日益减少，如何满足劳工队的要求成了一个难题。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使用扁担时的情景。扁担两头是两个装满土的“苦力筐”，干这种活要有相当的技术，挑着重担的扁担在肩膀上摆成一定的角度。在西方，人们宁愿使用独轮车来干这种活儿。因此，我们没有几个人能正确掌握这种一颠一颠的挑担步法，在泥泞的路面上顺利地行走。我们的窘境惊动了日本卫兵，一个卫兵曾经让我拿着他的步枪，由他挑担子给我做示范。也许，我们练习得还不够。

虽然人们会因为“故意破坏”等莫名其妙的罪名挨打，但是我还是喜欢在劳工队干活，这里的工作条件毕竟比我们在日本新泻好一些，那里的情况简直令人绝望。上下工时，我们的队伍七零八落地穿过城区，街道一片荒凉，与我们初到香港时的景象形



成鲜明对比。曾几何时，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在弥顿道上，人们热烈地欢迎我们，城区街道热闹而繁华。这种对比尽管令人黯然神伤，但是能走出铁丝网，看看集中营之外的天地毕竟让人畅快一些。劳工队里的活儿不算太累，我们又总是想方设法地泡蘑菇，放慢工作进度。

我们大多数人都没干过搅拌水泥和沙子的活儿，日本卫兵经常被我们的瞎对付气得火冒三丈。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日本兵不注意，我们就尽量地多放沙子少加水泥。后来，我们听说第一批使用这条新跑道的飞机因陷进了路面而撞到了一起。这个故事可能不足凭信，但我们希望它是真的。

劳工队中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队里的头头已经与当地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游击队把日本人扣留的集中营的药品偷偷地送给我们，劳工队中的秘密组织还拟订了盟军进攻香港时战俘集体逃亡的计划。皇家步兵副司令杰克·普赖斯上校是这个组织的核心领导。不幸的是，这个计划后来被日本人发觉了，结局极其悲惨。

加拿大皇家通讯兵团的劳格里特中士是这个组织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任务是给普赖斯上校传递消息和材料。一天，他突然被令人恐怖的日本秘密警察逮捕，关入单人牢房，并遭到严刑拷打，但他始终没有供出普赖斯上校。后来，他被判处15年监禁，关押在广东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如果劳格里特招供，那么，普赖斯上校和其他与这个组织有关的加拿大军官就要像领导这次行动的三名英国军官一样被处死。战后，劳格里特舍己为人的英雄行为得到表彰，并被授予勋章。

谣言是集中营生活的必需品，在北角集中营的早期更是如此。当时，在战俘中流传着一个极其稀奇古怪的谣言——加拿大和日本将在公海上做一笔交易：用加拿大战俘换取日本西海岸的渔船。一个正常人会相信这种独出心裁又荒谬绝伦的编造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我估计集中营里的绝大多数人一度完全相信了它。毫无

疑问，这是一种疗法。当时，我坦率地说明了我对这个谣言的看法，人们却不以为然。这件事告诉我，如果你对生活还未充分理解，你就应该闭上你的嘴巴，少说为佳。显然，我说了不该说的话。

战俘生活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痛苦——不相信自己曾经享受过自由的生活。这是战俘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过去似乎是不真实的，仿佛是一场梦；未来越来越模糊不清，越来越捉摸不定。我不是那种总是相信自己能熬过来的人，因此对我来说，前途显得更加虚无。

一个能言善辩的战俘认为，我们这些人并不是现代战争的产物，我们的状况只能与古代的奴隶做比较。我们就像是雅典人的俘虏，与当年叙拉古采石场做苦役的奴隶没什么不同；也可以说，我们是某个沦陷的城邦中残留的男人。他说，这类人的感情历史文献从来没有像样的记载，因为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我们将在时间的推移中得到那些古代的战败者期望得到的东西。

在北角集中营初建时期，常有些中国人从临街的铁丝网前经过。为了从邪恶中获得乐趣，日本卫兵经常无缘无故地拦住某个苦力，把他捆在柱子上，用刺刀刺他。他们做这种事只是为了赢得围观的日本兵的高声喝彩和狂笑。我至今仍痛苦地记得，一个中国妇女带着她的孩子从防海堤上往下走时，母子俩惨遭日本兵杀害的情景。

在日本人占领的土地上，这种丧失人性的行为恰恰反映了日本军人的精神常态，他们对此已习以为常。我对此深有体会。然而，日本人居然想用这种手段征服人心，使之相信“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钦佩武士道精神，这真不可思议。面对着日军的暴行，即使我们中间最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也不能不在忍饥挨饿之外平添几分悲哀。

随着时间的流逝，营养匮乏的恶果越来越显著。我意识到，我



们将在这个地方被长期关押下去。生存下去的希望十分渺茫。比尔有个想法——如果我们能够到达九十公里以外的海岸，就有可能遇到好心的中国人。据他说，一些运送棺材的舢板固定往返于附近和那个海岸之间。他主张先与划舢板的渔民取得联系，登上舢板后就藏进两口棺材内，一旦到达九十公里外的海岸，我们就会得到游击队的帮助。

我盘算着这个计划，觉得前景十分暗淡。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实行这一计划，恐怕连第一个目标也达不到。即使我们躲过了日本人，也难逃中国土匪的手掌。我猜想，比尔与游击队的联系仅仅存在于他那丰富的想象之中。

可是在当时，我们一心想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为此，我们投身于训练之中，每天晚上绕着集中营跑步，这对于我们本来已经很虚弱的身体是一个严峻挑战。另外，我们还得省下一些干粮，战俘的定量已经少得可怜，要做到这一点同样相当困难。幸亏我们的逃亡计划流产了——四个掷弹兵在我们行动前的几个星期逃跑了。集中营的看守一下子严了起来。那四个逃亡者还没到大陆就被抓了回来，他们被处决了。

1942年5月，日本当局强迫全体战俘签订了一个保证不逃跑的文件，文件上规定：只要有一个人违反规定，逃出集中营，剩下的战俘就将受到严厉的报复。这个保证书和日本人的威胁，使我的情绪降到了最低点，一连几个月打不起精神来。几个军官知道我和比尔一直计划逃跑，误认为这全是我的主意。1942年8月，实云道医院需要六名护理员，我被选中。我相信，这个美差是排长史密特给我的。他的这一决定不但救了我的命，而且在无意中极大地影响了我对毕生事业的选择。

实云道陆军医院地处山区，环境优美，在战争中只受到一些轻微的损坏，一所军队医院所应具备的设施，这里有许多都保存了下来。

从北角调到这里，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们有了床，还有了床单和蚊帐。干净的衣服和盥洗设备也一应俱全，甚至食物也比集中营好。尽管如此，营养匮乏症仍然存在。

我到医院的头一个礼拜就病倒了，又传染上了痢疾，不得不住院。在香港的地方医生安德森博士的精心治疗下我得以痊愈。战后，安德森博士到了英国剑桥当时我也在那里，借此机会我向他表示了我的感谢之情。他的儿子曾经参加过地方的政治活动，现在则以反对油船污染而著称于世。

虽然我是个大头兵，但我还是学到了不少护理病人的知识，同时，我还学会了如何照料快死的人，因为许多病人已经奄奄一息。

我调到实云道陆军医院不久，日本人就关闭了北角集中营。所有的加拿大战俘都被转移到九龙的深水埗。不幸的是，这时正在流行白喉，日本人不给任何抗菌药。我们的人死了很多人，其中有比尔·M和彼尔·巴克利。

在这场流行病快过去的时候，日本人发了慈悲，把几个晚期白喉患者送进了实云道医院。通过这几个病人，我对白喉有了初步认识。如果不予治疗，这种病是极其无情的。

从这场白喉的流行中，也可以看出魁北克公共健康标准之可悲。当时，在皇家步兵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打过白喉预防针，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军队例行的预防免疫工作中白喉的预防居然不在其中。我就没打过任何一种白喉预防针，虽然我护理过许多重病号，但我从未传染上白喉。回想起来，我怀疑当时我腿上出现的、持续了好几周的两块溃疡可能就是白喉的表征。营养匮乏会引起溃疡，许多晚期白喉病人的皮肤上也会出现溃疡，特别在阴囊、会阴处，鼻子和脸部也有少量溃疡出现。让人沮丧的是，有的患者经过一场严重的发作，好不容易才恢复过来，可是几天之后却被白喉引起的心脏病夺去了生命。

一些严重的营养匮乏症患者骨瘦如柴，他们已经病到了既不



想吃、又不能吃的地步。医生发现他们的肠子已经萎缩，肠壁变得非常之薄，以至于无法吸收任何营养。我们只能一连几个小时地慢慢地喂这些病人营养品。

也许对我个人来说，在实云道医院的最大收获就是对医学的了解，尽管这种了解是粗浅的，但是在日本，就是这点知识拯救了我的生命，它还使我走上了学医的道路，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唐纳德·鲍伊上校是这所医院的指挥官，他是个很有才能的外科医生，对于他的职业来说，他的性格似乎过于温和。但是，他却很善于对付日本人。他的工作极其出色，却始终没得到皇家军队医疗团的认可，也没有得到任何提升。他写过一本十分吸引人的自传——《香港战俘中的外科医生》，这本书描述了实云道医院在战争期间和日军占领下的历史。

我特别感兴趣这本自传中写到痢疾的一段：“1942年9月23—24日，晚上值班期间，痢疾科病人排便达232人次。当时在这个部门值班的护理员共两人。”我就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尽管这所医院绝非乐园，但比起集中营来则胜似天堂。

实云道有个图书馆，按战前的标准是相当不错的。我充分地利用了这个图书馆，书籍为我展示了另一个世界。以前，我从来不是一个热心的读者，原因之一是，在当时魁北克没几个像样的图书馆。罗马天主教堂禁止卡内基基金会在那里创办图书馆，因为这种图书馆里可能会出现某些教会的禁书。我上高中时，学校里有个图书馆，但藏书极有限。我们家又没钱买书。

在这个图书馆里，我读了许多古典作品和大量的通俗读物。狄更斯和马克·吐温是我最喜欢的作家。

在医院里，我在戴维斯领导下工作。他是皇家医疗队的下士。他不仅把我培养成了一名护理员，而且还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思想。他来自英国南部的威尔士，大家都顺理成章地叫他戴大夫。我们

成了十分亲密的朋友，可我却记不得甚至不知道他的全称是什么。

他生长于煤矿之家，他给我讲述过他和他的家人过的苦日子。他完全靠自学成材，但是在我认识的人中，他是读书最多，知识最渊博的一个。这样的家庭环境，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共产党人，他总是不失时机地向我灌输共产主义的思想。关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问题，我几乎在半个世纪之后才有所领悟。我很欣赏温斯顿·邱吉尔对这两种主义的评论：“任何有良心的年轻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任何有头脑的老年人都是资本主义者。”

戴大夫还教我打桥牌，他不但是桥牌大师而且是天生的老师，所以，我们很快就成了比赛中的冠军。在一些稀奇古怪的赌博中，我们也独居鳌头。戴大夫还是一名技艺高超的小偷，这一手我也很快地学会了，如今，即使在我们这个富裕繁荣的国度里，这门技艺也没有失传。总的来说，在医院里我们过得非常愉快。

在娱乐方面，我们医院里可谓人材济济。只有英国音乐厅才可能拥有(或承认的)歌唱家和歌舞剧演员就在我们中间。另外还有几个才艺卓绝的乐器演奏家。这里除了钢琴之外。还有几个弦乐和铜管乐器。每周的音乐会都欢快热闹。我试着写诗，多数作品是描写战俘生活中的某些趣事。这些诗一首也没留下来，这对于爱好文学的后人来说实在是值得庆幸的事。

圣诞节前夕，我们每个人都收到了红十字会寄来的包裹。对一些人来说，这是救命的礼物，对所有的战俘来说，这是一种精神慰藉。每个包裹里都有一些巧克力、果酱、乳酪、速溶咖啡和糖，还有一听黄油和一听肉。个别人在一、两次狂欢中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吃光，大多数人则细水长流，吃了两个礼拜。我们这些战俘对红十字会都十分尊敬。不幸的是，日本人偷了许多包裹和大量食物。

圣诞节过去不久，一颗硬挤出来的智齿把我的腮帮子弄得又



肿又疼。我病倒了，发着烧，我以为自己得了疟疾。参谋中有一个年轻的牙医——弗雷泽上尉，给我打了局部麻醉，用很有限的工具拔掉了那颗引起麻烦的智齿。他对我的体贴和关照使我终生感铭。他为人亲切，常和我下棋，是我的棋友之一。

大约这个时候，美国开始轰炸香港的码头和海湾里的船只。我们用欢呼声迎接从头顶上飞过的美国飞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希望。日本人对我们的表现十分恐慌，他们威胁说，谁再对飞机表示欢迎，就开枪打死他。但是我们仍旧在暗地里为美国的轰炸叫好。戴大夫的一个朋友藏着一台收音机，可以听到外部世界的消息。英国 BBC 广播电台对这次袭击的夸张渲染让我们丧气；值得安慰的是，与日本人对第一次袭击启德机场时的吹嘘比起来，英国人要逊色得多。当时，日本人仅仅摧毁了五架又老又破的飞机，可他们却把这点战果吹上了天。经验告诉我，任何战争新闻都不可信。

1943年7月前后，我不得不离开实云道医院，与那里的幸福生活诀别。除了安德森博士之外，我与那里的朋友们，那些我深深怀念和感激的医生、员工从此音讯隔绝。我不知道戴维斯大夫后来的情况如何。如今，他是否会成为撒切尔夫人坚定的支持者？

在生存空间和生活设备上，深水埗集中营比北角好得多。我刚到那儿的时候，因为还有不少红十字会送来的食物，所以伙食有了不小的改善，不但比实云道医院可口，而且更有营养。

像所有的集中营一样，深水埗的个人卫生也很糟糕，几乎人人都有虱子。人们的业余时间都用在抓虱子上，先从衣缝里找出虱子，然后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挤死它们。这种活动成了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必修课。

臭虫也很讨厌，它们让你无法睡觉。被压扁的臭虫发出的那种令人作呕的气味我至今记忆犹新。

集中营里的翻译中加野井上，战俘们都称他为“卡鲁姆波来

的那个家伙”，因为他生长在加拿大的卡鲁姆波。像许多加拿大籍日本人一样，他被忠于日本政府的父母送回日本上学。他的身材比其同胞高大，相貌英俊，又很聪明，但是人坏得出奇。在加拿大他以黄杂种名世，在香港他以高级走狗著称。比起多数卫兵来，他对战俘更凶残。他制造了许多酷刑，是造成很多战俘死亡的罪魁祸首。作为一个如此恶贯满盈的加拿大人，战后，他被战犯审判法庭判处绞刑，在香港执行。

日军上校铃木是这里的指挥官，大家都管他叫“猪”，因为他不仅身体肥胖，而且在其它很多方面也具有猪的特点。他穿着高筒皮靴，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军刀几乎拖到了地面。汗水顺着脖子淌到敞开的白衬衫的领子上，滴在军服上，一付滑稽可笑的模样。

他战前就住在香港，像许多香港的日本居民一样，香港沦陷后，他摇身一变成了军人。在掌管集中营期间，他生活奢侈，积极从事黑市交易。我们的口粮和红十字会援助战俘的物资都成了他从事黑市交易的资本。

这些人为日本的情报机构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估计，在香港的日本情报机构比我们最高司令部掌握的情报要多得多。令人不解的是，有着许多情报来源的英国情报网得到的情报竟然错误百出。

很显然，许多香港的日本居民肩负着间谍的使命，他们为日本领事馆工作，为铃木所豢养。除了这些居民外，铃木还招募湾仔的妓女以及与军队关系密切的人做间谍。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战前，一个在半岛酒店当理发员的日本人，香港沦陷后，马上穿上了日本海军少校军装，摇身一变成了赤柱俘虏营的司令。香港沦陷前，日本商人在九龙的货栈里已经画好了香港防御工事的具体位置，这些情报为日军摧毁香港的炮火网提供了准确而有效的服务。

“猪”喜欢参加战俘们举办的集中营音乐会，我只去过一次。演出的质量相当高，音乐会从哪里弄来那么好的服装、道具让人难以想象。音乐会组织得如此成功主要归功于简·索利克的活动能力和创造性的想象。他是个波兰人，生长在哈尔滨，战前来到香港，在香港志愿防卫团里当列兵。战后，他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最后成了 B. C 大学的工作人员。我在那里见过他，不是作为大学生，而是作为朋友。

这种音乐会极大地鼓舞了战俘们的士气，在一、两个小时中战俘们的心灵被带出了铁丝网，飞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只在深水埗呆了几个礼拜，那里的事只记得一鳞半爪。我们排的弟兄们都已经被日本人用船运到了日本。一个神乎其神的谣言说，他们登上一艘白色巨轮，每人都发了一个红十字会寄来的包裹，在“日出之国”受到了丰厚的款待……。另一艘运送战俘的船正准备起航，这一次将有五百名战俘被送到日本。尽管我对这种谣言嗤之以鼻，但我仍希望成为这五百人中的一个，况且，我别无选择。

事情的详细经过我记不清了，我的朋友，鲍勃·曼彻斯特记得比我清楚。他是这样向我描述我们是如何被选中的：“你可能还能想起来，那一天天气晴朗，我们沿着集中营的路边排成一排。凡是被叫到马路另一边的战俘都有资格参加这次夏季度假旅游……费用全免。太棒了！每个人都渴望入选，但被点名的只有五百人。”

我们被分成两组，大多数英国人和香港志愿兵编在一组，加拿大人和荷兰人编在另一组。

我们最后一次行进在弥顿道上时，大家的心情十分快活，皇家步兵又聚到一起了，我们用口哨吹起团歌“65”，戏弄日本卫兵。这种乐观主义是盲目的——我们中间有三分之一的人死在了日本。

此时是 1943 年夏末，日本人允许我们带上原有的以及可以弄



到的任何衣服。有人还保存着加拿大军队的战地军装，这种衣服可以御寒。我只有一条棉裤和一件从实云道医院偷出来的棉法兰绒睡衣，这件睡衣做内衣挺不错。

我们到了码头，等待我们的并不是如某些人所希望的白色巨轮，而是一只又小又脏的运煤船——“万龙丸”号。这只船上有两个货舱，条件相当恶劣。我们的一组，多数是加拿大皇家步兵被分到这只煤船的前舱。这个舱的前端还堆着一些煤，因为空间狭窄，我们连躺的地方都没有。船舱里没有厕所，大小便只能在木桶里。桶满了，吊到甲板上去。“玛丽女王号”从来不是给我们这些人准备的，我还记得在“艾瓦提”号上，我们一个个弄得脏兮兮的情景。

吃的和淡水由日本人用大木桶给我们吊进舱里。许多人晕船，吃不下饭，借此机会，那些长期忍饥挨饿，不晕船的人们算是吃上了饱饭。舱里光线昏暗，又没地方伸展，但仍然有人打起了扑克。不打牌的，只能坐着，凝视着钢板制成的舱壁。但是，大多数人精神奇佳，人们说起在伐木营地吃过的美味的早餐，描述美国实行禁酒时的美妙时光——只用一百美元，就可以在夜里越过边境买到一雪橇酒，……那慷慨豪放的纽芬兰姑娘也成了人们的话题。

上船的第二天，日本卫兵发了慈悲，白天打开了舱盖，那些能憋住大小便的人们可以借此机会爬上甲板去上厕所。厕所在船尾，要使用这个厕所必须得到日本卫兵的允许。卫兵要求那些想大小便的人动作麻利、迅速，懒的用枪托打人的日本兵在甲板上站成两排，用鞭子抽你，催你动作快点。一到了晚上，舱盖就被盖上，因此，每天早晨舱里的空气十分污浊。由于没有盥洗设备，实际上，舱里空气的污浊程度每天、每小时都在加剧。

船到台北后，我们的情况得到了一点缓解，日本兵允许我们爬上甲板，享受一下水龙头喷射的海水浴。穿着白衣服的卫生检

验人员上船给我们体检，往我们的肛门里插进一个玻璃管，大概是检查阿米巴痢疾。可以肯定，这是一种走过场的检查，因为此后没有一个人听到有什么结果。我相信，我们中间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患有痢疾。日本人对传染病有一种病态的恐惧，这种走过场的检查似乎很让他们心满意足。

我们从台北起锚，经由日本内海驶往大阪。能够安全抵达总算万幸。在我们之前乘“里斯本丸”号前往日本的分遣队，被美国潜艇击沉，死亡惨重。那些企图从舱里逃出来的战俘，大多被日本兵开枪打死。当我们困在船舱里，每天只能面对舱壁的钢板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真不是滋味。

离开台北不久，我们也着实在水下惊慌了一阵，所有的舱盖都被盖得严严实实，日本卫兵警告我们不许出声，在这种紧急的时刻，我们就像陷阱里的老鼠，干着急却一筹莫展。直到几架飞机从船上飞过之后，危险才算解除。

大阪到了，天正下着蒙蒙细雨，我们拎起那可怜的行囊走下跳板，汇成了一个色彩斑驳的人流，没有两个人穿同样的衣服，人们头上的帽子更是形状各异。这种种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接管我们的委员会成员，一个个穿着医院的白大褂，戴着外科医生的手套，手持喷雾器，把我们每个人从头到脚喷了一通。大概经过这么一喷，日本圣洁的土地就不至于被我们玷污了。他们喷的可能是碳酸溶液，来不及闭上眼睛的人，要难受好几天。

我们排成一排报数，报过几次之后，一个很胖的年轻中尉给我们训话。他的英语讲得又流利又准确，很可能是个混血儿（当时有很多加、日和美、日的混血儿在日本军队中服务）。他大喊大叫地向我们发号施令，其喊叫的大意是：我们必须忍受死亡的痛苦，遵守每一个命令。我们必须为日本工作，以击败正在走向崩溃的美国人。这场战争将持续一百年，日本将取得最后的辉煌胜利。投降是军人最大的耻辱，战俘一钱不值，等等。几乎没有一个商会



来欢迎我们，我们并不感到沮丧，因为以前我们对此早有所闻。

训完了话，我们列队而行，更准确地说，我们被驱赶着穿过狭窄的街道往火车站走去。旁观的日本人呆呆地看着我们，一个模样古怪的老太太朝我们吐了几口唾沫。但是大多数人对我们并无明显的敌意，没有人挥舞英国国旗。

第四章 没有艺妓，没有樱花

如果在战士的背包和战俘的镣铐之间做一选择，前者就不会显得那样沉重。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

日本人把我们分成了两部分，看着另一半人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心中涌起一种难言的感情，离去的一半人中有许多同志从此与我们永别了，另外一些人几年之后才得以见面。

我们三百个加拿大人冒着蒙蒙细雨来到火车站，登上了指定的客车。在运煤船的底舱完成了我们的海上旅行之后，我们以为给我们准备的火车也只能是闷罐子。令人惊奇而高兴的是，等待我们的居然是两辆客车。我们分别登上为我们准备的专用车厢，别的车厢里是日本乘客。

车上的座位比加拿大的客车小，而且相当硬。但是海路的颠簸使这里成了天堂，大家疲乏得很，尽管车窗大开，人们还是很快就沉沉睡去。我们不知道自己将被带向何方，顽固而偏执的日本人从不向我们透露任何消息。

第二天早晨，火车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这个地方看上去像个小城镇，日本人不准我们下火车，甚至不许打开车窗。但是像往常一样，总有人能发现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这里所有厕所的

窗子都不挂窗帘，车外站着不少日本人，他们肯定很纳闷，这列挂着窗帘的火车装的是什货？我们则急于冲进厕所，而厕所已经是人满为患，患慢性腹泻的战俘们都在等着上厕所。

经过一番迷惑之后，我们才弄明白，此次停车的目的是补充食物。我们在日本吃的第一顿饭好得令人吃惊，在市民的帮助下，卫兵把一个个木制饭盒递给我们，饭盒不大，里面装着米饭、咸鱼、海菜和一双小小的竹筷子。这几样东西在饭盒里摆得很好看。我们三口两口吞下了这顿早餐。午饭的食谱和早晨一样，我觉得这个开端不错，是个好兆头，将来的日子会更好一些。这一次连我也成了乐观主义者。

当时，有一个传得很盛的谣言，说我们将被安置到一个模范战俘集中营，那是个养牛场，我们将在那里工作。日本人这样做是为了堵红十字会和全世界的口——你们看，日本对战俘多么优待——我始终无法明白，当上战俘以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谣言？传播谣言的人们除了美化将来之外为什么对别的事一概不闻不问？当初我们在香港整队上船时，就有一种引起严重争论的说法：我们上的船将是一艘标有红十字的瑞士巨轮。

也许，不知道真实情况更好。火车实际上正开往新泻的5—B战俘营，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这个战俘营都是日本最坏的一个。有一段时间它与东京隔绝，集中营的日本指挥官拥有绝对的权力。更倒霉的是，第一、三任指挥官具有严重的心理变态，绝对权力加上病态人格使集中营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得惊人，比日本其它地方的战俘营要多的多。在这个所谓的樱花、艺妓和菊花之邦，这个集中营为我们拉开了痛苦和不幸的序幕。

当天下午，火车驶入岔道，下车后我们在站台上排成一队。一大群日本人呆呆地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是外星来客。我们被领出站台，几辆卡车正等着我们。站台的站牌映入眼帘——新泻。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我们的营房坐落在城外，离火车站有一段路。集中营有一座两层小楼，一个刚刚能容下我们这三百人的空场。日本人给我们吃了一顿大麦饭外加一点菜。随即，集中营的指挥官在监督我们干活的工头簇拥下，耀武扬威地进了营门。

指挥官的名字叫吉田，是个中尉。他的个子矮小，身材短粗，面目丑陋。他的模样我至今记忆犹新。他的衣着整饬、干净，军装里面穿着白衬衣，衬衣的领子露在军装的外面，他那高至膝盖的皮靴总是打得锃亮，战刀老是拖在地上，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像只鸭子，那角质架的眼镜和两、三个包钢的门牙使他的模样愈发滑稽可笑。

他站在桌子旁向我们致“欢迎辞”，他讲话时像疯子似的连喊带叫。我们不久就发现他确实神经不正常。他主要讲日语，一个被他的叫喊弄得昏头昏脑的年轻翻译结结巴巴地把他的话译成蹩脚的英文。最后，吉田用英语结束了他的训话：“你们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俘虏，这场战争将打一百年，你们永远也别想离开这个集中营。”说完，他抽出战刀，双手紧握刀柄，朝空中猛地一劈，吼道：“违反营规的统统砍头！”

我们在这里度过了第一个夜晚，我们的前景似乎并不美妙，这一回，连乐观主义的谣言也销声匿迹了。

这个集中营容纳三百人是相当困难的，除了户外的一个小水池外，再也没有其它供水设备，院子里的厕所根本无法满足众人的需要，更不用说这些战俘几乎都患有慢性腹泻。牛拉的粪车时常来掏粪，当时日本还用人类粪做肥料。

每间屋子里塞进了30—40名战俘，每人只有一个长二米、宽一米、一块榻榻米大小的空间。楼里有一条狭窄的走廊，楼外有一间很小的、充当厨房的棚屋。

显然，这是一个临时性的集中营，我们在这里住了四个月，直到永久性的集中营建成。

我们被分成三个组，编在伦子组的到一个码头装、卸煤，编在新铁组的在一个铸造厂干活，编在丸通组的在一个货物码头当搬运工。我的运气不佳，被分到了伦子组，编号是124，这个组干的活比别的地方艰难繁重得多。

早晨五点我们就被叫了起来，吃过几个土豆和一点青菜做成的早饭之后，我们即出发到两公里外的码头去，开始第一天的劳作。码头的业务经理是一个留着很长黑胡子的老头儿，名叫小岛，他上身穿着军装式的黑制服，下面穿着一条灯笼裤，头上顶着所有日本男人都戴着的土黄色军帽，腿上打着褐色的绑腿。他那上一身黑的制服与帽子、绑腿配在一起，显得格外难看。他的英语还过得去，工头们对他都毕恭毕敬，我们由此知道，他是这儿的一把手。他用低沉的语调给我们训话，重弹集中营指挥官的老调，强调我们到这里来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日本国的更大光荣而工作。他以“大胡子”著称，几个月之后，我们就领教了这个“大胡子”的厉害。他应对许多战俘的死负间接责任。在战犯公审时，他找了一个能言善辩的律师，逃脱了惩罚，这种审判结果是不公正的。

船坞的煤从满洲运来，卸进一辆辆小翻斗车里，每辆车装半吨，装了煤的车要由人沿着铁轨推上一个离地面大约三十米高的架桥，然后，倒进船坞四周的仓库……有时直接倒进运煤车里，运煤车就停在架桥下的铁轨上。有的车厢要用扁担挑煤装车，挑扁担的技术我们在香港修机场跑道时没学会，在这里，日本工头的皮鞭使我们很快成了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动作稍慢一点，干活稍有差错，都要饱尝日本工头的皮鞭。

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这里的工作条件都是极其原始的，那东倒西歪的架桥，粗糙简陋的翻斗车，这些本来更适于出现在狄更斯笔下的东西，居然出现在一个与高度工业化的西方作战的国家里。

那时的新泻是一个相当封闭落后的地方，可以肯定，日本当时也有一些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但是，近来当我读到日本在使用机器人制造汽车，其电子工业方面居世界各国之首，在世界商业贸易中把我们西方国家抛到了后面等等报道时，我仍惊讶不已。为什么日本发生了这些变化？

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合适的鞋子，而干这种推煤的活，脚又特别遭罪，对于那些患了脚气，脚部浮肿的人来说，这个工作更是一种折磨。与我们一起干活的日本人没有这种烦恼，他们穿着带胶底的鞋。这种鞋有一个把脚趾分开的带子，很适于在又高又滑的架桥上干活。不幸的是，我们始终没有适用的鞋。那高架桥使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秋天来了，而我们仍穿着在香港时的衣服，这些衣服连新泻的秋凉都难以抵御，更不用说严寒的冬季了。我上身穿着一件衬衫和在实云道医院检来的毛背心，下面穿着一条军裤，衬衫和裤子还是加拿大皇家部队最初发的军装。值得骄傲的是，在船上我偷了一个艾尔·卡彭式浅顶软呢帽，这顶旧帽子为我的脸挡住了不少雨和雪。

我们干了一个小时左右，下起了大雨，这是我们离开加拿大两年来遇到的第一场秋雨。日本人给我们发了用蓑草编的雨衣，我记得在“各国地理”上看到过日本农民穿着这种蓑衣在雨中种稻子的图片，书上的图片似乎充满了诗情画意，而现实则完全是另一幅画面！蓑衣很快就浸满了雨水，又湿又笨，沉得要命。穿着它在架桥上操纵翻斗车更艰难、更危险。

“工头”在日语里叫“**HONCHOS**”，我们有时也叫他们“**7-Ups**”，因为他们臂章上的日文写得龙飞凤舞，其形状很像一种名为“**7-Ups**”的饮料瓶上的商标。在这种人中能够理解我们，甚或同情我们的极少，部分工头品质恶劣，心术邪恶；而另一部分则完全是精神病患者。他们都是志愿军，多数到过中国，是从作

战部队退下来的。一般来说，战斗经历越少的人，管起战俘来越苛刻。

这些工头们穿着旧军装，打着绑腿，不佩带任何军队番号，每人手里都提着一根又长又重的棒子，像武士道的剑一样，战俘们只要稍有不慎，棒子就会劈头盖脸地打过来，这是他们管理战俘，维持纪律的有效方式。

日本叫人过来的习惯手势与我们让人离开的手势相同，这样就势必要造成一些十分可笑的误解，这些误解的代价就是头上挨一记重打。在所有的工头中，佐藤无疑是最坏的一个。他的身材比一般的日本人还矮，长着一付窄瘦而丑陋的鹰一般的面孔。他是个施虐狂，他唯一的快乐就是一边毒打那些无辜的战俘，一边高声谩骂；他散步时，或者更准确地说，当他装模做样地四处转悠的时候，那一颠一颠的步态，活像一只自负的矮脚鸡。我后来才知道，他确实是个妄想狂，曾因精神分裂症被军队开除。他只要对某人稍有怀疑，就会把这个可怜的人打得半死；连其他的工头都怕他。

比较而言，与佐藤只有一字之差的斋藤是工头里最好的一个，他长得像个玩具娃娃，身材娇小，有着一个小天使般的白胖可爱的脸。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船坞上收拾干净了，他就让我们休息，还把多余的香烟分给我们。有几次他也朝我们喊叫，但是很明显，那是装出来的；在他的同伴的压力下，他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让人不解的是，他是个立过功、受过奖的老兵，曾两次负伤。

奇怪的是，在战俘营里这种工头和卫兵极其少见，很显然，他们仅仅是作为那些病态的施虐狂的遮羞布而存在的。

日本卫兵和工头们都身着军队服装，与之相较，战俘们的服装可谓五花八门。就说帽子吧，有欧洲绅士帽、美国的折顶弯檐软呢帽，偶尔还可以看见从香港战役中残存下来的楔形帽，甚至还有古怪的英国军团的制服帽，南非人和澳大利亚人戴的宽檐帽



更与连日本普通工人都带的军帽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战俘们各式各样的帽子的后沿上，都用日本假名写上了集中营的号码；每个战俘的衬衫后面都缝着一块一尺见方的白布，上面印着各自的号码。

在日本市民工作队里有许多日本女人，她们在我们旁边干活，个个都穿着宽大的裤子和棉袄，这种式样的衣服永远也别想流行。但是，她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在于他们的装束，与卫兵和在这里干活的日本男人不一样，她们总是满面笑容，总是说个不停，说话不时被笑声所打断。

我们在这里干活时间长，条件艰苦，伙食又恶劣，吃这样的伙食根本无法承受装、卸煤这样的繁重劳动。我们吃的第一顿饭是土豆加青菜，开始我们很高兴能吃上土豆，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米饭、大麦和高粱米比土豆更耐饿。海菜是我们的美味佳肴，只能偶尔吃上一次。我们还吃过一种很神秘也更好吃的菜——豆酱炸蚱蜢，味道相当美。

集中营早晨五点吹起床号，六点钟干活的人排队、点名。点名常常得点好几遍，因为一些年轻的战俘不会用日语报数，这样，出发的时间通常拖到六点半。煤场离集中营约两公里，我们一般从七点开始干活。

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穿过狭窄的街道，街上没有行人，偶尔可见牛拉的车和卡车，小汽车很罕见。因为汽油缺乏，车顶上常有一个装煤气的大口袋。

午饭是用一辆手推车从集中营送到干活地点的，饭是冷的，土豆后来被一种紫色的谷类所代替，我们管这种谷子叫朝鲜米，它可能是高粱的一种。我们喝的汤通常是用日本白萝卜做的，吃上小鱼或喝上鱼汤是极难得的。

下午五点，我们整队返回集中营，当天气暖和的时候，日本卫兵允许我们在海湾里泡一泡，干了一天活儿，这是极大的享受。

营房里没有走动的地方，我们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每个人的活动空间几乎仅限于自己身下的那块榻榻米大小的地方。我记得，这个建筑物大约有十个大房间，房与房之间用纸墙隔开，楼的一侧是一条走廊，把各个房间连在一起，每间房里得住三十名战俘。日本人发给我们每人一条棉被，一个小而硬的枕头。

在这个建筑物的一头，有个露天厕所；另一头是个水池，集中营用水全靠它供应。天冷时，我强迫自己每天洗冷水浴，这对人的意志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没有几个人愿意这么干，结果没用多久，大多数人就都被煤灰弄得肮脏不堪，虱子很快在人们身上繁殖起来。

基本的卫生设备的缺乏很快得到了报应，几乎每个人都得了痢疾，并伴有胃痉挛和呕吐。食物不足，天气转寒，空气潮湿。在寒冷、饥饿和沮丧中累死累活，回到营地后，等待我们的只是冰冷的食物、潮湿的衣服和令人压抑的空气。在这种情况下体力和精神都得不到恢复。我的体重减到九十磅，每天勉强支撑着去干活，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来。我认识到，如果我想活下来，就得离开这个运煤队。

营房中的一间屋子被改成了一个所谓的医院，这个医院里没有医生，与疾病和死亡费力周旋的只是两个护理员。我与日本翻译滋贺接洽，谎称自己曾是医学院的学生，告诉他，我想到医院里当护理员。这是个走投无路之后想出的法子，让我深感失望的是，日本人对我的请求反应极冷淡。我的前景暗淡无光。

没过多久，我又得了急性痢疾，不得不到这个以展览病人为目的的医院就诊。翻译把我编造的故事告诉了这所医院的负责人——日本军医下士竹尾高桥，这一次，日方的反应对我较有利，我估计，生病和死亡数字迫使他们不得不考虑我的要求。

这样，我再一次成了医院的护理员。这是个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充作医院的小屋子里挤满了肺炎和痢疾病人，没有像样的医



生、没有合格的医疗人员，现代药品奇缺，这种种因素使医院的情况每况愈下。医院里给肺炎患者注射的樟脑剂，显然不起任何作用，事实上，我甚至怀疑这种治疗方法反而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医院里用铋亚硝酸盐来治疗痢疾，而对杀人元凶——脱水，却束手无策。

随着冬季的降临，悲凉之雾，弥漫营中，乐观主义的传闻消逝得无影无踪。

这时，从菲律宾的甲万那端转来一批美国战俘，他们是在菲律宾的巴丹和科雷希多岛被俘的。他们的状况比我们好得多，在菲律宾的战俘营里有一个很大的农场，这个农场为他们提供了相当好的食物，他们穿的衣服也不错，每人都有军用饭盒和水壶。他们昂扬的精神使集中营里的士气为之一振。

起初，这些美国战俘吹牛说，运煤的工作轻松得很，算不了什么，他们推着翻斗车在架桥上健步如飞。可是没用等多久，低劣的伙食、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就发挥了作用，他们很快成了我们的翻版。

这里所谓的治疗全由竹尾高桥下士负责，他是个自负而傲慢的小个子，战前当过牙科助理。他毫不掩饰对战俘的轻蔑。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掌管着集中营的医疗大权。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对病人或受伤的人流露过一丝一毫的同情。他笑的样子极古怪，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他做出这副怪模样完全是为了向人们炫耀他以为值得骄傲的两颗金牙。他给痢疾患者开的药是毫无用处的粉末，给肺炎病人注射的是无关痛痒的樟脑，每个死人的胸口上都要被他打上一针肾上腺素，即使对奄奄待毙的人他也充满疑心。许多人死了，更多的人成了残废，劳动队的人员锐减，只剩下原来的一小部分。

也许是怕挨上峰的骂，集中营的指挥官着手改变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他找不到西医大夫，还是因为他更相信日本培养的郎中，反

正他弄来了两个针灸师给我们看病，至少是对付一下失调一类的小病。

一天早晨，两个黄皮肤的绅士——针灸师，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把最严重的肺炎和痢疾患者集中到一间屋里，命令他们躺下，一个针灸师跪在一个病人身边，先跟翻译说了几句话，等翻译用英文转告病人之后，他就抓起病人的手腕和脚腕开始给病人号脉，他双目微闭，神情静穆地默数着病人的脉搏，好像处在神秘的昏睡状态的令人敬仰的巫师。

针灸师决定给部分病人施以针灸，只见他把那些常用的针灸针扎进病人的穴位，然后极其熟练地捻动针柄。

其他生病的战俘则被施以另一种疗法，几个用干叶做成的锥形艾香，呈十字形放在病人的腹部，在病人的耳朵两侧也各放一柱艾香，然后将其点燃；艾香慢慢地燃烧，一直烧到香柱的底部，这部分紧挨着皮肤，结果，病人的腹部不可避免地被烧出了水泡，尽管这种治疗方法给病人带来一些痛苦，但是没有人发牢骚。自尊心使他们都变成了坚忍不拔的斯多噶派信徒。

这种治疗方法叫艾灼或芍绒(MOXA)灼烙，是与针灸并行的一种疗法。那些锥体是用药力很强的艾蒿叶子做成的。“MOXA”是“MOKUSA”一词的讹误，意为“燃烧的草药”。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这种治疗重复了几次。它们取得了无一例外的“成功”——每个人都被烧出了既难以愈合、又容易传染的溃疡。经过此番蹂躏，肺炎和痢疾患者非但没有痊愈，反而有增无减。

两、三周后，集中营里来了一个英国医生——彼尔·斯图尔德少校。从此，那两位日本的江湖术士再也没有露面。

这个英国医生原在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服役，他的到来提高了日益沉沦的士气。虽然没有有效的药物，但是由专家看病，人们放心了许多。彼尔是个温文尔雅，仁慈善良的人，他竭尽全力

地对付那些不可能治愈的病。尽管级别悬殊、背景各异，但是我们很快成了亲密的朋友。我选择医学是和他的影响分不开的。

他是个北爱尔兰人，在新加坡的英军中服役，被俘后他弄到一只小船，逃出了新加坡，安全地抵达爪哇。在那里，他上了一只开往澳大利亚的英国船，不幸的是，这只船被德国人击沉，他的厄运至此还没有结束——德国人又把船上所有的乘客和船员运到了日本。

他曾给加拿大政府写过一份报告，写这份报告的时候，他正在从东京到三藩市的途中，那时战俘生活刚刚结束，新泻集中营的情况他记得十分清楚。

1983年夏，他和他美丽的妻子海伦到加拿大看望我们，他把他在集中营时的笔记和一些医疗记录交给了我。这些医疗记录在当时是被禁止的，我帮助他瞒过了日本人保存了下来。

下面的文字摘录于他交给加拿大政府的报告，是我从他用铅笔写的原稿中原封不动抄下来的，原稿中的日期和人名与我记忆的有所不同，显然，他是正确的，因为时隔四十多年，我记忆中的某些东西可能不那么清晰了。

“1942年8月25日，德国人决定将船上的160名高级军官和其他男子送交日本的一个战俘营。德国人并没有把我们的情况告知日方，只是把我们像商品一样交给了日本人。德国政府是否有权监督日方保证我们获得正当的待遇，我们不得而知，可能德方并没有这样的权力，因为我们此后再也没有听说任何有关德国方面的情况。我们跟日本人提出任何有关个人身分、地位的问题都会遭到对方的威胁和惩罚。

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我们的遭遇与在德国人那里大不相同，德国人向我们提问题时很有礼貌，供给我们食物和水，一般情况下不干涉我们。日本人对我们则推推搡搡、大喊大叫，无端地限制

我们的行动。日本卫兵举止既无理性又无法预料，因此，战俘们的精神总处于紧张状态，在我们获得自由之前，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

东京的川崎 1B 战俘营与我到过的其它战俘营比起来几乎可以算是个模范单位了，它确实比日本的大多数战俘营要好，我想其原因大致如下：

1. 它建立于 1942 年 8 月，当时日本正处于胜利的顶峰，以为很快就可以结束战争。

2. 刚到这个战俘营时，战俘们的身体都很健康、结实。

3. 尽管日本人竭力破坏，这里的战俘仍旧承认原部队指挥官的权威。他们没有受到打骂等必然会导致道德沉沦和无视权威的种种虐待。这些情况证明了后来从香港和菲律宾来的战俘在这方面存在的巨大不足。

4. 战俘中的高级军官坎特上校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这个战俘营里他充当的角色与原来的大不相同。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就以老练而圆滑的方式，十分明智地与管理战俘营的日方军官建立起融洽的关系。他说服日本人，由他来管理战俘，他们会从他的帮助中得到好处。由于他做得十分机警、巧妙，又省去了日方的许多繁重的工作，日本人很快就尝到了这样做的甜头。有一段时间，他遭到了来自日方和战俘的两方面的夹攻，但是他挺过来了，胜利地度过了难关。

战俘们刚到川崎时，健康情况良好，虽然由于伙食的变化，其身体情况有所下降，但还能保持健康。这是很幸运的，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可用的医疗设备。

新泻的集中营和其它地方的一样，其主要特色是干活、干活、干更多的活。日本人是靠一个模糊的数字来判断工作效率的，集中营平常外出劳动的人数占战俘总数的百分比就是他们的判断标准。集中营的各级日本指挥官都竭力使这个百分比达到最高点，而



不管战俘们的死活。如果这个百分比降到他们的标准以下，他们就会把病号名单一笔勾销。

每天晚上，新泻集中营都要进行病人检查，因病第二天上不了工的人还得到医务部找日本下士伍长或列兵核准。这些日本人只受过急救训练，对医学一窍不通。如果他们决定承认一种新的病例，就选择二尖瓣狭窄。允许多少人得这种病，通常在看病前就决定了。‘战俘到这里是干活的，不是来生病的。’不管我们提出什么问题，日本人都会这样答复。

配给病人的伙食只允许是原定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因为个人得到食物的多少通常取决于整个集中营得到的食物的总量，所以，病人数量的增加就意味着食物总量的减少；多数病人是因为缺乏营养而生病，这样一来营养更少，病人也就更无好转的希望。

一般情况下，我确诊的病号到了日本人那里只有二分之一被获准休息，剩下的人被认为是装病，往往挨打。我一方面要努力把被惩罚的病人的数目压缩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要对严重的心脏病人和肺炎患者给予优待。这样集中营方面就把看日本医务人员的病人数目尽可能地减少。这种作法很容易引起战俘们的误解，战俘的命运是很艰难的，但有的时候，对帮助他们的人，他们并未给予相应的配合。

在这些集中营里当医生不是一个值得羡慕的差事，不管你奉行什么政策，都会遭到来自日本人和战俘们的两方面的攻击。我的政策是：

1. 努力与日本人做斗争，为那些真正的病人和因失调引起疼痛或不适而不宜干活的战俘说话。

2. 尽力取得日本人的信任 and 好感，我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在后来工作的新泻集中营，我发现，一旦我的权力被临时剥夺，后果是多么的严重。由日本人来决定病号名单，后果是灾难性的。日

本人的兴趣始终集中在一点上——外出干活的多少。

跟日本人打交道时，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政策，对于不同的日本人要用不同的处理方法。有的日本人喜欢奉承拍马，有的则喜欢冒充权威，但是这些伎俩在日本医务官员那里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的回报。

1943年10月3日我受命离开川崎1B集中营，前往新泻5B集中营。当天晚上，我到达新泻。在这里我干了近两年，直至和平降临。美军野战炮兵部队的弗朗西斯·费洛斯少校是战俘营中的老前辈，从他那里我了解到战俘营的情况。

这个战俘营是临时性的，战俘们希望搬到一公里外还未完工的永久性的营房去。

这个战俘营两个月前即投入使用，1943年9月3日，从香港来了三百名加拿大人，10月初，从菲律宾来了三百五十名美国人，开始，这里既没有负责的军官也没有一个医生，10月20日五名美国军官和三名美国战斗部队的医务人员到达这里。

我得到的报告是可怕的，没有适当的衣服，没有象样的住宿条件，没有盥洗设备，人们忍饥挨饿并超量工作。这里的天气也不好，不断下雨，风很大。加拿大人的情况尤其悲惨，已经死了七人，许多人病情严重。在我们被盟军解放之前，加拿大人的死亡数字达到一百零二人。

有近五十人无法工作，营养不良、脚气、肺炎和痢疾是主要原因。一间房子被开辟成病房，近三十个床位(席垫)全被占满，其中包括十二名肺炎。营房里还有一打多急性肺炎和许多痢疾患者，还有一些人得了严重的复合神经炎，浮肿、工伤者亦不少。所有这些病症无不显示出日本人对战俘营内部情况的迟钝和麻木，对战俘的粗暴和残忍。

战俘营的日本指挥官吉田上尉对我第一次交涉这些问题时的答复，集中地表现了日本人的邪恶。我告诉他，战俘们需要休息，



需要御寒，应该为他们提供适当的衣服和房屋，更好的食物和适当的医疗。

他穷凶极恶地对我吼道：‘战俘们到这儿来是干活的，他们要么干活，要么死掉！’不幸的是，在冬天结束之前，不少人死了，剩下的人还在干活，没死的人尽管苟活下来，这种生活对其身心的伤害一直到战争结束才告一段落。

这里有三种工作：

1. 伦子(RINKO)煤场

这是最坏的工种，具体工作是：从装煤的货车(货车来自中国的满洲)上卸煤并将煤用翻斗车推到高架桥上，然后将煤倒进不同的煤库。

2. 新铁(SHINTETSU)铸造厂

这是一个相当老式的工厂，就像英国本世纪初建立的工厂一样。在这里干的是一般的体力活儿，好处是在室内。

3. 丸通(MARUTSU)码头

这里干的是普通的装卸工作，在这儿干活的人最有福气，因为人们有很多机会偷吃到一些东西。

吉田上尉对我吼叫后不久，战俘营开始实行晚间病号检查制度。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又冷又湿，毫无希望地来找我看病。医院里没有地方，连一间候诊的房子都没有，战俘们只能在走廊上排队等候。他们想看看新来的医生，主要希望能免除第二天的工作。这里集中了一半的劳力，只消看上一眼，我就确信，在这些人们中间适合干活的不超过百分之十。

大多数人患有腹泻，即使不拉肚子的人，也有不同程度的腿部浮肿。这种浮肿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因腹泻而脱水的程度。许多人虚弱的几乎站不住，有的人摔倒后只能被抬走。病人们来看病是陆陆续续的，因为日本卫兵或工头用棒子乱打那些来看病的人，阻拦他们前来就诊。日本人的逻辑是，如果这些人真的病重，那

么他们就不会被这样的‘待遇’吓住。

在这里，病人得不到什么治疗，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把快死的人与病人分开，这成了每天的第一个恶梦。无论如何，这毕竟比我来之前实行的制度好。在那种制度下，晚上除了所谓的“治疗”之外，没有病号检查制度，第二早晨所有头一天干活的人都得出去干活。没有人敢向日本卫兵报告自己有病。我到达后的一个早晨，一个战俘只因说自己有病，就被日本卫兵打得失去了知觉。我目睹着这一惨剧，却爱莫能助。我下定决心，不能让这种事重演。

然而，另一种千篇一律的节目在日复一日地上演：最重的病人被带进病房，为申请病假的人检查身体，晚上，战俘们排成长长的队伍等着我给他们看病。我采取措施，尽可能地使现状得到大的改变——让病人获得三、四天的休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措施，休息三、四天看起来稀松平常，但却足以把一个人的生命从死神手里夺回来，这是一个微妙的分界线。

一个月之后请病假的人数从150名上升到240名，战俘们的健康状况似乎有所改善。一些需要衣服的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费洛斯少校对此事做了安排，使衣服得到了更合理的分配。事情似乎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战俘中病人日益增多的消息传到了东京，军医团的军士长富士被派到这里，以采取必要措施。富士下达命令：除了二十人和那些在医院里的人外，其余的人全部出去干活。这样一来，战俘们刚刚有所恢复的身体马上恶化。

我们的临时性营房已经破烂不堪，却不能向日本人反映。1943年12月24日，这个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我们搬到了新建的战俘集中营。这里还没有完全竣工，没有厨房，做饭的地方离营房有两公里，饭菜到了我们手里已经没有丝毫热气。在当地人的偷摸下，饭菜到我们手里时只剩下原定量的一半了。

这里的房子没有窗户，开窗户的地方被胡乱地钉上了几块木板，任凭风、雪、雨水从板间的大裂缝中钻进来；这里也没有供水设备，水用大木桶送来，取暖设备也没有，人们找不到一个能暖暖自己身子的地方。

饥寒交迫的战俘们挣扎在潮湿和肮脏之中，每天除了吃饭就是干活，有的人绝望了，有的人仍旧盼望着能够通过病号检查获得一天的休息。

1944年元旦凌晨两点，一个营房突然倒塌。里面的50人被砸死8人，重伤12人。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劳动队仍旧天天出去干活。每天晚上，外出干活的人都要带回几个日本工头用残酷的毒打惩罚战俘的故事。这种故事是如此的千篇一律，以至于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新鲜感和吸引力。战俘们的士气降到了新的低点，死亡的出现已经成了生物学的现象。没有人笑，几乎没有人说话，自尊心已经消失。在腹泻不断，却没有手纸或别的代替品的情况下，保持自尊是困难的。

每天晚上，人们仍旧排着长队等着看病，每个人发的牢骚都是事实。由于缺少鞋子或因脚部浮肿无法穿鞋，冻伤十分普遍。即便如此，战俘们仍得忍着苦痛，拖着沉重的步子去干活；仍得在雨里、雪里跋涉。日本人对此仍旧熟视无睹，不思改变；而且仍旧叫我到他们的办公室去，命令我不许让人们死掉。对于我的建议，日本人仍旧置若罔闻。

到了一月中旬，日本人终于认识到必须采取措施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集中营失败了！我们搬到了另一个营房。

原集中营的战俘们被分成了两部分，新铁部(铸造工人)被转移到一处，伦子部(运煤工人)和丸通部(码头搬运工)被转移到另一处。从此，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新铁部的人们了。

伦子部和丸通部所在的集中营在住房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

尽管营房里仍然相当拥挤，但是这已经不算严重的问题了。

营房里安了四个铁炉，日本人允许在伦子运煤的战俘带回一些煤块，干活的人每周可以洗一次澡，还发了手纸、肥皂和更多的衣服。

这时我们收到了来日本后的第一批红十字会的包裹，士气有所上升。

工作量并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有所减少，但是上工的路程缩短了，工头的态度也显得有所宽容。随着集中营中一般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希望复苏了——春天来了，这里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些。

日本卫兵仍然像以前一样凶恶残暴，事实上，两个最残忍的罪行就发生在这一时期。战俘们每月的死亡人数仍在15—20之间，但多数死亡是以前的疾病造成的。

大约在三月中旬，日方任命了一个新的指挥官——二等中尉根本，虽然他并不令人完全满意，但是他对集中营的事务表现了更多的兴趣。他明确地制止了卫兵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在此之前，卫兵们总是没完没了地在营房的各个角落转悠，枪上插着刺刀，任意用刺刀和枪托捅人、打人。值得庆幸的是，吉田调走了。

1944年4月1日我们回到了前时被腾空的原集中营。这里的房屋修建工作终于完工了。厨房已经建成，有了自来水，甚至还有一个大洗澡间，营房里有了更多的空间，所有的人都有了休息日，一个月四天。”

以上内容摘自斯图尔德博士的笔记。可能由于后来的战犯审判工作占用了他的精力，他没有时间写更多的东西了。



第五章 担忧、希望和自由

从未见过什么人，
有着如此渴望的眼神，
那头顶上的一小块蓝色，
囚徒们称之为天空。

——奥斯卡·怀尔兹：
《狱歌》

1944年元旦凌晨，那间营房倒塌之后，四个骨盆受伤的伙伴被送到城里的一个小诊所治疗，为了照顾他们，我很幸运地陪他们进了城。对于我们这五个人，尤其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变化。

所有的日本公务员对我们的态度都非常谨慎，我估计他们中有不少人从来没见过我们这些可怕的敌人。我们没发现他们中的什么人多么仁慈善良，但是大多数人的彬彬有礼却让人惊异。一些姑娘给我们带来了吃的东西，作为小小的礼物。从那以后，我一直认为，日本妇女与日本男人不同，她们可能属于另一种人。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也无法解释。

我们住在一个约有六个榻榻米大小的房子里，每个受伤的伙伴占一个榻榻米，照顾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四个人都不能动

弹,要使他们保持卫生,给他们喂饭,让他们精神愉快是困难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在这里比在集中营好多了,因此,他们都恢复得很快。

晚上,当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离开诊所之后,我乘机享受了洗热水澡的奢侈待遇,三年以来,这是第一次单独洗澡。当我惊异地发现这个诊所里只剩下我们这几个战俘时,我决定进行一番小心的探险,因为不敢开灯,所以探险是摸黑进行的。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厨房,于是就设法偷了一些糖和冷饭。从此,这种小偷小摸成了我的日常工作的组成部分。但是我每次只拿够我们几个人吃的,以免引起怀疑。一次,我偷了两个紫豆做的小点心,大家分享了这一胜利成果……这是一个盗取美味的凯旋。

这件事为我们的驻留增加了些许乐趣,后来,我怀疑那个负责诊所厨房的女人早就觉察了我的所做所为。她每天早晨见到我时总是朝我笑。

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又回到集中营。给人们大讲我们编造的故事——艺妓如何款待我们,食物多么精美考究,到了晚上,年轻的日本姑娘如何缠着我们,要我们给她们介绍外国人谈情说爱的高超手段,要摆脱她们是何等的困难,等等。我估计,有的人可能真的相信了这些异想天开的编造。

在我们离开期间,集中营搬到了新的地方。在新铁铸造厂干活的战俘搬到了工厂附近。从此,我们和他们中断了联系,直到战争结束。伦子煤场运煤队和丸通码头装卸队迁到了一个离码头较近的地方。这个集中营的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人们提出了战俘集中营应具备哪些标准等问题,甚至连东京那些很难激动的参谋们也提出,应对营房倒塌一事进行调查,因为这件事表明战俘集中营的条件何等可怕。

我们的临时营房仍很拥挤,没有适当的盥洗设备,厕所太少,没有活动场所,这一点即使在最好的集中营也不例外。必须加引号



的“医院”，有了可以关上的窗户，风雪不至侵入，屋子中间还配备了一个小铁炉。整个“医院”有三十个榻榻米大小。大约在这个时候，我们收到了红十字会的包裹。我估计，是吉田中尉把它们藏了起来，他想用这些包裹搞黑市买卖。只是因为东京派人来这里视察才使他改变了计划，日本军队是很怕秘密警察的。

红十字会还给我们一小包药品，其中包括治肺炎的磺胺，治阿米巴痢疾的依米丁和卡巴肿，还有一些维生素片。我希望这些难得的药物能使战友们的病情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但是这一希望落空了。那些得了脚气的人吃了维生素之后，肿脚依然如故，痢疾患者吃了阿米丁和卡巴肿后并没有见好，虽然肺炎病人服药后有了点转机，但有些患者还是死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伙食里几乎没有蛋白，对于因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抵抗力的丧失，这些药物是无可奈何的。

我一直无法平静地接受战俘们所面对的无可避免的命运：当病人因脱水瘦成一把骨头，或者发着高烧，呼吸困难的时候，救死扶伤的医院给予病人的却只能是一张通向死亡的证书。我们的排长肖特·波普和我在魁北克时的同学、朋友比尔·西特都死在了我的怀里。应该做的事情是如此之多，可我能办到的又是那么少。

我最厌恶的事是往停在走廊上的木头棺材里敛放尸体。死者躺在榻榻米上，两边是病人，（我们没有床）。也许，刚刚死去的人的样子是天下最美的，在将死者放进棺材之前，我不得不用纸（日本人不发给我们棉球）填塞死人的嘴和肛门。因为多数人死在夜里，所以这些事只能在黑暗中进行，这样也可以使活着的人少受刺激。尸体由一、两个护理员用马车送往火葬场，这种事得经常进行。没有人想到为死者举行宗教仪式，没有眼泪，没有哭声。

我不记得有什么人患过抑郁症（医学意义上的），在我们的集中营里也没有谁企图自杀。很久以后，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考察，发现在这种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反倒不容易发生此类问题，这

一发现让我惊异。事实说明,在灾难突然降临之际,人们的精神素质发生了明显的衰落。记得有一个年轻的美国战俘,信奉摩门教,产生了一种幻觉——美国人来解救我们,正在朝这里进发。于是他试图逃走,其悲惨的结局收在此书的附录之中。除了这个人之外,别的人只有悲伤,绝无疯癫。

确定病号名单仍是每天晚上不可逃避的恶梦,即便算上所有的战俘,也没有几个适宜工作的,集中营大夫彼尔·斯图尔德的处境十分艰难,如果他批准请假的病人多了,日军下士竹尾高桥就会剥夺他的权力,如此一来,事情就会被弄得乱七八糟,就会有更多的人受苦,更少的人得到挽救。因此,彼尔很巧妙地掌握着这种平衡。大多数战俘能够理解,给一个形容憔悴、浑身煤黑、患有腹泻的可怜人一点铋粉,同时劝他明早上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极少数人骂骂咧咧,对这种安排表示不满,对我们的努力嗤之以鼻。

高桥下士时常嫌我们用药多了,这时,他就要把他办公室对面的药房锁起来。但是这并没给我们带来太大的麻烦,因为我知道他把钥匙放在了什么地方。在极其必要的情况下,我只须冒很小的危险,就可以找到那把钥匙。我估计,高桥正在黑市上倒卖我们的药,他可能和吉田一样在做这种买卖。黑市就在城里,生意十分红火。后来证明,集中营的日本指挥官吉田确实在黑市上倒过战俘的食物和红十字会的供给。大约在这个时候,我通过一个卫兵与外界取得了联系,能买到一些药品。很可能我们买的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后来,我们设法买到了更多的药。

在这本书中,我有意地把关于日本人如何凶残的文字放到附录中去,下面的记载是个例外,因为这件事至今萦徊在我的脑际,激荡着我的心灵。

詹姆斯·莫蒂默是个来福枪手,在我们到香港之前,他就参了军。来战俘营以前我对他并无多少了解。他属于我们今天称之为“嬉皮士”的那种人,长着一张小天使般的胖胖的圆脸,举止温文尔



雅，却总是小偷小摸，经常在病号之列。若在今天，他可能会投身于反对核战争、非暴力示威或环境保护等事业中去。

一月初的一天，一个日本工人到日本指挥官的办公室办事，午饭放在自行车上，被他偷了。这种事如果没有太大风险的话，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干。不幸的是，他被日本人抓住了。

指挥官的得力助手，伊藤中士大发雷霆，用刀背在他身上乱打乱抽，打完了，把他绑在门外。当时正下着雪，气温在零度以下。莫蒂默只穿着一条棉裤，一双鞋，脚上没有袜子。尽管费洛斯少校和斯图尔德医生为他向日本人求情，他还是在外面冻了一天多。

最后，卫兵给他松了绑，我们把他抬进医院，经过几个小时的暖身，他恢复了知觉。令人惊诧的是，他的上半身只是表面冻僵了，他的胳膊还能动弹；但是，他的下半身冻坏了，已经无法挽救。不久，下肢就得了坏疽病，坏死的肉体发出的臭味充满了医院那间不大的屋子，让人难以忍受。伊藤不知道他造成的罪孽，就是知道了他也不会将他送到东京的战俘医院就医的。也许，他已经因滥施淫威受到了惩罚。

莫蒂默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勇气和坚毅，他知道自己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但他从不抱怨，反而用自己变黑的双脚打趣，安慰周围的人。他与不可逆转的命运战斗了近两个月，终于在一次睡眠中永远离开了我们。他变得如此坚强，令我无法忘怀，他是我们所有的人的楷模。

1944年夏，我们的希望复苏了。天气的变化令人振奋，虱子被不那么可怕的跳蚤所取代。盟军在欧洲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和日本人连连失败的消息提高了我们的士气。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这些消息是日本人及时而准确地告诉我们的。我们的医疗室就在日本卫兵宿舍的隔壁，我可以拣到日本兵随手扔掉的零散报纸。那时战俘中没人懂得日文，但是军用形势图很容易看懂，因为这些地图是用语音文字——日本的片假名标

写的。彼尔·斯图尔德有一本不大的日—英字典，我已经可以熟练地译解片假名，并且能够看懂药用专门术语了。干这些事是有危险的，因为管理战俘营的日本军人都是疑心重重的偏执狂。

战俘中的军官是有工资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机会使用这些日元。吉田走后，新来的日本指挥官允许军官战俘们用自己的钱买些乐器，这件事使我和乔治·弗朗西斯成了朋友。他是美国海军中士，参军前曾在洛杉矶当过吹小号的演员，为了逃避一件小事，他当了兵，并被派往中国。在北京呆了一年之后，他被派往菲律宾，刚到那里他就碰到了日本军队。他是在巴丹被俘的，后来又随着其他美军战俘到了新泻。在两个日本兵的监视下，他带着我进城买乐器和药物，从此，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

漫长的夏夜，给我们带来了一点空闲时间，这是我们到日本以来从未有过的享受。乔治用他的小号、一把吉它和一个班卓琴组织了一个小型的爵士乐队。这个乐队在集中营的空场上举办了一个小小的非正规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对士气的提高，远远地超过了想象。乔治的小号奏出了“宇宙尘”，这首乐曲使我们暂时忘掉了周围冷酷的现实，沉浸在温馨而文雅的光辉之中。

不幸的是，集中营里没有一本可看的书，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人的偏执。幸亏我还保存了一本从香港偷来的《袖珍诗集》，它成了我的无价之宝。我在煤场干活时，每天晚上，都要努力记住一小段诗，让它陪伴着我度过下一天。在那个疯狂的世界里，它使我保持了心智的正常和清醒。由于彼尔·斯图尔德、乔治·弗朗西斯和我一起分享这本书，到战争结束时，它已经相当破旧了。我本想把它带回家，没想到我乘船去夏威夷的时候，它和我的大多数“宝贝”一道丢失了。值得庆幸的是，这本书还能买到，现在，我的书房里又有了一本。

除了读书之外，更多的是聊天，流言蜚语又出现了，这是我们精神复活的标志之一。



在我们的集中营里有几个“中国通”，我特别喜欢听他们讲那个已经消逝的古国的故事。他们相信中国决不会走向共产主义，因为中国人有悠久而强大的东方家庭模式和个人主义传统。他们一定感到奇怪，中国人竟能在表面上服从毛泽东这么多年！也许，时间会证明他们是对的，因为对于中国来说，五十年不过是他们历史的某一天中的几分钟而已。

集中营中的一个更有趣的人物是阿瑟·兰斯，他的日语极好，就连日本人对他的日语也感到惊奇。因为没有几个外国人能说出如此流畅的日语。他是个中士，在香港志愿防卫团里服役，和我们乘同一条船来的日本。他才华过人，机智聪敏，在他的帮助下，我学会了一些日文，更主要的是，他使我对日本人那令人困惑的民族性格有了一定的认识；特别是对他们那隐蔽的等级制度和极端重视面子的特点有了一定的了解；从他那里我也知道了，日本人对于我们可能认为是不正当的打交道的方式所取的不同态度。

战后，由于彼尔·斯图尔德和兰斯都参加了战犯罪行审判工作，所以他们经常见面。据说，兰斯的母亲是个日本护士，她嫁给了一个英国人。我猜想，他始终不想让我们知道他的血管里还流着日本人的血液。在我到达温哥华不久，他因嗜酒死于肝硬化。这是十分可惜的，以他的才智和魅力，他几乎可以称雄于任何一个领域，何况，他还有一口流利的日语。

读者可以想见，在明天是个巨大的未知数的情况下，朋友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必要彼此保密，这就使下面的故事具有了独一无二的价值。

我有个舅舅，曾经涉嫌某个军队丑闻，但这件事多多少少是个家庭秘密，我知之甚少。他的名字叫克里斯·达菲尔德，是桑赫斯特英国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

我的姥爷从列兵干起，后来晋升为北爱尔兰皇家步兵上校，在当时这只是一论资排辈的提升。舅舅的过失，是家庭的悲剧，这

种事是不能在孩子面前谈论的。

因为彼尔·斯图尔德在贝尔法斯特长大，所以我问他是否听说过我舅舅的事，他说没有。

战后，我从另一个亲戚处知道了这件事的详情，克里斯舅舅当时在吉布塔服役，他开枪打死的是他的上级——团里的一个上校。这个上校是个同性恋，他向年轻的军官施加压力，强迫他们满足他的要求。由于这层原因，克里斯没被判处死刑，而受到了长期监禁的处罚。这在当时是报上的一大新闻。后来，他到了肯尼亚，战争期间他担任非洲步兵团的军士长，为欧洲战场工作。

许多年以后，我到英国拜访彼尔，跟他说起这件事，他笑了，道：“因为你不知道这件事的全部内情，所以我认为不宜跟你说。我知道这件事的全过程——我的岳父当时是军事法庭的负责人。”

多么典型的英国人，我由此更加敬佩他。

我希望能见到克里斯舅舅，我姐姐马杰里（战争期间她曾在英国的加拿大军队里当护士）结婚的时候，我如愿以偿。据说，他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后来成了乌干达《坎帕拉时报》的编辑，当时的乌干达时局动荡不靖，有一次，他遭到了土匪的袭击，失去了一只眼睛。此后，他始终未能从这次灾难中恢复过来，终至死在他寄身的国家里。

集中营里的美军少校费洛斯，是美国内战史方面的专家，他喜欢谈论这一时期的史实，晚上，他常以半正式的方式给我们讲他喜欢的题目。他讲的内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和平到来之前，我已经记住了美国内战中大多数指挥官的名字和所有重大战役。战后，我在美国南部住了三年，我的美国朋友对一个加拿大人居然能给他讲解维克期伯格战役的历史无不表示惊讶。

* * * *



在冰天雪地的隆冬腊月，我们时来运转，竟然得到了三个礼拜的休假。事情是这样的，1944年12月初，彼尔·斯图尔德带来了一台显微镜。他开始用它检验大便，无须奇怪，他发现了许多阿米巴痢疾病例。集中营的日本指挥官知道了这个化验结果后，怒不可遏，对我们拳打脚踢，斥骂我们说，这种化验结果根本靠不住。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第二天从新泻大学医学院来了一个教授和一些学生，他们带来了显微镜等化验设备。战俘劳动队暂不外出干活，他们给每个人都做了便检，化验结果证明彼尔·斯图尔德是完全正确的。医学院教授建议将战俘全部隔离，对他们实行全体治疗，并全面改善营房的卫生设施。所有这些措施，特别是停工三周的决定受到了战俘们的热烈欢迎。

这一年冬天，风雪肆虐，其气温之低、风雪之巨在新泻历史上是罕见的。茫茫大雪覆盖了整个集中营，堆起的雪高达二十米。能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留在营房里真是再好不过了。尽管这次休假对阿米巴痢疾的治疗有多大影响值得怀疑，但是由休假产生的整体效果无疑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在当局急于驱遣战俘们外出干活的情况下，那位教授采取这一行动是具有相当大的勇气的。这位富有同情心、不屈服军队压力的医学教授对战俘们的关照，使我们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我的战友约翰·斯特劳德患有严重的痢疾，从他的粪便里很容易找到阿米巴寄生虫和虫卵（在显微镜下辨认寄生虫并不十分容易）。为了使调查组对战俘们的病情做出最坏的估计，他把自己的粪便送给了那些身体还不太坏的战俘们，让他们冒充自己的交上去。这种不同寻常的礼物可能对调查组的最后决定——全体隔离治疗——产生了影响。

春天来了，大雁鸣叫着从集中营的上空飞过，飞到中国的满洲去度夏。我们用嫉妒的眼神目送着自由自在的大雁——何年何月我们才能获得自由呢？自由，这个今天被随意滥用的字眼，只有在

失去它的人那里才显示出真正的含义。这是战俘生活给予我们的不多的好处之一。

又是一个美丽的夏季，虽然劳动队仍旧日复一日地上工，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活儿可干。因为能够通过盟军封锁线的船只极其有限，日本船只或被盟军投放在港口的水雷击沉，或被美军飞机发射的火箭击中。美军飞机在日本上空畅通无阻，没有任何火力拦阻，如入无人之境。我们像孩子看放爆竹一样，观赏着美军飞机发射火箭的精彩场面，那感受真是奇妙极了。

德国投降了，我怂恿彼尔·斯图尔德向日本当局提出释放的要求，因为他是被德国俘虏的。可是他并不欣赏我的这种幽默感。我们听到了美国人在菲律宾、在冲绳、在琉璜岛胜利的消息。东京的当权者一定慌了手脚，因为凶恶的卫兵和残忍的工头都逐渐被替换下来，医疗护理员竹尾高桥下士是这些被调走的人之一，在集中营初期，就是这个人将战俘的生死置于极悲惨的境地。

一般的日本人都准备为国捐躯，至少在我们面前是如此。乔治·弗郎西斯和我关心的是：如果盟军最后攻入日本本土，会发生什么事情？毫无疑问，根据长官的命令，集中营中的日本人会进行许多疯狂的准备。

日本人命令战俘们在集中营外面挖了一个大坑，说是要修防空洞，我们推测，美军登陆之时，就是我们的死难之日，这个大坑将成为战俘们的集体坟墓。这一推测后来得到了证实——日本当局计划将战俘集体处决的命令于1945年夏被公诸于世。发现并披露这一消息的是菲尔德·马歇尔·特奥齐。这一命令的全文如下：

“一俟敌人在本州登陆，即杀死全部战俘。”

为了防备紧急情况，我和乔治每人预备了一个小小的干粮袋，一点一点地节省下珍贵的食物。我们的计划是：一旦情况不妙，就冲出集中营，进入农村。幸运的是，这个计划并未付诸实施。

B—59型轰炸机每天都要从新泻上空飞过，但是与别的城市



不同，这里从来没遭到过大规模的轰炸。这些轰炸机通常是往港口里扔大型水雷，有一次，一个水雷没扔进港口，却扔进了新铁集中营。

日本人击落了一架美军飞机，飞行员在被解往东京之前，关在我们所在的集中营里，卫兵室附近的一间小屋成了这个大监狱中的小监狱。我设法和他交谈，得到一些最新的消息，盟军不久将攻入日本本土已经确切无疑了。他看到外出干活的劳动队，对战俘们那稀奇古怪的装束惊讶不已，我祝愿他别像某些飞行员那样被日本人砍掉脑袋，日本人即使是明天投降，今天也会这么干。

这一年的夏天，我有过一次独特的经历。一天晚上，我正在医疗室外坐着，一个日本卫兵走到我跟前，那时我掌握的日语已经能应付不太复杂的谈话，他给了我一支烟，这种事在当时并不是很罕见的，然后，他突然对我说：“我能够相信你吗？”尽管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仍坦率地回答：“当然”。

他告诉我，他是个社会主义者，过去就反对战争。日本已经到了失败的边缘。最后，他向我表示，他反对我们被这样对待。

由于担心这是个陷阱，我的反应十分谨慎。但是渐渐地，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诚恳，从此，我们经常见面。他从当地的黑市给我们买来一些药品，彼尔和其他军官有自己的工资，这些日元除了买乐器外，一直找不着花的地方。有了这层关系之后，这些没用的废纸突然成了有用的货币。这个日本兵还为我们带来了各种新消息。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以极其隐蔽的方式进行的，集中营方面一旦发现一点点蛛丝马迹，我们双方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不久，这个日本兵所在的班被突然调走了，此后，我再也没见到他。

战后，我收到他的明信片，他告诉我，他当上了他所在城市的市长，干得很不错。遗憾的是，这个明信片被我弄丢了，另外，我当时正在上大学，忙于应付新环境，这两个原因使我未能回信。我妈妈在把他明信片转寄给我之前，还把它寄给了《魁北克新闻电讯

报》，这家报纸登载了明信片的内容。这件事本来应由我去做。

1945年7月，又一批战俘来到我们的集中营，这批人是文职军人，有一百五十人，他们是在威克岛被俘的，曾被关押在上海。此外，还从东京转来一批战俘，共二百人，其中有二十四名军官，两名医生，他们是因为东京被轰炸而转移到这里的。这样一来，我们的集中营又像过去一样拥挤不堪了。尽管如此，东京被炸和日本民众情绪低落的消息却使战俘们的情绪高涨起来。

这时的新泻5—B战俘集中营成了远东军事力量的大杂烩，有加拿大人、美国人和荷兰人，有来自上海的为数不多的白俄罗斯人，还有来自新加坡的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从新加坡来的战俘本来关在东京，因为美国的空袭炸毁了他们的集中营才迁到这里来的。在这所有的战俘中，只有荷兰人最抱团，他们是潜艇兵，因潜艇在爪哇被击沉而被俘。当初，他们刚到香港的集中营时，几乎衣不遮体，可三个月之后，他们就控制了厨房，成了战俘中的贵族。

从别的国家来的战俘则缺乏这种民族间的凝聚力，大多数人都有一、两个“铁哥们儿”，哥们儿之间同甘共苦，忠诚不渝。除了这种十分亲密的关系外，战俘们之间更多的是“狗咬狗”。

我已经提到过，乔治·弗郎西斯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是他引导我走向生活中更富有知识的道路。像我在香港时的朋友戴·戴维斯一样，乔治不但博览群书，而且是个天才的诗人。因此，在当时缺书少纸的条件下，我从他那里受到了一种口耳相传式的教育。

尽管在饥饿线上挣扎，乔治仍保持着难以置信的精力和永不衰竭的乐观精神，即使面对着最令人失望的事实，他也毫不气馁。他的这种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我，使我得以摆脱消极和悲观情绪。当人们为米饭里的象鼻虫大发牢骚的时候，他却大讲特讲这种虫子的高蛋白成分，对于他来说，战争仿佛是下礼拜就会结束的事情。

这个时期集中营中的日本指挥官是加藤中尉，他长的比一般

的日本人高大，有一种与他的身材相般配的暴躁脾气。他改善了集中营的条件，但是他的脾气一上来就无法控制，事情过后又不免后悔。因为他总戴着一付宽大的角质眼镜，所以战俘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四眼”。他奉行最严格的纪律，对战俘如此，对卫兵亦然。他那狂暴的性格和施虐的嗜好，使卫兵和战俘们对他都产生了可悲的尊敬。站队报数时，任何步履蹒跚的人都会被他用刀背打个半死。一个不幸的美国战俘，弗朗克·斯皮尔斯，是个年轻的摩门教徒，因患有幻想病，从集中营中出走去参加他想象中的“美国先遣队”而被他亲手杀害。

在“四眼”住房的后面，有一个围栏，里面养着“四眼”极为骄傲的六只鸡。他每天早晨的头一件事就是到围栏里捡鸡蛋，捡蛋的时候他总要充满感情地对他的母鸡嘟囔一阵。也许，他唯一喜爱的动物就是这几只鸡。

要全面了解战俘们的想法，有必要知道大多数人的共性。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关注着在那最终到来的遥远的日子里，自己将干些什么。也许，这是保持灵肉合一的自我保护性机制，也许，这是把意味深长变成毫无意义的自卫本能。

一位朋友的宏愿是获得自由后，在蒙特利尔开个妓院。妓院所有的床都铺上桔黄色的床单，所有的枕头都套上黑缎子做成的枕套。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在希布蒂米当鞋商。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梦想着他那宏伟的计划。

我自己的野心现实得多，也平凡得多，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更难以实现——我想吃一只鸡。一只属于日本指挥官加藤的鸡。一天，我把这个大逆不道的想法告诉了乔治。

“这事容易得很”，他说，“就像从小娃娃手里拿一块糖”。他那天生的乐观态度，我难以分享，但是这事令我们着了迷，一连好几个礼拜，我们谈论着它，掂量着其中的风险。这种行动所冒的风险是真实而可怕的，很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最近一次吃

鸡是在四年前，我没有勇气承认我缺乏信心，于是，我们决定铤而走险。

外面值班的日本卫兵至少有两个，有时他们站在营房门口聊上一会，有时，他们围着营房转圈，然后，在了望塔下碰头。了望塔矗立在营房拐角处，长期闲置不用，塔上有一口钟，估计是报警用的，可我们从来没听到过钟响。

因为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藏身，所以干这件事是十分危险的，鸡窝又在加藤宿舍后面，挨着卫兵室，安全得很。与这几只鸡比起来，战俘们受到的“保护”可谓小巫见大巫，逊色多了。

这是一个闷热而多云的八月的夜晚，日本指挥官的宿舍里人声嘈杂，正在举办晚会，加藤和大部分日本卫兵都在参加聚会，集中营的警戒有所放松，这是采取行动的大好机会。由于 B-29 轰炸机几周来对日本的连续轰炸，集中营晚上不准开灯，四周一片漆黑。我们的计划是，由我转移日本卫兵的注意力，同时，乔治溜进鸡窝里偷鸡。

等人们都睡熟之后，我们偷偷地溜出营房，我猫着腰从厨房后面溜过，小心翼翼的不弄出任何声响，免得惊动那个荷兰厨师。那个厨师有个毛病，一听到异常的响动就要起来看看。就这样，我溜到了三十米开外的了望塔底下，我从兜里掏出弹弓和几块小鹅卵石，瞄准了望塔上的那口钟，第一弹打远了，第二弹又打近了，卫兵离我呆的墙角越来越近，我有点慌了，手一抖，第三弹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只剩下一颗石子了。

“叮，叮，叮!!!”最后一弹打中了，钟声陡然大作。“当，当!!”那声响就像是巴黎圣母院的那口大钟发出来的。两个卫兵朝了望塔的方向猛跑过去，我急忙猫腰溜进厕所，这个厕所居然不顾卫生就设在厨房旁边。等我溜到鸡窝附近时，乔治出现了，一只鸡正在他的腋下扑楞，我们大功告成。

我喘着粗气，溜进急诊室，急诊室的设备虽然简陋，但电消毒



器还是有的。保持安静是生死攸关的事，因为急诊室就在指挥官的宿舍旁边。

我们正在摆弄消毒器的时候，乔治以为掐断了脖子的鸡，突然挣扎起来，咯咯咯绝望地叫着，在黑屋子的沥青地面上兜着圈子乱跑起来。我们赶紧腾出手来抓鸡，深恐这些声响惊动了隔壁的那位“大人先生”，经过了漫长得似乎没有尽头的追捕，我终于幸运地抓住了这只不幸的长着羽毛的动物。这一回，它要想死而复生是万万办不到了，我们焅了鸡毛，掏出内脏，把它洗干净。然后，又十分仔细地将鸡毛和内脏放进我的帽子，不用说，这是一个很古怪的容器，但是集中营里找不到一块布或一张报纸来代替这个奢华的口袋了。

乔治想出来一个聪明的主意：“我们在卫兵室房后撒些鸡毛怎么样？这样‘四眼’就会以为是卫兵干的。”

这个主意的意义不可小视，因为一个星的日本大兵们的伙食并不比我们好多少，把偷鸡的罪名转嫁给他们很容易让人相信。乔治已经深入虎穴，这一回该轮到我了。我溜到外面，悄悄地跟在卫兵的后头，他们还在谈论刚才了望塔上那神秘的钟声。

到了卫兵室的后面，我伏在地上，在松软的土地上用手挖了一个浅坑，然后，把帽子里那些杂七乱八的东西倒进坑里，抓了几把土将坑填上，又在坑表面留了几根鸡毛，显得这事是在仓促中干的。这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干完了我飞快地爬回急诊室。这时，那只鸡在消毒器里炖得正起劲。

乔治带着三星米奇林大厨的神气，踌躇满志地对我说：“请您稍等，一个小时后即可品尝，但望您多多包涵，此处没有胡椒。”

时间过得难以想象的慢，我们不敢掀消毒器的盖子，唯恐那香味飘出去，引起日本卫兵的警觉。

终于，乔治郑重地朝我点了点头，我们马上扑向那个“战利品”顷刻之间，那只鲜美无比的母鸡就被我们吞得一干二净，连鸡骨头

都被咬碎、吸干。那味道之美简直令人销魂。

当我们心满意足地打着饱嗝，咂吧着嘴，回味那刚刚结束的佳肴的时候，这一夜已经快过去了。我们清理完乱七八糟的东西，肚子里装着鸡肉，心中充满骄傲，准备回营房休息，我刚要出门，乔治突然站住了，盯着我。

“你的帽子哪去了？”他问，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了，即使记得，也肯定是句粗话，不适宜写到书里。我把帽子忘在卫兵室房后头了，上面印着我的战俘编号——124。这个帽子足以置我于死地。

东方既白，一抹灰色的晨曦透过云层，我必须把帽子拿回来，否则，我失去的就绝不是一顶帽子。这一次是背水一战，决不能有半点含糊。

我们来到急诊室拐角向四周看了看，我的心沉了下去——两个卫兵正在营房门口聊天，埋鸡毛的地方全在他们的视野之中。

乔治向我耳语道：“等我两分钟，我把他们调开。”

他略做停留，突然向另一个方向跑去，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在操场上吹口哨的声音，两个卫兵显然也听见了，他们停止了聊天，其中一个卫兵朝乔治挥手，示意他回营房去。乔治没动地方，另一个卫兵朝他喊了起来：“回去！”乔治还是没动地方。

两个卫兵朝乔治走去，只见他一溜小跑回到营房。机不可失，我不顾一切地冲出去，飞快地跑到卫兵室的窗前，抓起地上的帽子，这时，那两个卫兵正慢吞吞地朝营房的方向往回走，我小心地躲开他们，飞快地跑回营房。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那间简陋的宿舍，浑身疲惫地倒在铺上，我的心“嘣，嘣”的急跳着，肚子里却撑得满满的。我假装睡得很熟，直到吹响了起床号。

加藤中尉头两天没发现鸡少了，别人也没有觉察。乔治和我在沉默中受着煎熬，惊奇自己居然胆敢犯下如此滔天大罪。但是我们只能把这件事埋在心里，不敢告诉任何人——我们消受不起与别



人同享这一秘密的快乐。

第三天，加藤中尉捡鸡蛋时，终于发现他的母鸡少了一只，这一下可闹翻了天，他暴跳如雷，口吐白沫，命令所有的卫兵站成一排，挨个盘问、挨个痛殴，大耳光打得努力保持立正姿式的卫兵们东倒西歪。

我估计，他认定战俘不会干出这种胆大包天的事来，几分钟之后，他的想法被证实了——下士班长在卫兵室后面找到了几根鸡毛。

“四眼”得意洋洋地叫喊起来，迷惑不解的卫兵们又排成一排，“四眼”用日本兵击剑练习用的长木棍狠打他们的脑袋。我想，他大概是希望有人能主动站出来坦白，结果他得到的只是失望。

这时候，日本帝国军队的士气已经降到了新的低点。对于战俘们来说，“四眼”对卫兵们的惩罚不仅仅是个有趣的角色颠倒，而且也是那个年月里能享受到的最好的娱乐。

* * * * *

然而，在前面等着我们的将是另一个非常凄惨的冬季，吃的东西越来越少，连取暖的煤也不能充分供应。

在夏威夷时，我把集中营里的大部分日记丢在了船上，所幸，还有几页保存了下来，它们记载的正是这一时期发生的种种事情。下面是从我的日记原稿上摘录的未经加工的段落，其文风之质朴粗放正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反映。

1945年7月7日

今天天气阴霾，冷风阵阵，乌云弥空，不见天日。我的心情就像这天气一样抑郁阴沉。除了在这狭窄、拥挤的环境中毫无意义地苟且偷生之外，我什么也不想。我不知道，为了这种毫无意义的生存

而挣扎有什么价值？这种生活是否将永无希望地持续下去呢？外面的生活是否将是另外一种囚禁？你最美好的愿望、理想和雄心壮志是否会被现实碾得粉碎呢？

“幸福”这种事情有过吗？它是否仅仅是许多幻想中的一个？我告诉自己，我过去是幸福的，但我真的幸福吗？也许，过去的生活不过是某种新奇怪异的海市蜃楼而已。

我想，在这牢狱的围墙外面，我会找到这个海市蜃楼，但是我不敢肯定。对于将来的自由，我更是缺乏信心……这是令我丧气的阴郁的思想，但却是真实的。

不知是因为什么，或许是某种神秘的力量催促我往前走，它告诉我，只要再爬上一个山峦就会到达峰顶，可是，我担心自己失去目标，因为连绵不断的山峦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我知道我决不会放弃，是什么驱策着我这样做，我无法确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子都像今天一样。阳光普照。天空明丽的时候并不比这阴沉多雨的日子少，我了解这一点，它使我欣慰。

1945年7月15日

今天是星期五，集中营里发生了一个悲惨的事故。丸通码头来了一批货物——乙二醇，这是一种味道甜甜的有毒液体。在那里干活的战俘们把它当成了酒，有的人喝了它。他们回到营房时颇有醉意，也许，这只是我们的感觉，可是到了半夜，他们突然发了病，不省人事，呼吸困难，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喝这种“酒”的严重性。

十个最严重的病人被送进了医院，我们全力以赴进行抢救，给他们插胃管洗胃，最大限度地使用那些简陋的设备。

尽管如此，还是有四个人死了，他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博比·迈克劳德，一个很得人心的快活的小伙子；马克·哈维斯是个班长；吉米·加德和科伊·柯克曾患有严重的阿米巴痢疾，刚刚康复。博比和马克都是我十分亲密的伙伴，他们常常带给我从码头偷

来的食物。

他们的死让人难以相信，然而，死果真是如此重要的事情吗？我见到的死太多了，对死亡我已经无所畏惧；事实上，死亡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活生生的现实。人仅仅害怕未知的事物，死亡和泯灭对我来说是如此的熟悉，以至于生命和人世都变得极其陌生，有时候，我发现，只有后者才使我感到害怕。

1945年7月28日

明天我就二十二岁了，这似乎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我的面前。它将是我在战俘营中度过的第四个生日，像以前在这里度过的生日一样，我最热切的希望就是，过下一个生日时，会获得自由。在此之前，我从未如此自信，相信这个生日将是我在集中营里度过的最后的一个，当然，我心里对此仍然暗暗怀疑。

对于一个在集中营里度过如此漫长岁月的战俘来说，想象自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老实说，我想不出自己曾经吃过想吃的东西，曾与快乐的同伴开怀畅饮，想不出我以前曾读过书，还享受过另一种人生。

四年过去了，这四年也许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它们却全部消耗在集中营里。四年来，我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以至于我都难以认识自己了。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更不用说能干什么，我活着的全部目的就是获得自由。当战争的结束越来越临近的时候，我认识到，我可能会陷入失望。然而，这并未影响我的情绪。我相信，在我二十三岁生日的时候，我所企盼的将不再只是一碗米饭和一包“可加美”（一种细丝状的日本烟草）。

* *

* *

* *

* *

八月初，一连几天晚上，全体战俘都被赶到集中营外面去站

队,每一次都将近两个小时。乔治和我带上干粮袋,准备按计划见机行事。但是我们始终弄不清楚这种训练的用意何在,直到战争结束,这个疑团才解开。

八月十五日,卫兵室附近发出一种不寻常的嘈杂声,随后,集中营里的全体日本人在卫兵室前面的空地上排成一行,事情很奇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几分钟后,日本指挥官提着一个便携式的小收音机出现了,他把收音机挂在门前,然后站在卫兵前面喊了一声口令,全体日本伤对着收音机虔诚地鞠躬,收音机里发出一种单调的声音,卫兵们洗耳恭听,始终保持着鞠躬的姿势。过了一会,那单调的声音停止了,收音机里传出军乐,全体日本人还是那样毕恭毕敬地听着。我们迷惑不解地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只见他们一个又一个地朝着收音机鞠躬,最后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绝望地回到卫兵室。

我的日语不过关,听不懂收音机里说的是什么,阿瑟·兰斯的日语极好,他给我们传达了收音机里传来的大好消息。刚才广播的是日本天皇的讲话,讲话的开头遮遮掩掩,打了极大的折扣:“战争的发展未必对日本有利”。但是,遮掩了半天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日本战败投降。这位天皇还要求日本国民必须“忍受不可忍受之处境”。

“战争结束了!!!”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无法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人们互相拥抱,战俘突然变成了人,厨师把晚饭的定量加了一倍,许多人呕吐起来。宵禁没有了,人们三五成群地在营房外面激动地议论着,卫兵躲在屋里没出来。

第二天早晨,我们像往常一样集合点名,以往的规矩是,我们先用日语报数,然后弗洛斯少校向伊藤中士敬礼报告,伊藤挎着战



刀，神气十足地听着。

这一次，等伊藤露面后，我们就在弗洛斯少校的带领下，大声地用英语报数，报完数，弗洛斯少校故意不理睬站在那里等着听报告的伊藤（他是一个真正的坏种，后来被判处绞刑）宣布解散。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集合报数，也是最开心的一次。当伊藤满脸困惑，慢吞吞地转身退走的时候，我们高声欢呼起来。在卫兵的注视下，伊藤被军刀绊了一下，东倒西歪地进了卫兵室。

第二天，几架美国战斗机飞临集中营上空，兜了几圈之后，投下了一些杂志和香烟后飞走了。战俘们蜂拥而上，争抢这些东西。盟军知道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房顶上刷上了三个大字——“战俘营”。我不知道写字的材料是从哪儿弄来的，但我相信，这一定是弗洛斯少校从日本人那里搞来的。更令人着迷的是，几面英国国旗和美国国旗从营房的窗子里伸出来，随风飘扬。这些旗帜的拥有者不胜自豪，几年来，他们千方百计地保存着这些旗帜，为的就是这一天。

乔治·弗郎西斯、我和三个美国潜艇兵进了城，现在出营房容易得很，我们拆掉了营房周围的木板，径直走了出去，营房的大门已经形同虚设了。我们步行进城，当地的居民们用奇怪的眼光盯着我们，出乎意外的是，我们在通往城里的桥上遇见了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

他的飞机刚刚在新泻机场降落，……我的记忆与事实不符，美军飞机降落在日本的时间，最早也只能在8月19日或8月20日。这位美国飞行员正要征用一辆卡东进城寻找战俘营，战争结束前，他的飞机就发现了战俘营和我们干活的地点。

一种奇妙的感觉压迫着我们双方，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我们不能相信我们的眼睛，他则无法相信我们竟是这付模样。他肯定是日本投降后，在日本着陆的第一人，回到航空母舰后，他也肯定挨了批评，他建立了功绩，却没有得到表彰。他招呼一辆过

路的卡车，车没停，他掏出左轮手枪，第二辆卡车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

我们带他回到集中营，这件事激发了战俘们的热情，成了人们蜂拥进城的导火线。

那天晚上，我们五个人又进了城，进了一家酒吧，我们个个都是“大款”，因为我们有成条的香烟，和日本其它的地方一样，当时的新泻烟草奇缺，香烟成了比货币更受欢迎的一般等价物。

我记得自己刚喝了几杯日本的米酒——“撒开”，眼前就一片漆黑，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喝醉。几个小时后，我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一间陌生的房子里，几个日本姑娘围在我身旁，一起来的那几个战友，对我毫不关心，已经离开了。我头疼得要死，心神不安地坐了起来。

但是，那几个日本女人很快使我安定下来，她们给我一些米团和茶水，昨夜的兴奋和酒精已经击垮了我，我的样子看起来一定非常可怕。他们给我拿来一条被子，我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夜。我对日本女性的好感由此更加坚定。

没多久，几架大型的美国飞机飞到集中营上空，投下食物、衣服和药品等各种东西。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点起火来烹调那些久违的食物。集中营里出现了几百个小火堆，那天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吐了。

彼尔·斯图尔德和我坐在那里，四周堆满了药物。如果一年前我们有了这些药，它们会派上极大的用场。我们为找不到阿斯匹林而发愁——包装盒上没有说明。我们都换上崭新的美国军装，看上去怪模怪样的，我还戴了一条领带，我今天都很少这样装束。

乔治给我照了一张相，当时我穿着新军装，站在开音乐商店的日本女人旁边。乔治到过这里几次，这个女人对他很好，卫兵不注意的时候，她还塞给他一些米团和别的小东西。后来，这张相片洗了出来，我几乎认不出来那个穿着不合身军装的骨瘦如柴的家伙，

但是仍然记得那个日本女人。我们曾送她一箱东西作为报答。

空投物品的飞机络绎不绝,有的物品空投时离地面太近,降落伞来不及打开,货箱砸穿了营房房顶;有一个货箱掉在急诊室里,离我和乔治只有咫尺之遥;有的货箱投到了集中营之外,两个居民被砸死了;但是我们对飞行员并无怨言。

几天后,几架重型鱼雷轰炸机飞到集中营上空,盘旋了几圈,投下了更多的食物、香烟和杂志;在这些东西里,我发现了一封信,看着它,我几乎掉下了眼泪。即使现在想起它来,我仍旧感动不已。信的全文如下:

美国军舰列克星敦号致前美军战俘:

你们即将获得自由,特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明天,东京附近的美国空降部队将联合行动,在日本着陆,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将随后而至,不久,我们将在东京的银座热烈庆贺我们的胜利。我们希望这个包裹能对你们有所帮助,为你们在战俘营中的最后一个小时带来更多的欢欣。

无论在海上还是在陆地上,我们都深深地了解这场战争的严酷,我们将英勇作战。我们深知,你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谨此脱帽致礼,向你们表达衷心的敬佩和崇高的敬意。

你们建立的功绩,你们承受的痛苦,你们所付出的一切,使最后的胜利终于来临。为此,请接受我们诚挚的谢意。

这个包裹是由“列克星敦”(蓝色魔鬼号)甲板上起飞的美国重型鱼雷轰炸机空投的,里面的物品是由列克星敦的摄影记者收集的,他们也参加了空投工作。

我们的目的是直接而真切的,我们希望你们都交上最好的运气,尽快地回到美国大陆,回到那丰饶繁荣的国家里。当你们到达目的地,当你们从兴奋和激动中安静下来的时候,你们会有足够的时间。如果能收到你们的来信,我们将万分高兴,我们还将在海上

逗留一段时间,希望知道你们的情况。

签名:

J. R. J. 史密斯 印第安纳 伯林顿
R. I. 贝利 加利福尼亚 伯克斯弗里德
奥达奥路 406
C. V. 特纳 密西西比 杰克逊
布鲁顿街 867
D. F. 泰纳 宾夕法尼亚 皮特斯伯格
伯尼大道 4534

下面的文字是我在新写写的日记的最后一段。

1945年8月23日

可以说,我是在战俘集中营里长大成人的,我的绝大部分人生经验都是从生活的阴暗面中得到的——饥饿、病痛、残忍、抢劫、拷打、堕落和腐败……这一切都在死亡的笼罩之下。死,即使不是近在咫尺,也总是阴森森地隐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内。

我的经历使我了解了我的伙伴,更重要的是了解了我自己,它撕毁了文明的面纱。虽然我并没有因此而玩世不恭,但是这段经历确实把我变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怀疑一切。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在这茫茫尘世之中还有善良仁爱的种子。

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地关注自己,以至于在我们的视野中,别人都变得模糊不清。平民百姓并不认为自己在别人面前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渺小个体,如果这样看待他们就将铸成大错。这是我从战俘生涯中学到的学问。通过这一课,我就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这样一种思想——在此尘寰之中,我低微渺小得很,我的存在既谈不上什么意义,也谈不上什么价值。



我必须尽一切努力去扫除我对俘虏者的深仇大恨和极度轻蔑，我必须从记忆中抹去那饥饿的痛苦，残暴的折磨，施虐的凶狠，拷打的痛楚以及近几年中那无时不在的死亡的威胁。

生活在前，我将紧紧抓住它，把它拧干。在结束这个笔记本的使命之前，我为自己约法二章：

第一，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必须在圣诞的庆宴中沉静下来，问问自己：“我还是战俘吗？”

第二，当我被某些衣冠楚楚、城府高深、无可挑剔的人物弄得不知所措的时候，我要尽快地在心里描绘出他在新泻的高架桥上推翻斗车的样子，他拣起那些啃剩的苹果核时的丑态，他抢在别人前面抓起地上的烟屁股时的尊容。这样，我就可以把他看得更清楚。

* * * *

现在读起这些文字，我发现，自己当时是多么年轻幼稚，但是，我始终遵守着两条约法。

我们都在等待着一个重要的时刻——前往东京。日本的孩子转眼功夫就学会了向我们乞讨糖果，我们去看望那些待我们较好的工头，给他们带去食物、香烟和衣服。佐藤一类的坏蛋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人极其敏感，早已躲了起来。

甚至那些病得很重的人似乎也康复了，这真让人难以想象。仅仅几天有营养的伙食和愉快的心情就治愈了这些濒于死亡的人，只有少数病人不得不用担架抬出营房。

一支车队把我们送到了新泻火车站，这一次，我们的感受与来时迥然不同。沿途的日本人朝我们微笑，鞠躬，没有人朝我们吐唾沫，看不到一面日本国旗。

在东京火车站，我们受到了护士和女兵们的欢迎。女兵的出现令我们十分惊奇，在我们离开加拿大的时候，还没有女兵。美国人

是如此的仁慈慷慨，组织得是如此的严密有序，样样事情事先都做了安排。直到今天，动辄无缘无故地抨击我们邻国的行为仍然让我无法容忍。有这样伟大而慈善的人民与我们共享这个大陆是幸运的，尽管对他们的外交政策我不得不经常保留自己的看法。

就我们所看到的局部情况而言，东京就象一个点缀着古怪水泥建筑物的乱七八糟的瓦砾堆，那些古怪的建筑物就像光秃秃的草原上耸立的储藏青草的塔，又像一个装满了烟头和烟灰的巨大的烟灰缸。只有火车站完好无损，我估计，这是盟军计划好的，一旦攻占东京，盟军就要启用这个火车站。

我们先洗澡，用的是两面喷水的淋浴器，然后，又到灭虱中心灭虱，再经医疗检查和大便化验，最后，根据国别和健康情况进行分类。我讨厌看见那件从实云道拣来的旧毛衣，讨厌那顶帽子，它从香港赤柱的“黑色圣诞节”以来就一直跟着我，我毫不留恋地把它们扔了，但没告诉别人。有的人被飞机送往马尼拉，我们乘摆渡来到了一艘停泊在海湾里的巨轮上。巨轮上的壮观景色令人难忘。

这艘巨轮是“奥扎克”号，它的房间和设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当初是从温哥华乘“艾瓦提”号去香港的。与来时的人数相比，我们回去的要少得多，而且，我们这些能够重返家乡的人也完全变成了另一付模样。

那天晚上，船起锚了，我们离开了日本。我站在船栏扶手边，望着那渐渐远去地土地。

“我永远不再回来”，我默默地对自己说。所有的同伴都怀着同我一样的心情。

我错了，驾着生活之舟航行了四十个春秋之后，我还是不得不打破这最后的誓言。

第六章 另一个世界

如果一只能够听懂人类语言的螃蟹，听到我们不假思索又毫无歉意地把它归为甲壳类动物，并据此安排它的命运，它可能也会充满一种个体的义愤，会说：“我不是那种东西，我是我自己，只是我自己。”

——威廉姆·詹姆斯：
《宗教体验种种》

叙述返回加拿大头几年的生活是很困难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四年，产生陌生感是自然而然的事。就某些方面而言，回家后的任务比在战俘营更艰巨，在那里我们的全部目的只是活下去。

我们乘坐的巨轮没几天就到了关岛，这里的食物丰盛得难以想象，就是在今天要把那时吃过的东西都找来也无法办到。美国海军想方设法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食谱。遇到老朋友是非常有趣的，自从香港别后，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我们互相不乏渲染地讲述着在日本时的经历，与幸存者的重逢温暖人心，战友们死难的消息则令人黯然神伤。

我们被送进医院，再一次经历了一连串的检查、化验和问询。情报机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对俘虏、关押我们的日本人，尤其那些坏种的情况掌握得如此之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在这时，一个沉重的打击降到我的头上，一位医生把我叫进办公室，充满同情地对我说：“凯姆本，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我以为他要告诉我的是，我的家里什么人死了，或者别的类似的不幸的消息。我的体重在增加，我根本想不到我自身会出现什么问题。

他说得非常慢：“看来你得了结核病，我们准备再做一些检查。”

我的心沉了下去，在魁北克的杰弗里·黑尔医院里，有个肺结核隔离室。我和家里人常去那里看那些可怜的病人，他们躺在挂着帘子的阳台上，就是在最寒冷的冬天也如此。那里的理论是，控制这种病的唯一方法就是让患者不断地呼吸新鲜空气，许多病人死在了阳台上。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以为那些人是被冻死的。听了这个医生的话，我马上联想到自己：我怎么才能不被送到那种地方去，以免再一次变成囚徒。

那天晚上，我几乎彻夜未眠，第二天几乎没吃什么东西。做了几次爱克斯光透视和其它检查后，我的心里有了底。

两天之后，那个医生又来看我，这一次，他笑容满面。

“喂，凯姆本，你用不着这么郁郁寡欢，今天我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你胸部的爱克斯光透视很清晰，唾液检查的结果也很好，我想你可以归队了。”

关岛的风光宜人，这个人烟稀少的热带岛屿，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生气勃勃、规模宏伟的军事基地。大型的空军基地、一排排的高楼、奔流不息的卡车、高大的挖土机和其它各种车辆为美国的组织能力和专业技术谱写了一曲颂歌。我乘着吉普车在岛上兜了一圈，入伍五年多，我第一次看到吉普车，司机对此



惊诧不已。

我们在这里的活动受到一些限制，因为还有些日本军队没有投降。我想办法看了看那些已投降的日本战俘，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角色调换。一些日本战俘仍不相信日本已经投降了，我想可以用另一种方法让他们信服——告诉他们我在他们的战俘营里度过了四十四个月的光阴，当了三年多日本人的战俘。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我对这些当了战俘的日本人抱有一丝同情，这是一种不寻常的体验。直到今天，即使把一个小动物或一只小鸟关在笼子里，也令我厌恶。

我们贪婪地阅读着最近的报纸和杂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及其影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对政治的理解十分天真幼稚，现在可能仍是如此。但是，我担心二次大战的胜利者会重蹈1918年一次大战胜利者的复辙。他们对战败者的过分严惩，会引起另一场战争，会造成新的灾难。战后，德国取得了成功，日本则更上一层楼，这些事实证明我的预感并非没有道理。

我们觉得自己很有点像古老传说中的一个角色——那一觉睡了五十年的里普·范·温克尔，一觉醒来，世事陡变。那个名叫弗兰克·西纳特拉的是哪一位？那些声名远扬的将军们又是何许人？他们都干了些什么？麦克阿瑟将军现在成了了不起的英雄，可是，在我的朋友们那里——无论他们是来自巴丹，还是来自科雷希多岛——麦克阿瑟的名字是绝不会出现在他们寄圣诞卡的名单上的。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来自菲律宾部队的美国人说过他的好话，在人们看来，把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称为“掩体里的道格”最恰当不过。和我们那些派到香港的高级军官一样，他从来没有到打仗的部队那里去走一走，看一看。据乔治·弗朗西斯说，在科雷西多岛的时候，麦克阿瑟总是躲在深藏在地下的工作室里，从不曾冒险出来过。人们共同的想法是，如果没有这位将军，我们的抵抗会组织得好得多。

几乎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不曾知道的新事物，喷气式飞机、火箭筒……，五花八门，无穷无尽。

我们确实获得了新生。德国蓄意灭绝犹太人和其它“劣等种族”的消息骇人听闻，我希望这仅仅是宣传，我们当过日本人的俘虏，日本人干出这种事是不奇怪的。德国人能这样干吗？这肯定是夸张！然而，我们又错了。

我看的第一部电影让我难以忘怀，遗憾的是，我忘记了它的名字，只记得它的名字与一首歌的名字相同。它讲的是一个复员军人重归故里的故事，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没有陈腐的说教。影片重现了北美的风光，房屋、街道、汽车、女人和孩子……孩子的嬉戏和欢笑特别让人神往。

我喝的第一杯啤酒却让人失望，啤酒是用罐装的，味道很奇怪，也许，这种容器使人产生联想，觉得里面有一股白铁皮的味道。我仍旧很爱吃甜食，人如果长期得不到适当的饮食，一旦得到，都会如此。显然，我喜欢甜食的习惯也是使我不欣赏美国啤酒的原因之一。我很奇怪，一个领导世界的国家为什么会容忍如此糟糕的啤酒。不用说，这是我的偏见。

在经过几天的检查和消毒之后，我们登上了美国巨轮“奥扎克”号，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这个季节在南太平洋上航行是非常惬意的，船上的食物仍然丰富无比，可以尽情享受，美国海军的伙食是天下一流的。

船上的时间充裕得很，有的是时间在甲板上闲坐，或者懒洋洋地倚着船栏晒太阳，欣赏船头冲开海水时，海豚们的杂技表演。

我第一次认真地思考自己在这个崭新的世界中的位置，掂量自己各方面的条件，不情愿地得出一个结论——我没有任何资历。1940年高毕业后，我就在一个被称为冷饮小卖部的地方找了一个工作，当时，我每周的工资是十块钱，外加一点小费，工作时间长，干活时还得细心周到。它把我训练成了一个很好的厨师，并且我的



烹调手艺至今没丢。

星期六是发工资的日子，有个星期六只发给我一半工资，因为我打碎了一个咖啡过滤壶。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加拿大陆军来福枪兵团的征兵启示，得知当兵一天能挣一块三毛钱时，我的爱国热情勃然而起。从此，我再也没回冷饮部，也许，冷饮部的老板对我的不辞而别也颇感欣慰。1940年7月，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参了军。为了符合征兵条件，我撒谎说我十九岁，没人相信我那么大，因为我当时还不到十七岁，看样子则比十七岁还小。

不用说，我不想重操旧业，那么在《蒙特利尔报》找个工作如何呢？在学校的头几年，我曾被选为优秀送报员，毕业前的最后一年，我在这家报社的魁北克分社干过。但是我现在能干什么呢？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摆在我的面前——上述种种资历根本算不了什么。而近五年多的“训练”几乎没教给我们任何用得着的技能。

那么回到东方世界如何呢？有几个“中国通”和我很要好，他们战前在香港生活的很不错。问题是，在那里活动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也许，我再深造一下日语会在驻日美军中找到一个不错的机会。

我的思想见识是在下层生活中形成的，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生活艰难，机遇很少。我也想到重返校园，上学深造，但我深知，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我在魁北克长大成人，那里只有有钱人才能上大学。我如果住在蒙特利尔，那么奖学金就根本不够支付食宿和其它各种费用，何况，我几乎不可能申请到奖学金，更不用说家里还指望我帮助挣钱养家。

船在夏威夷抛锚，补充淡水、燃料和食物。来欢迎我们的当地人，在乐曲声中跳起了富有地方色彩的草裙舞。我把将来的事放到了一边，和六、七个同伴下船游览。

我认为，此生难得再来这块乐土，不如尽兴玩玩。大家无不赞成，一个同伴有一把日本战刀，当地军人对它极感兴趣，我们把它

卖了二百美元。看来我们运气还不错。

当时,我们还穿着住院时发给我们的新军装,不得不设法躲开当地的军警……当我们大吃大喝,挥霍那二百美元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出乎意外,但并无坏处的小小插曲——我们被捕了。

是当地的军警将我们拘捕的,我们的游览观光只好到此结束。他们不相信我们是送返加拿大的前战俘。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被带到了海军医院。在那里我们被奉为上宾,并换上了合身的海军陆战队的制服。我们向医院的人解释我们误了上船的原因,可是没人相信。

第二天,我被带到一个地方,估计是英国领事馆。一个老练的红脸上校坐在我面前(他顶多四十岁)。

他严厉地看着我,说:“步兵凯姆本,你惹了大麻烦,你知道从船上开小差意味着什么吗?”

“当然,先生。”我胆怯地回答。

“你知道我们打算怎么办吗?”

“不知道,先生。”

“我们打算用飞机把你送回家。”说完这话,他咧嘴笑了。

后来,我们被带上一艘加拿大医疗船,这船正在夏威夷停泊,准备开往香港。我在船上意外地遇到了一位老朋友——凯·克里斯蒂。她是一个护士,在香港时曾和我们在一起。1942年她随一些加拿大公民及外交官被送回国,她头一次遇到回国的战俘,对战俘的经历极感兴趣,对老朋友的遭遇更是兴趣盎然。

我巴不得在船上多呆些时候,因为船上干净整洁,招待又热情周到。毫无疑问,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说,这是个很不错的地方。但是,没多久,我们就被带下船,塞进一架很大的水上飞机。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以前我在纽芬兰的干德机场见过许多大型轰炸机的起降,当时,它们正往英国空运。那时我曾想,我应该参加空军,看着一架架飞机从跑道边缘拉起,马达加速旋转,然后



闪电一般地离开跑道凌空而去的情景，真让人神往。

这架飞机可能是 PBY 型，其内部像个迷宫，各种管子安装在一起，制成一个个折叠床，床排在飞机的两侧，我记得共有三层。起飞时我们用皮带把自己捆住，听起来，这似乎很不舒服，实际上，比现在那些拥挤不堪的客机舒服多了。

飞机在一阵轰鸣中起飞了，在降落之前，这种轰鸣声似乎一直伴随着我们。除此之外，飞行极其舒适、顺利。在这轰轰声中，我打起了瞌睡，好像才过了几分钟，副驾驶员就回到了机舱。

他十分平静地告诉我们：“飞机就要降落，请把皮带系紧。”

我觉得这么快就到了三藩市未免不可思议，我的感觉不错——飞机的一台发动机着火了，不得不强迫着陆。也许“着陆”这个词用得不太恰当，因为我们落在了水面上。一台发动机着火，大概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降落得十分顺利，如果不是一名机组人员拿着灭火器从飞机里钻出来，我们压根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过了一会，一艘巡逻艇来到飞机旁，把我们接上了船。

第二天早晨，我们上另一架飞机，此后的旅行平淡无奇，但是，我没再打盹。当飞机飞越金门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梦中，它比我想象的要雄伟壮观得多。

唯一使我后悔的是，在夏威夷的插曲中，我把我的小包丢在了船上。那个包是我在新泻时为逃跑准备的。里面有几个笔记本和一部《袖珍诗选》。这些东西是我的无价之宝，《袖珍诗选》已经绝版了，好在我在蒙特利尔的旧书店里又买到一本。有两本日记被一个朋友捡到，回加拿大后还给了我。

其它的笔记本一定进了垃圾箱，对于文艺界来说，这未免不是一件幸事。

此后几天我是在海军医院度过的，这所医院离三藩市不远，只隔一座桥。医院给我们进行了体检，其过程与关岛相同。我和几个美国潜水兵同一病房，他们是我在新泻时的难友。一天晚上，我们

不费力地溜出医院，穿过那座桥，进入三藩市。

这次出游几乎以灾难告终，第一个酒吧就拒绝卖给我们酒，其理由倒并非全无道理，因为我看上去确实显得太年轻了。威洛比，一个粗壮、鲁莽的潜水兵从柜台外头俯过身去，一把抓住那个倒运的侍者，教训了他一通（也许，还能找出最好的词来形容他的风格），告诉他，我是什么人。

我以为别的侍者会打电话叫警察，没想到，这件事竟以典型的美国式的慷慨大度告结。挨训的侍者宣布，酒可以喝，但只能在这间酒吧里。这对我们既是一个安慰，又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允诺。因为我们在三藩市只知道这一家酒吧。许多年后，我旧地重游——我爱这个奇妙的城市。

医院当局密切地注视着我们的行动，几天后，我们被分到加拿大前战俘分队。火车将我们送到西雅图，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又乘船来到风光优美的维多利亚。在那里，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管乐齐奏，年轻人跳着苏格兰舞。一群群亲友沉浸在欢乐之中。我一下子爱上了西海岸，决定如果我留在加拿大，就以西海岸为家，这件事我总算做对了。

我们在维多利亚住的营房座落在戈登·海德，那里的设施之好，令人惊讶。床上铺着床单，伙食之好甚至胜于美国。我记的很清楚，刚参军时，早饭是豆子，现在，这已经成了历史。连列兵都有领带和合脚的鞋子。人们听说伙食要定量供应觉得又惊奇又有趣。

不久，我们踏上了最后的归途，在回到魁北克的途中，我们十分愉快，住宿条件很好，我们都被宠坏了。

在威内皮格车站，大多数掷弹兵都有成群的亲友来接，乐队大奏其乐，站在站台上看着这一切，让人激动不已。对于所有的人来说，这一场面既非娱乐，亦非游戏。有的人听到了妻子、儿女死亡的消息，有的人则收到了情书。

第二天，一些从退伍军人事务部来的律师上了火车，他们对我

们做出的各种选择做了简单的答复,告诉我们哪些选择对退伍军人有利。二次大战后,加拿大在帮助退伍军人方面比别的国家都搞得更好,这是值得自豪的。

我听说,愿意上学的人政府将为其付学费,每月还发六十元。想当初,我在魁北克市政府对面被同伴们称为“雪茄城堡”的冷饮店里卖冷饮和人造泉水时,每周才挣十块钱,政府发的补贴比我那时挣的多多了。我平生第一次想,也许我能上大学,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

一个从蒙特利尔报社来的记者交给我一封乔治·卡彭特写给我的欢迎信。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乔治就是报刊经理了,他现在是总编。在信里他邀请我到蒙特利尔报社看看报纸的销售情况。这种礼貌周到的作风表现了报界人士的典型特点。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也劝我继续上学。

魁北克火车站挤满了人,我们列队下车,寻找亲人。这时管弦乐队奏起了我们团的团歌,我们是第一批回到家乡的来福枪手。我不知道,人们想看到什么?

我们家人站在人群的前面,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他们,他们已经等了很久。

重新适应家庭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回家头几天,我睡不惯沙发床,吃不惯家里的饭菜,更难以适应的是我期待的家庭生活方式。我不再是刚刚入伍的小青年,也无法扮演凯旋英雄的角色,真正的英雄没有几个能凯旋的。

我的两个姐姐都在国外工作过,马杰里(巴尼)是第一批到国外工作的护士,自从1940年我入伍以来,一直没见过她。诺伊曾在空军工程部从事与雷达有关的工作,工作地点在英国。巴尼已结婚,嫁给了一个尚在欧洲大陆的加拿大下士,他们的证婚人是我妈妈的兄弟——约翰舅舅。约翰在第一次大战时是个随军牧师,后来成了英国大教堂牧师会中的一员。我的另一个舅舅——查理(他曾

开枪打死了他的团长)在非洲皇家步兵团里任军士长,也在欧洲。

巴尼与另外四名护士被上级选中,成了加拿大第一批整形外科队的成员。这个工作在当时非常急需,负责治疗那些严重烧伤的病人。她和她的女伴们在此后的岁月里一直保持着联系。

诺伊也想当护士,已获准在温哥华总医院接受培训,她已经上了几个礼拜的班。

我弟弟比我小九岁,我离家时,他还在上小学,现在正上高中,我们都有许多事要忙。

我妈妈是个女强人,是一家之主。我不愿意抛头露面,又不想迎合她的某些奇思怪想的性格让她很失望。她对家里的事管得太严,没多久,我就感到很压抑,我希望能得到多一点的理解。

我爸爸在家里总是扮演一个不起眼的角色,我妈妈曾两次离开他回爱尔兰长住,后一次还带上了三个孩子。我入伍以前对他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年轻时没受过什么教育,一贫如洗地从苏格兰来到美国。

魁北克的冬天非常冷,小时候,我记得他下班回家满面寒霜,鼻子里呼出的水气都结成了冰。他常常从大衣兜的深处掏出一个无花果或一颗海枣递给我。他在家不主事,家里也不要求他主事,我甚至不记得他跟我们一起度过假。

我回家后,在清爽的秋夜,和父亲做过多次长谈。每次都是他主动找我。他是个沉静而温和的人,为我感到非常骄傲,但是,他又为我担忧,希望我至少能避免他犯过的错误……特别是没有受到过象样的教育。他告诉我,他早年在美国为了生存去演奏萨克斯管,有一个时期还给人画过明信片;为了谋生,他还当过职业的本鞋舞演员。

他从苏格兰到达美国时身上只有几英镑,在到加拿大之前,他以演奏几种东方乐器为生。在加拿大的金斯顿,他参加了加拿大皇家炮兵乐队,在那里他遇到了我的母亲。不久,他们结了婚,搬到了



魁北克。

像一般的年轻人一样，二十二岁的我十分惊奇地发现，在我离家的几年里，父亲的见闻变得如此之广，思想言谈竟然如此清晰。我们的关系变得十分亲密。不幸的是，这种关系持续的时间不长，父亲在我回家不久就去世了。死时才五十八岁。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他没能看到我大学毕业。

回家的头两、三个星期，我的社交活动频繁，经常与中学的朋友和团里的伙伴们聚会。这种聚会无非是坐在烟雾缭绕的酒吧里，一边大谈特谈我们的战争经历。没多久，我就厌倦了这种生活。我感到这种社交活动并没多大意思，母亲对我晚上迟迟不归大为不满，有时我不在家过夜更让她生气。

我变得焦虑不安起来，并且上吐下泄地病了一场。食物在生活中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了。我还是不能决定下一步该干些什么，我和一个朋友乘火车到纽约玩了一趟，因为是退伍军人，我们受到了各种优待，只花了很少的钱就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大众产品。但是，这次旅游并没有减轻我的烦恼。

我回家后不久就接到了蒙特利尔报主编乔治·卡彭特的电话。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邀请我到蒙特利尔去，并负责我在温泽旅馆的全部费用。我们进行了一番长谈，他再次劝告我继续上学，并建议我上麦克杰尔大学，以此作为事业的起点。

天真幼稚的我径直去了麦克杰尔大学的医学院，负责学生注册的麦金托什博士，他和蔼可亲，对我十分同情，向我解释说，在上医学院之前至少得在大学念够三年。他的话惊得我目瞪口呆，我从来没想到得在学校“浪费”七到八年的光阴。他还告诉我，在报名的人中，我的条件是相当差的，因为上面要求照顾退伍军人。当时我穿着便服。看上去可能像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

幸亏我忍住了，没有反唇相讥，但我告诉他，我参军已经六十五个月了，至今仍在加拿大皇家步兵第一营服役。麦金托什博士对

我更加热情,鼓励我下学期到艺术学院注册。

我下定决心,放弃到远东找工作的非分之想。今天,当我步入晚年之际,我很奇怪当年我为什么会冒出那种奇思怪想。如果我到了那里,现在又该如何消磨时光呢?我会发迹高升,加入某个董事会,登上经理的宝座;还是会沦落潦倒,充役于某个俱乐部的酒吧,以一个老练的侍者身分终了此生呢?我回到了魁北克,向所在部队提出退伍的要求。部队的医疗部门不同意,但是我说服了他们,告诉他们我想脱离军队。我在部队得到的唯一真正的荣誉称号就是,在赴香港军队中我是第一个要求退伍的士兵。我的肠胃仍然常犯病,但是,我并没有跟部队提出这一点,脱离军籍是我唯一的愿望。

离开家对我是一大解脱,我是个性格孤僻的人,不愿意相信任何人,我想,我几乎不像个社会性动物。

对我来说,蒙特利尔是另一个世界。我从没在大城市住过,即使在今天,蒙特利尔仍是世界上令人兴奋的城市之一。住房成了我的首要问题,经过一番奔走,我终于在城东找到了一个简陋的房子。我在下等饭馆吃饭,碰到极差的饭菜,我不得不跑出饭馆呕吐一阵。但是,说真的,这种饭馆并不算坏。我很兴奋,对大学生活有了初步的了解。

大约就在这时,我在圣·凯瑟琳街与原部队的一名军官——查尔斯·普瑞斯邂逅相遇,我估计当时我的模样一定很糟糕。当我告诉他我是如何生活的时候,他大吃一惊,于是领我去见他的一位老朋友,这个人在大学里工作。

这个人把我安排进大学宿舍,食宿部分减免,我对此不胜感激。但是没多久,我就担心起来——我发现这是个神学院,而我从小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不过,事情并没我想象的那么糟,不管怎么样,我先乘车在校园里兜了一圈。

经介绍,我和我的同室唐·克拉克认识了,我们彼此都十分客气,因为我们都把对方当成了神学院的学生。后来,唐问我,他喝酒



我是否反对，我马上向他保证只要他肯分我一杯，我就绝无异议。

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这一友谊持续了四十年，直到他去世。唐过去在海军干过，在入学之前，他已有一定的大学经历，他的计划是大学毕业后去经商。他是个美食家，还是个天才古典钢琴演奏家。我对他选修哲学和心理学，却只选一门与经济有关的专业课的做法很奇怪。看来他这样做确实不无道理——后来他成了一名十分成功的商人。

我很喜欢他选的课，他则把我当作他所有论文的共鸣器。我在这里的学习仅仅是为了赢得上医学院的资格，我所受到的真正的大学教育间接地来自于唐和其他的室友。

我们宿舍楼的第二层住的全是无神论者，我们的房间成了这些人聚会的要地。也许，这是因为我们的宿舍里经常有酒喝，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唐的魅力，和我们一起喝酒的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人物，大多数是退伍军人。

杜根是个大贵族，他的家庭至今还拥有贵族庄园。他的祖先曾在1759年的魁北克战役中担任少将旅长，是沃尔夫将军麾下的干才。那个庄园就是为了表彰他为祖国服务的功绩而分封给他家的。杜根曾在海军部队当过上校，在战争中表现杰出。他对德国人极为赞赏，德国人的效率和纪律让他十分钦佩。他的这些看法与我针锋相对，我的思想仍然深受一位朋友的影响，这位朋友是我在香港当战俘时认识的，他是一个来自威尔士的矿工。

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这些分歧，尽管我们的出身、背景天壤之别，我们仍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的城府很深，精于处世之道，他的狡猾变通、玩世不恭和妙语连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平等友好，没有一点屈尊俯贵的味道。

学校放假的时候，我们乘汽船沿河而下，到他的家乡梅·毕尔去玩。对于加拿大和美国的富人来说，这是个可以尽情享乐的避暑胜地，但是，我知道它不是为我准备的。

丹尼尔·奥都埔住在我的隔壁，他是哥斯达黎加的律师，表面上研究哲学，实际上计划改变他的国家的政治。他是个待人和蔼、相貌英俊、喜欢拈花惹草的拉丁人，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很讨人喜欢，杜根管他叫“伯爵”，他也因此而著名。

“伯爵”和唐学的是同一门哲学课，他们经常在我们屋里讨论问题，我发现这种讨论对于我的职业比我学的数、理、化更有用。

“伯爵”一学年后回到了歌斯达黎加，后来，成了国家总统，这是中美诸国中唯一一个真正的民主政体。

琼斯·莫里斯是我们二楼最年轻的学生，他来自魁北克的一个小城镇，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对“炼狱之火”的关注远远超过了眼前的世俗世界。他可能是我们中间最聪明的人，他真诚地相信自己应该成为一个牧师。在我们这些坚定的无神论者和虔诚的教徒之间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论，争论不分胜负。但是，琼斯·莫里斯对我很有帮助，他给我讲述生物学，对此我以前一无所知。

他后来从事过一段昙花一现的医疗工作——在一个医学院当院长。不久，被皮埃尔·特鲁多发现，看出他是个当官的材料，他成了加拿大国家铁路主席。我给他写过一封充满乐观情绪的信——

“琼斯·莫里斯，我常常在心中想象你在愚昧的非洲治疗麻疯病人的情景，不过，我估计你的病人一定围坐在那些大桌子旁公平地分享一切，这是实施教义的大好机会！”

R. B. Y. 斯科特博士是学院的院长，他富于同情心，帮助我度过了几次危机，使我对他格外尊敬。每个星期天的晚上，他和他的妻子就把住校的学生请到他们家去喝茶，并讨论有趣的问题，特别是中东的问题。

他是一个富于献身精神的圣经学者，对当时在死海发现的古代羊皮手卷极感兴趣，这是一个极其诱人的问题。他关于圣地的观点与报上登载的大不相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为了完成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他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从事专门研

究。

对于所有这些朋友和许多别的人我欠负甚多，良药治病，他们为我做的远远超过了良药。我的肠胃病没犯，总算凑合过了那几年，我觉得十分幸运。

使我惊讶的是，我在大学里的功课很好，第一学年后，我又多修了几门。1947年秋，我十分幸运地进了医学院，开始了新的生活，我的军旅生涯至此才真正结束。

我对不起许多朋友，对不起我的家庭，是他们把我推进了生活的洪流之中。我最愧对的是一位金发女郎——艾琳·纳森，在医学院上第一节课时她就吸引了我。好事多磨，但是，我意志坚强，毫不动摇。在上医学院的第二年年底，我们喜结连理。

从麦克杰尔来的大学生中，我们是在医学院结婚的第一对。她忍受着我那难以预料的肠胃病的折磨，挣扎于早年的恶梦般的生活之中，支撑着家庭财政的危局，克服了只有上帝才能记清的无数困难。我今天取得的全部成功，都不足以回报她对我的恩情。我可以十分骄傲地说，在她所从事的专业中，她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她的成就现已被其母校——新布鲁斯威克大学所承认，该大学已授予她名誉科学博士学位。

婚后，我们在英国的格威尼实习了两年，那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光，此后，我们在伦敦度过了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开始了各自的专业训练。在特克斯大学，我们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各自的专业……多好的特克斯人啊，英国给我们留下了愉快的记忆和许许多多的朋友。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就出生在那里。

我们从英国回到温哥华，偌大的一个温城里，我们只认识一个人，然而上帝对我们非常仁慈，我们在这里生活得不但有意义而且充满兴味。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我是幸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许多同志的不幸是命里注定的。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它与人的先天条件并无直接的关系，

也许,有些人始终未能摆脱战俘营中的恐怖岁月带给他们的影响。自由并不仅仅意味着走出带着倒刺铁丝网的围墙。对这些同志我充满了同情。



第七章 尾 声

我的心沉重异常，充满悲伤，
为了那些金子般的朋友，
为了那步履轻盈的青年，
和那长着玫瑰色嘴唇的姑娘。

——艾尔弗雷德·E·霍斯曼

《什罗郡的伙伴》

至此，我必须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本书以我和我的妻子乘波音747去香港开头，为什么我要提到旁边坐着的那位日本女士。

我离开日本已经整整四十年了，离开日本那天，我曾发誓，绝不再踏上这块将引起我回忆往事的土地。我不想冒着回顾战争往事的危险，沉湎于怀旧之中。然而这种记忆正像昔日的罪恶一样，将我们长久地笼罩在沉重的阴影之中。

我的女儿玛俐使我改变了过去的誓言，她虽然只有二十二岁，却已经走遍了世界，她穿越亚洲，乘车横贯西伯利亚，到过许多富有浪漫色彩的地方。而我则宁愿舒舒服服地到“国家地理博物馆”去了解这些地方。她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从北至南横跨日本，从北端的北海道到南头的九州岛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她特意到了我当过两年战俘的新泻。在那里，她遇到一个名叫



须田纯子的可爱的日本姑娘，在她的邀请下，玛俐在她家住了几天。

她们一起去市政府询问 5B 战俘集中营的原址。市政当局向她们保证，新泻从来没有过任何战俘营，并说，她们所说的战俘营可能在很远的海边。

玛俐给我写信说，也许是我记错了地方，把新泻和战俘营所在地连在了一起。这多少是在暗示我不够宽厚，但是，我还不至于那么衰老糊涂。

我给新泻市市长写了一封信，说明这件事，我并不是想复活仇视主义，但过去的事情不能如此随意地处理。

几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了来自新泻市市长办公室的回信，信中对这一误会表示道歉，该市市长在信中还说，如果我到新泻，他们将尽力寻找战俘营的遗址和原工作地点。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决定到香港和日本去。

我对现代旅行抱有强烈的反感，因为排队、不适、身分证丢失等问题会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你。现在又增加了一种可能性不大却实实在在地威胁乘客生命的恐怖主义。与我相反，我的妻子对这种旅行却很欢迎，她对我决定外出，特别是到如此之远，又如此辛苦的日本去深感惊讶。

飞机终于飞临香港启德机场上空，这个群岛环绕的英国殖民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底，遍布山腰的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高耸入云。我在地面上寻找熟悉的标记，却一无所获。飞机猛然下降，似乎扑面而来的一排排公寓楼从窗前呼啸而过。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飞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平稳，它颠簸了几下，停了下来。飞机的引擎轰鸣着仿佛在庆祝着陆成功。这时候，人们的呼吸才平缓下来。

我们乘出租车驶出机场，机场中的建筑物从眼前掠过，看着那住前伸展的路面，我产生了一种恋恋不舍的感觉——我们脚下的

某一部分可能就是当年亲手修建的。

我们下榻在一家极其豪华的旅馆，虽然我并不喜爱这种豪华贵，但是它对我们确实很有帮助。我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星渡使我联想起过去，但是能使我想到1941年的其它痕迹几乎全消失了。

我们决定先寻找我们排当年的战斗路线，我们穿过了大潭，可是，当初我十分熟悉的各种路面标志我竟全认不出来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竟没有一个人听说过棕树别墅。

我无法断定哪座山在1941年12月起到过重要作用。像戏剧中的演员一样，我喜欢想这些山上发生过的事，而不仅仅把它们当作一种自然景观。

寻找棕树别墅的努力失败了，我们又坐车到赤柱要塞去。

汽车在一个大门口前慢慢地停下来，门前有一块禁止市民进入的大牌子，一个苏格兰团的下士班长站在门口，突然向我行了一个漂亮的军礼，令我惊奇的是，他还招呼我们进去，他是否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呢？

要塞里除了一个穿运动服的古怪人物外，可以说空无一物。我徒劳地寻找着我们最后战斗的痕迹，没有弹孔，没有枪痕，甚至没有一处我记忆中的地方，那老打不准的，因此也很少用的九二式步枪也看不到了。

我妻子知道我很失望。我相信，历史肯定会在这里留下它的蛛丝马迹，至少加拿大战士会用一个小小的标志来提示人们：1941年圣诞之日这里发生的最后的绝望的战斗。也许，它还没有被人们发现。

我来到浅水湾，发现那个美丽而古老的旅馆已经消失了。

出租车把我们带到了在西湾斜坡上修建的国殇纪念坟场。站在山坡上可以俯瞰我们第一次与日本人遭遇的码头鲤鱼门。那一排挨一排的白色十字架在早晨的阳光中闪着炫目的光，加拿大人

的坟墓被安置在山坡较低处,离上面约有半公里。他们死在了一起……一些迹象表明,我们在战争中起到的作用没有得到完全承认。

出租车司机问我,是否需要等候,我说:“不,我要在这里与我的朋友们一起呆一会儿。”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使我心中突然涌起一阵伤感,我咬住嘴唇,处于困窘之中。

艾琳走开了,我独自徘徊在坟墓之中。开始我很镇定,只是感到有些好奇。

我缓步来到一排墓前,这里安葬着我们排的战友,我长久地站在墓前,那些逝去的人们的面孔在我眼前浮动,那一张张年轻的、欢笑的、充满了青春朝气的面孔……此时此刻,我才真正地理解了“他们将永不衰老”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威廉姆·伯克利

年龄:十九岁

死于:1942年10月9日

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神情严峻的小伙子,在那个悲惨的夜里,我们从龟山下来,他被流行性白喉夺去了生命。

威廉姆·S·M……

年龄:十九岁

死于:1942年10月19日

他是最伟大的逃跑计划的制订者,是我们的“北角大盗”,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战士……他鼓舞着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们。

附近的一个坟墓埋葬的是简·菲茨帕里克,死时二十岁,死后被授勋。他的军队生涯起落很大,身分在列兵和军官之间变动不定,人们一度认为他当上了准尉。必须承认,他具有潜在的领导才

能。他是个爱尔兰人，相貌英俊，一头黑发，长得很像拉丁人，他具有他的民族所赋予他的性格、气质。不管他的上司是什么级别，他的才能都得不到发挥，不得不吞吞吐吐，不得不饱尝被愚弄的痛苦。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山上，他站在全排的前面，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显得快活。

他的弟弟查里斯完全是另一种人，他生性活泼，人又聪明，喜欢说俏皮话。他是我们排的战士，在龟山受过伤，在日本煤矿干活时发生的一个意外事故把他砸死，埋在了日本。

菲茨帕里克兄弟和我一起，在魁北克长大，我回到家乡后，去看过他们的母亲，那一天，是这位母亲悲痛欲绝的日子，对于我来说，则是极其困难的一天。

死者中有人没有坟墓，因为他们的尸体无法找到，这些人的名字被分别刻在墓地的入口处。我找到简·德莱尼的名字，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在盖德和艾威特玩的装鬼的游戏……他在棕树别墅临死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泪水涌出了我的眼睛，我无所顾忌地哭了起来，从童年以来我就不曾这样痛哭过。许多年来，我一直抑制自己的眼泪，现在它们可以自由流淌了。值得庆幸的是，这块墓地当时没有别人。

在回旅馆的路上，我们沉默无言。我说不清自己是否身在香港，自从我们重新踏上这块土地，疑虑和担忧就一直伴随着我。在我结束了战俘生活，返回加拿大后的漫长岁月里，在我所有的睡梦中，即使在最欢乐、最明媚的梦境里，也总有一个日本卫兵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我不知道，这个日本兵是否会跟随我到香港。

那天晚上，耳鼻喉外科大夫郑从本和他可爱的妻子与我们共度良宵。他曾在温歌华医院实习，我当时在该院工作，他现在在香港开业。我们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款待，吃了在别处从未吃到过的东西，这一定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餐馆。

我吃了很多，也喝了不少，但是睡得很好，没做梦，也没有日本

兵来打扰我。

第二天,艾琳和我乘上老式的交通车,希望能找到北角集中营的原址,这种车过去常常从北角经过。现在的北角成了繁华区,高层建筑鳞次栉比,我估计这里有很多地方是用垃圾垫起来的。旧式的电车轨道还没有拆除,据此可以推测,旧电车一定还在使用。我们向许多人打听北角集中营,却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这个地方。

我们上了山顶电车,寻找实云道医院,可还是一无所获。几年后一位从香港搬回温哥华的邻居告诉我,实云道医院早改成了幼儿园,她的女儿就在那里入托。

我们到半岛酒店喝茶小憩,这家酒店一如既往,仍旧是“日不落帝国”统治下的老样子,酒店外面停放着罗尔斯·罗埃斯高级豪华轿车,那车灯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人们,使衣着随便者不敢贸然进入。

这里保留下来的战前建筑物,只有半岛酒店、督宪府和香港上海银行,香港百分之九十的建筑物都是战后兴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半岛酒店的承建者居然是个日本工程师。

酒店里的陈设豪华奢侈,我们欣赏着那些银制餐具和周围的高档摆设。这个酒店曾经被日本军司令部占用,我仿佛看到日军司令佐野将军就坐在这张桌子前,也许就在这里,他下达了向香港发动最后进攻的命令。

酒店内那美轮美奂的装饰令我叹为观止,其账单之昂贵也同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回到下榻的旅馆,艾琳想去买些东西,在我们穿过一条很窄的马路的时候,一辆自行车把我撞倒了,一个很机灵可爱的小伙子马上跑过来扶我起来,我很大方地拿出钱来向他表示感谢,但是他却急匆匆地离开了。我立刻意识到不好,果然,我的钱包和礼物都不见了,此时此刻,我终于领悟到,上帝不喜欢我呆在香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警告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启德机场乘飞机出发，飞机越过北角，越过下面的高楼大厦飞经鲤鱼门时，飞机升高了，西湾的国殇纪念坟场从我们的眼底掠过，这是我第二次告别香港。1841年帕默斯顿勋爵曾放弃过这块土地，理由是：“这里只是一块渺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到2047年，将是香港回归中国大陆的第五十个年头，到那时香港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 * * * *

我们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降落，下机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机场几乎处在各派势力的包围之中，失去了土地的地主们，稳健的环境保护者以及对机场的设置持反对态度的激进政治派都携起手来，组成了联合战线，这些组织的成员们以镰刀、耙子、木棒为武器，冲着那些戴着塑料防护帽的防暴警察高声吼叫着：“冲啊！冲啊！！”这类问题在四十年前的日本是解决得非常快的。

从机场进入市内所用的时间，似乎并不比从香港飞到东京的少，其费用也几乎同样昂贵。

我最后一次看到的东京，极其凄惨，在遍地瓦砾之中点缀着几个尚未倒塌的水泥建筑物。而眼下的东京则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星罗棋布的摩天大厦、四通八达的公路、变幻万千的霓虹灯广告不无令人眼花缭乱。

我在这个国家里呆过两年，为什么不知道他们的车辆是按英国方式在马路左边行驶的呢？当然，战时的新泻机动车辆非常之少，在仅有的机动车中大多数又是以煤气为动力的，车顶上带着一个大口袋，就像一个巨大的甲虫。

在汽车站，我们不无担心地上了一辆出租汽车，请司机带我们去预订的旅馆。东京的出租司机以其“神风”般的风格著称于世，我们这位司机则是以守为攻的典范，与我们在墨西哥城遇到的司机

比起来，他的车开得规矩得体。艾琳对他戴的白手套印象深刻，要知道，当年看管我们的卫兵和工头在殴打那些不幸的战俘之前，有时也会礼节性地戴上白手套的。

我们在一个优雅舒适的旅馆下榻，日本天皇的皇宫和御花园就在旅馆附近，在皇宫和御花园外面散步，那花园的考究精致让人赞叹。我想不妨把我先前在这里的滞留看作是到日本天皇的国家里作客，倘真如此的话，天皇是否会邀请品茶呢？答案我不得而知，我想，他大概不知道我在城里吧。

第二天早晨，我到久负盛名的日光参观，日光是日本著名的旅游胜地，到过日本的朋友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它，他们总以为我到过日光。也许，在他们看来，战俘们是以导游领着四处游览的方式度过周末的。

我对日光感到十分失望，它被捧得太高了。它的庙宇显得相当俗气，日本艺术和建筑中那种常见的简洁、美观、严谨的线条被过分雕琢的中国式风格所替代。观光的人们成群结队地从一个神殿涌向另一个神殿，与身穿黑色制服的高中学生们争抢着给那些丑陋、可怕而又陈旧的佛像照相。在这里，中国人特别喜爱的俗艳的红色成了主要的颜色。可以说日光是东京的“哈里森温泉”（“哈里森温泉”在温哥华，是为有钱人准备的温泉浴场）。

出乎意外又让人愉快的是，东京的空气十分新鲜，据说几年前这里的污染相当严重。

明天，明天就要到新泻去了，在那个古城的狭窄的街道上，艰难地推着给集中营送饭的两轮破车的战俘，不时地出现在我的梦中。我醒了，疲倦而焦灼，看看艾琳，她已经收拾停当，急切地等着上路。从昨天晚上我们筋疲力尽地爬上床，到今天早上醒来，仿佛只过了一分钟，可她却和我一样兴奋。

头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谈论过在新泻可能会看到什么，那个战俘营还在吗？四二年之后，这些东西对我意味着什么呢？我

曾发誓，永远永远不再回新泻，现在又如何呢？

我们一早乘高速火车离开东京，前往新泻。在1945年走这段路要花很长时间，由于在群山之中修了几条长而曲折的隧道，现在只须113分钟就到了。

这一天，秋色宜人，堆垛着水稻的片片农田与五颜六色的屋顶交织在一起，把这初秋的风景点染得就像旅游广告画一般。蓝瓦与黄土相映，和加拿大的广阔田野相比较，这里平添了几分人文景观。

与昔日的记忆拼搏着，我颤抖着走进车站，这难道就是新泻——那早年人口密集，街道窄仄，处处草顶陋屋，西式建筑寥寥无几的村镇吗？

不，如今的新泻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车站前面是一个广场，广场的周围是钢架玻璃建筑，车辆川流不息，交通张弛有致，衣着华丽的男男女女匆匆而过。

我真笨，居然还想看到牛车，还想看到那穿着灯笼裤的女人和身穿军装式制服头戴战斗帽的男人。我奇怪，那些战斗帽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一个也看不到了？

一辆黑色的大型高级轿车来到车站，司机下了车，打开车门，一个男青年和一个女人走出车门。

那个青年男子走到我面前，说：“凯姆本博士，我是外交部的间濑市岗，这位女士是您的翻译，名叫铃木石冢，欢迎您光临新泻。”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来到“友谊中心”，在那里见到了玛俐的朋友纯子。喝过茶，照过相，我们一行人来到了一个雅致的饭店，被引进楼上的单间，里面摆满了极其丰盛的菜肴和美酒，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变得轻松而融洽起来。

这个“友谊中心”很值得我们效仿，在这里，来访者可以得到帮助，可以获得休息，还可以与当地的居民相聚。新泻市与英国的加

尔维斯顿，特克斯是姐妹城市，新泻方面常组织本地人到那里旅游。我们的大女儿诺伊就出生在加尔维斯顿。中心的墙上挂着特克斯医科大学的照片，我和艾琳曾在那里实习，度过三年美好的时光，诺伊就在那时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离中心不远就是市政大厅和市长办公室，主人邀请我坐到像宝座一般的，红色长毛绒的、铺了软垫的市长专用椅上，日本友人把新泻市的钥匙赠给了我。

我以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表彰我以前与新泻市的联系，其实并非如此，这些年轻人是战争结束很久后出生的，他们给予我这个荣誉仅仅是因为我是5B战俘营中回到这里的第一人。尽管我竭力谦让，他们还是说服了我。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在翻译的陪同下，我们乘车去寻找我曾在那里推过煤的伦子煤场旧址。如今伦子煤场已经成了一个进口石油、小麦、木材和煤炭的大公司，那个陈旧的高架桥已经不见了，但我还能认出一些遗迹并找到了废弃的铁轨。

我在前面说过，那时伦子煤场的装卸煤设备相当落后，从中国满洲来的运煤船停在码头上，我们把煤从船舱里铲进一个大兜子，然后把这大兜煤倒进一吨装的翻斗车里，翻斗车停在一个铺了铁轨的环形架桥上，桥面离地三十英尺高。战俘们在桥上推着翻斗车，把煤倒进下面停放的货车车厢里。如果没有车皮，就把煤运到煤场，等来了车皮再用扁担挑煤把翻斗车装满。在中国和世界的一些地方至今仍在用扁担挑东西。

我想起我们在这儿干活的第一天，那天天还没亮，我们就排队来到这里。那个日本工头“大胡子”给我们致的“欢迎辞”在我的耳畔回响，战俘们推着翻斗车在那东倒西歪的高架桥上艰难行走的身影，在我的眼前闪现，一瞬间，我仿佛感觉到那辘辘作响的翻斗车，正从我身边推过。这种活儿，让人胆战心惊！蒙蒙细雨，扑面而来，我不知道，还会不会给我一件蓑衣。



现在的船坞上，处处可见巨大的自动吊车，工人似乎很少。我离开艾琳和我们乘坐的汽车，独自走到架桥的残迹前，我努力去想“大胡子”，可是眼前却浮现出战友们被煤弄黑的憔悴面庞和他们那绝望的眼神。

那个铸造厂的遗址更难确定，因为没有一个人听说过“新铁”这个名字，那个工厂现在叫“新泻铁”，因此造成了混乱。现在的铸造厂设备先进，称之为“新”名符其实。

当时的新泻有三个战俘营，前两个是临时性的营房，第三个设在城外的一个高地上。如今的日本，这类临近城市的地区已被高速发展的城市吞没了。我们寻找前两个战俘营时还没费太大的劲，只是旧营房的遗迹已经消失了，事过四十多年，发生这样的变化是不足为怪的。

我们到了第三个战俘营所在的高地，那里曾经修建了很高的木栅栏，它们盘踞在山坡之上，把战俘们栖身的简陋营房封闭起来。刹那间，过去的的生活闪过我的脑际，我想起，在这里最初度过的令人战栗的日子。

此情此景，唤起了我难以承受的纷杂记忆。我想起在雪地中费力地搬掉死人和伤员身上的木头的那个元旦的早晨，想起了陪伴着无遮无盖的死者度过的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想起了那些逝去的战友们的一张张熟悉的脸庞，想起了我们偷日本指挥官的鸡的那个晚上。

我很高兴，除了我的记忆之外，过去的一切痕迹都已荡然无存。奇怪的是，这个地方上了年岁的人，凡是我們问到的，竟然没有一个记得这里有过战俘集中营。我想，现在卫兵室改成了幼儿园或学校是个很合适的安排。

我们在一个古色古香的日本酒吧下榻，洗过一个礼仪性的蒸气热水澡之后，一顿极好的晚餐出现在我们房间的桌子上。

奔波一天，感受纷杂，在这一天里，我得设法摆脱旧日的偏见，

得应付新的人际关系,还得寻找那已不复存在的往日的世界。这一切使我疲倦,然而我却毫无睡意,旅馆的枕头很舒适,不再是那种让人难以入睡的石头般的日本式的硬家伙。

黎明降临,它是失眠者仁慈的救星,它为我拉开了屋外小园的面纱。为了不惊动别人,尤其是不习惯早起的艾琳,我轻轻地打开门,冒险走进清晨的寒冷之中。夏天走了,百花凋谢,只有柔软的金黄色的叶子在为夏季的逝去而叹息。

在早晨的清寒中,我信步踏上平板石铺成的园中小径,来到一个小小的池塘边,我来这里想干什么呢?鱼儿游到池边,想从我这里得到食物,可是我却无所奉献。

早饭安排在餐厅里,桌椅已摆设整齐,在上过米饭、汤和鱼之后,又上了火腿和鸡蛋。起初我还以为后一道菜是专门为外国客人准备的,后来才知道,所有的客人一律如此。我们发现日本国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在这里呆的时间越长,这方面的证据就越多。毫无疑问,他们不久就会像我们一样,将西方国会和文化中所有的不良传统都继承下来。

下一步的安排是到大学参观,在等汽车和翻译的时候,我们在河边漫步。许多小船拴在石头砌成的岸边,这些船的大小、形状和墨西哥人捕海龟的船一样。我不知道这是否仅仅是巧合,据说,在西班牙人到达墨西哥前,日本水手就到了那里,这些海上遇险的水手比西班牙人早了几百年。

骑自行车的学生们潮水一般,日本是骑车旅游的好地方,新泻允许人们在人行道上骑车,在行人通过的立体交叉桥上,为自行车设计了一个中心通道,人们可以推着车子上下台阶。

我特意要求到当地的大学去偿还一笔旧债,我想去的是大学的医学院。在1944年那个可怕的冬天,来自这个学院的教授曾勇敢地要求集中营当局对战俘实行隔离并让他们得到休息。

在那个严寒的冬天,仅仅这一简单的措施就拯救了许多人的



生命,就连对阿米巴痢疾的治疗也没做到这一点。这种病在战俘中从来没有根除过。

主人告诉我,四十年前,这所大学的医学院的规模很小,而现在它已经成了一个宏伟的医疗中心了。

经过一番介绍之后,我向医学院方面表达了我的感谢,人们听了我的话颇感诧异,因为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这件事。对此,我却很理解,在那个时代,即使对于那些从战争中得到合乎逻辑的答案的日本人来说,做到这一点也是需要勇气的,不仅做这种事需要勇气,在当时,以任何方式同情或帮助国家的敌人——战俘——都是需要勇气的。任何这类的表示都得偷偷地进行。

那天晚上是我们日本之行的高潮,玛俐的女友纯子,邀请我们到她家吃饭。我们与她的家人见了面,其中包括坐在桌子一头的八十五岁的老奶奶。作为主人,她的父母谦和而庄重,起初,我错把纯子的大姐当成了她的母亲。主人们还邀请了一位娇媚可爱的女士,是个内科大夫,战时在医学院念书。她向我们讲述了她的学生时代的艰辛,她的故事让我们捧腹。那时,政府要她们课间到机场干活。二次大战期间,日本肯定是战争动员最彻底的国家。

饭菜的味道绝佳,是由须田先生亲手烹制的,海味是用我闻所未闻的温酒浸渍的,味道美极了。我刚想告诉主人我不能喝酒,须田先生就拿出了一瓶拿破仑酒,他举起酒杯,建议为两个战俘干杯。原来,他在俄国当过四年战俘。几瓶白兰地下肚,我四十年前的日语似乎又复活了,我们分享着彼此的经历,为我们的每一个故事干杯。聚会最后在两个战俘的歌声中落下了帷幕——须田唱了一首俄国歌曲,我唱了一支日本军歌,陪伴我们的是空空的酒瓶。

我睡得很香,早上醒来,头脑清醒,仿佛发生了奇迹。星期天的早晨,我们前往车站,所有的新朋友都来为我们送行,我们交换了礼品,我还邀请他们去看展览会。我第二次离天了新泻,送行的人们在站台上向我们挥手告别。

访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来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疑虑和担忧,甚至准备迎接某种不测,而走的时候,我却怀抱着希望和温暖,满载着幸福与欢乐。

我们乘车前往西海岸,中途在风景宜人的金沢稍事停留,金沢的花园仿佛来自神话世界,令人叹为观止。随后,我们继续上路前往广岛。

广岛人在原子弹爆炸的地方修建起一个和平公园,其风景之美,令人赞叹。展览馆里陈列着当时拍摄的照片和劫余之物,它们向我们所有的人发出威严的警告。美国当时给执行任务的重型轰炸机“伊诺兰·盖伊”号下达的命令引起了特别的兴趣。命令说:“特命你部乘广岛事变之机,向新泻前进。”

艾琳对使用原子弹表示了歉意,我的反应则复杂得多——没有这颗原子弹,包括我在内的在日本的战俘、盟军的战士们以及几百万日本人就不可能成为战争的幸存者。

我不由想起那个被菲尔德·马歇尔·特奥齐公诸于世的日本最高军事指挥部的命令:“一俟敌人在本州登陆,即杀死全部战俘。”

这个计划的存在是无庸置疑的,我们在集中营前面挖的那个大坑,决不是为防空准备的,日本人要把它作为我们最后的葬身之地。

另外,我对纪念二战结束四十周年时,各种传媒散布的观点极其失望。传媒似乎把焦点全部集中在广岛、长崎的恐怖和悲惨上面,却只字不提南京大屠杀——日本军队在短短几天内仅在南京一地杀害中国平民的数量就超过了广岛、长崎两地在原子弹爆炸中死亡人数的总和。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听到或看到日本人在其占领地对亚洲平民实施的兽行,更不必说他们在对待战俘方面犯下的种种罪恶。据估计,死于日本人手中的中国平民就达二千万。这就是日本人当初宣扬的“大东亚共荣圈”。这里不妨借用一



个我在广岛看到的标语：“宽恕不等于忘记。”

人们对哈里·杜鲁门总统决定使用原子弹一直多有批评，这些批评大多来自那些没有直接卷入战争，却直接参加了论战的人们，他们批评起总统来不惜把自己变成笨驴，大冒傻气。

这种学究式的批评用于诡辩术尚可，用于实际则毫无价值。我完全相信，日本人当时是准备用武力保卫他们的国家的。

一些更富有理性的领导人正在致力和平事业，但是，和平的真正力量仍在于军事实力。即使在日本投降时期，日本军队中存在着一股企图东山再起的强大能量。

在反原子弹游行和向广岛和平进军的日子，没有多少人赞成和平依赖于军事力量的观点。我曾是一名为和平而战的战士，今天，我仍将保持这一传统，继续行进在与之不同的战鼓声中。

既论及此，我有必要阐明我的观点，我不但赞成核裁军，而且赞成各种裁军，如果不是因为感情因素，我可能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回到东京后，我们参观了靖国神社，很幸运，神社离我们下榻的地方不远。这是一个庄严雄伟的纪念馆，纪念自日本帝国建立以来所有死于战争的日本军人。我走进中央大殿，为我在许多年以前所做的较之日本军人要渺小得多的“贡献”，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礼物。

就在这时，日本总理大臣自二战以来第一次参拜神社。中国方面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里根总统参拜德国战争公墓，遭到了人们的非难，对此，我不敢苟同，同样，中国对日本的谴责，我也无法理解。我认为，对那些为其祖国捐躯的人表示敬意，并不意味着宽恕那些死者为之战斗的法西斯思想，真正不可原谅的是，这种战争使那些无比宝贵的年轻生命牺牲得毫无意义。就此做出批评或谴责，才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我们想去英联邦公墓看看，公墓在横滨外面，死于日本的加拿

大人埋葬在那里。但是要确定公墓的具体地点非常困难，加拿大使馆好像关了门，电话总没人接；而当地的旅游部门对此又一无所知。幸亏我们碰到了一个出租司机，他记得英国女皇在皇室访问期间曾到过那里。即便如此，找寻这个公墓也费了不少周折。公墓的标志隐约难辨，十分不起眼。

公墓里面很漂亮，维护得很好，一个清扫落叶的上了年纪的日本妇人把我们领到了埋葬加拿大人的地方。坟墓四周栽着枫树，每个墓前都有一个金属牌，上面刻着死难战士的姓名、年龄、死亡日期，有的还引用了几句简短的文字。

我留心寻找着死于新泻的人们，每一个名字都让我想起一张年轻的面庞——他们是如此的年轻，是的，他们不会衰老，他们永葆青春。在比尔·纳普的墓前，我驻立良久，在魁北克上学时我们是同学，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学生，是我们排里的一名下士，一个优秀的战士，是肺炎的第一批牺牲者。

我们谢了那个帮助我们的日本老妇人，她回转身继续清扫枫树的落叶。

回到东京后，我们度过了在日本的最后一夜。我们漫步于银座，它就像一个奇妙的霓虹灯，时代广场、尼莫一马瑟斯和迪斯尼乐园在这里交汇。它充满了活力，热闹而欢快，在它面前，我觉得我就像一个来自小城镇的孩子。艾琳和我喝了一杯价格昂贵的咖啡，乘地铁回到了住处。

在日本的最后一个上午，我们参观了东京的战争博物馆。记得年轻的时候，我读过日本自杀小队在中国使用人体鱼雷的报导，在这里，我看到了这种人体鱼雷的模型和一些神风飞行员的照片及纪念品。馆外展出了一些旧马达的碎片、偷袭珍珠港时用的水下鱼雷的双人舱体、还有二战期间使用的其它人工制品。这些展品显然给一群穿着准军装的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特别吸引我的是几张放在显要位置的照片，照片摄于1944年



澳大利亚的科里——一群日本战俘制服并杀死了看守他们的卫兵，企图逃走，结果，逃跑的日本战俘重被捕获，几名日本战俘被当众处死。照我看，在这个博物馆里，此处应该辟为专门的地方，也展示一下在日本皇军的“关照”下盟军战俘的照片和死亡情况，以资对照。日军在处置逃跑者，甚至那些计划逃跑者等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很显然，在我的身上仍然保留着偏执的痕迹，能够向世人展示其惨重失败的国家是罕见的，然而，也许这正是走向和平的康庄大道。我们曾经愚蠢、错误而盲目地浴血屠戮，我们曾经频繁地把这种野蛮的屠杀光荣的胜利乔装打扮起来。从今以后，让我们的纪念碑永远耸立，让我们的博物馆不断充实，让我们将武器辎重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我们踏上了归途，对于我这个不愿意旅行的人来说，任何旅行的最好段落都是回到我在美洲的家园，那里有茂密的雨林，有轻柔的雾霭。在乘飞机重返家园之际，中国儒家说过的一句话涌上了我的心头：

“以德报德，以怨报怨”。

附 录 战 争 罪 行 审 判 摘 录

残暴活动的猖獗极少突然而至……一个社会对这种行为的接受是渐进的，随着道德义愤的越来越弱，人们对这种行为的合法性就越来越不关心，随之而来则是一个又一个不幸和横祸。

——丹尼尔·贝尔：
《右派激进主义》

附 录 一

1. 拉蒙·穆尼兹·拉维尔，三十三岁，生于阿根廷，现暂住伊斯坦布尔，伦达旅馆。经宣誓，作证如下：我在1939年5月1日至1943年3月19日期间担任阿根廷共和国驻香港领事。

2. 随着英、日战争爆发，我将设在香港的领事馆迁到我在九龙的住所。1941年12月9日至12月29日，我一直住在九龙，未至香港。从12月29日起，我每日到香港。

3. 我第一次与日本士兵接触是在1941年12月12日，当时土匪到处抢劫，我住在嘉多利道38号，三天来，我的住处一直在他们的威胁之中，我找日本兵是为了得到帮助。我在英皇子道的桥下

面找到了第一批日本兵，我对日语略知一二，他们听懂了我的意思，其中一个人答应带我去找他们的指挥官。当我们快走到弥顿道的时候，传来了机动车的马达声和自动武器的射击声，那个日本兵把我推倒在地，他跑过去向前方挥手，我看见了一支机动化部队，这些日本兵正向一群站在弥顿道两边观看的中国平民开枪。我看见三个男人、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和一个孩子被击中，倒在地上。

4. 同一天晚些时候，我开着车和一位尚未任命的日本军官去寻找他们的指挥官。看见日本兵正在射杀一群被绑着的中国平民，这些中国平民约有二十多个，其中有几名妇女。地点在中国电器公司一幢旧楼后面的空地上，该公司位于界限街和窝打老道之间。

5. 回家的路上，我再次目睹了日本兵残杀中国平民的事件——一个在九龙医院门口站岗的日本卫兵向一群中国妇女和儿童开火，这些人正从位于亚皆老街的英语学校附近的山坡上往下走。

6. 1941年12月13日，日本军上校（也许上少校）西山在他的司令部里召开会议。他的司令部设在原中国电器公司楼里，该公司位于界限街和窝打老道之间。我告诉他，第一，九龙医院的院长和工作人员都非常关注医院护士的安全。因为前些天，野蛮的日本兵在院里转来转去，还企图破门而入，并命令院方交出女人，已有两名护士被日本兵追赶，一名中国雇员被拉走。第二，九龙医院的院长菲尔利博士向本占领区及其四周辖区的最高部门负责人提出请求，供给医院一些燃料和食物。因为医院原有的燃料和食物均已告罄，而病人甚多。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回答说，他们不能抽出兵力去保护日本国的敌人，何况，日本士兵们的性需求是合理的，应给予理解。他说：“士兵就是士兵，不是天使。”

对于第二个问题，他回答说，医院方面应想办法自己克服供应上的困难。该责备的不是日本，而是英国当局，英国应对一切问题负责，因为英国人没给医院留下足够的燃料和食物。

当我提到医务人员的意见——街道上还有几百具尸体,如不及时清理会发生流行病,他们愿意帮助组织“公共卫生队”进行清理时,他答复说,日方与敌对国的医生之间没有讨论问题的余地,一切问题都由日本占领军全权处理。当时在场的有翻译木下军士,军官渡边、藤原等人。

7. 1941年12月14日,因葡萄牙领事馆内聚集了几百名该国难民,受其委托,我再一次会见了西山上校,向他提出建立“中立区”的建议。鉴于攻守双方的猛烈炮火和连续不断的炮击对居民已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我建议在弥顿道、窝打老道和亚皆老街之间建立一个三角形的中立地带。这个地区有三所医院,一所教堂(我对此做了强调),葡萄牙和阿根廷领事馆,另外,外国人就住在这个地区附近,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他们集中到这个安全地带。西山答应在一个小时之内给我答复,可实际上,他拖延了很长时间。在我们会面的两个小时后,二十门至二十五门大炮被拉到我们建议的“中立区”内,阿根廷领事馆周围就布置了八门,最近的一门大炮就在领事馆房后的空地上,离房子只有三十米。其它的散布在网球场和建筑工程公司的高低不平的地面上,九龙医院四周也架上了四门炮,另外几门则布置在已经改成医院的原英语学校的前面,圣·德肋萨教堂周围也出现了三门炮,两门就在葡萄牙领事馆的后面。这些大炮布置完毕即猛烈开火,狂轰不已。开火半小时后,一名日本军官来找我,代表西山答复了我的建议:因为军事行动在全面展开,日本方面不相信英军会尊重“中立区”,因此,他们不能接受这一建议。此次会见在场的有日军中尉连长若林十一。

8. 1941年12月16日,我领着我的一个“孩子”,想用西山上校给我的通行证出去弄点吃的。我们要到铁路那边去,可戴臂章的日本卫兵在铁路边转来转去,不准任何人通过,就是有通行证也不行。没办法,我们只好顺着铁路往前走。当我们经过界限街的九龙学校附近的时候,亲眼目睹了日本兵开枪杀害中国人的实况,被打



死的是个做小贩的妇女，她死后，日本兵还哈哈笑着踢她的尸体。

再往前走，在警察俱乐部周围的一块不大的菜地上，我们看见大约十四个中国人，其中有一个妇女，两个约十三岁的男孩，他们被捆绑在栅栏上，身上还在流血，有两个人似乎已经断了气。

在前面距马球俱乐部一头不远的地方，我们再一次目睹了中国人惨遭日军杀害的情景。这群中国人被绑着，样子惨不忍睹，其中一个人的身体明显地被刀刺过，他的头几乎被砍成了两半。这些中国人满身是血，说明他们刚被屠杀。

9. 1941年12月17日下午6时许，秘鲁总领事的儿子，从离我不远的英皇子道住所跑来告诉我，几个日本军官进了他们家，把东西翻得乱七八糟。我随报信的男孩赶到他家，看到两个日军下士，我向他们解释说，这所房子是中立国领事馆的财产，不允许任何暴力活动。他们不高兴，对我说，他们在香港是胜利者，不承认任何外国人的任何财产权。我再次向他们说明，国家代表是具有特殊身分的人，何况，我们是中立国的代表。我坚持要他们离开，因为我讲的是日语，对他们有一些压力，又经过一番争论，他们答应不动任何东西。但他们要在这里过夜，第二天早晨，他们用军刀劈开了两个大木箱，拿走了一本集邮册、几印张领事馆的邮票、一架照相机和一些象牙制品。

10. 这种抢劫行为持续了好几天，1942年1月1日至3日，日本兵放假三天，军方允许他们自由行动，抢劫由此达到顶点。整个九龙到处都是半醉的日本兵，他们随意进入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11. 有一队日本兵在一个当官的指挥下，闯进我们领事馆对面的“玫瑰园”。这个“玫瑰园”是德·罗泽博士的私人财产，德·罗泽博士是葡萄牙的绅士，1942年1月4日离开香港。离港前，我亲眼看见他将屋子的各种器具装进两个又大又沉的箱子里。那个日本军官知道这是葡萄牙人的财产，因为我前几天告诉过他。

12. 日本军队完全无视他人的财产,很多房屋和商店惨遭洗劫。我在街上见到的每一个人都遇到了抢劫,家里的东西被全部搬上卡车运走,其中包括沉重的冰箱和钢琴。

日军的抢劫通常是从撕开被褥、枕头开始,而以抢走家中的全部物品结束。这种抢劫遍及整个九龙。这一点我本人可以作证。

13. 阿根廷驻日大使馆通过海底电缆从东京打电话给我,要我设法保护惠罗·莱德劳公司的利益。接讯后,我赶到该公司所在的德辅道,看到日本兵搬走了这个百货商店里所有的东西。这件事发生在1942年2月3日。我随即到日本领事馆,试图会见领事馆的负责人(木村先生),他不在,我给他留了一封官方信函,说明我在公司院内见到的事实,并要求他给予帮助,但是他没给我任何答复。

14. 1941年12月22日晚,我听见一个妇女在门外一边叫我的名字,一边急促地敲门,我从窗口往外看,看到一个中国妇女,她是我在九龙塘会认识的,是从上海来的,大约五十五岁。从战争一开始,她就住在嘉多利道,和我是邻居。我开了门,只见她的头发蓬乱,嘴里流血,衣服被撕破,上面血迹斑斑,她声音微弱、极度紧张地告诉我,她的一个女儿被日本人强奸了,她去救女儿时,日本人打了她,并把她从楼梯上扔下来,她求我前去搭救她的女儿。我们下了门前的台阶,赶到在亚皆老街的中国电器公司的办公楼,一个认识我的日本军官正在那里,我向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他跟我们来到那个中国妇女的家,她的女儿和两个女仆已经不见了,屋子里乱七八糟,墙上、地上的斑斑血迹,表明这里发生过凶残的暴行和拼命的反抗。那个日本军官答应尽力去找人,并回到电器公司命令士兵找寻。但是,此后,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有关这三个失踪女子的消息。

15. 1942年1月13日上午11时,在法国天主教慈善堂(炮台口一号)举行了一个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国际委员会,以

解决居民的食品供应和建立药品管理这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因为公众的健康状况正在急剧恶化,情况糟糕,前景暗淡。

当时到会的有秘鲁总领事、法国总领事、瑞士名誉领事、巴西名誉副领事、哥斯达黎加名誉领事和我,此外,领事团还包括天主教会和慈善机构的成员及有关市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讨论,会议决定与日方接洽,委员会还将包括日方两名成员,如果可能的话,日方成员应是医务方面的官员,这两个人将由日本军事当局任命。这个建议通过日本总领事馆提交到日本占领军陆海两方面,几天过去了,日方没有任何反应。鉴于当时九龙和香港的情况极其严重,我不得不前去约见日本南中国指挥部总参谋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负责香港新闻出版事务的殖民地长官多田中校,我想请他向总司令说情,并向他说明,这个委员会将对日本的国际声誉有好处。多田派了一名军官接待我,这个军官将我的意见转达给多田,半小时后,这个军官回来向我转达了多田的答复:“日本军队不需要来自领事们或其他任何方面的任何帮助,日本知道如何处理现状。驻香港的领事们和宗教界的成员们企图干涉日方行使自己的施政权,这是傲慢无礼的。”另外,他还希望我们所有的人停止这类活动。

16. 大约在1942年1月底,我收到了艾利斯·P·盖尔先生的一封信,信上说,他是美国红十字会分管南中国救济的负责人,根据日内瓦条约和战争惯例,他享有外交特权。但是日本人把他监禁在九龙旅馆里,因此,他请求我前去探望。这封信是由于日本翻译冈本先生的大力帮助才带出来的,他交给了M·卡诺先生,卡诺先生交给了利瓦伊先生,我是从后者那里得到这封信的。利瓦伊先生前不久也被监禁在九龙旅馆,与其他八个人关在一个单间里,日方不给他们吃的,除非他们付钱。虽然他们支付的伙食费极其昂贵,但是得到的只是面包一类的基本食物。他还告诉我,盖尔先生被监禁的条件更坏,而且他还生了病。闻讯后,我立即前往半岛酒店,找三宅先生,他是日本军政当局外交处的负责人,上校军衔,但

总穿便装。我请求他为我看望盖尔先生提供帮助，他向我诉苦说，这事太困难，特别是日本宪兵是否会允许我去看一个美国人是很困难的。我坚持说，这个美国人是有特殊身分和地位的，但他还是拒绝给我帮助。我径直到了那个旅馆，日本兵不准我进去。我到宪兵队求助，同样遭到了拒绝。我抱着最后的希望又回去找三宅先生，企望从他那里得到支持，可三宅却劝告我，“为了我的安全”不要去见任何英国人或美国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有什么地位——是外交官还是别的什么人物——他认为我找宪兵或军政部门的麻烦，会给我带来危险。

当我提醒他，据我得到的消息，盖尔先生只能得到极少的食物，整天关有一间小屋子里，不但得不到适当的照顾，还受到种种虐待的时候，三宅对我说，他并不关心他们的敌人的死法，不管是饿死，是冻死，还是病死。也就是说，如果关押在旅馆和集中营的英国人或美国人都死了，他会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作为外交处的官员，他的工作会变得轻松得多。

17. 1942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从一个久居香港的日本居民的口中得知，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全部被拘禁在山顶上的一间房子里，他们显然受到了虐待。我去找新闻出版局的财田勇太郎少校，没找到，我给他留了一封信，要求他发给我一个通行证，如果他办不到，就请他代我从有关部门开一个。

这封信被退了回来，信纸的上端用红笔写了三个字：“不可能”。我又去找掌握着人们生死大权的权威机构——宪兵队，在宪兵队的门口，尽管我出示了工作证，日本卫兵还是不让我进去。两天后，我与宪兵队负责人野麻中校联系，要求他准许我去探望美国同行，因为按照国际惯例，中立国的领事可以照顾那些因战争而被拘禁的人。据我所知，美国领事馆的人现在的处境很糟，挤在一间屋子里，我想去看看我能否为他们做些事。野麻中校听了我的话，几乎激怒了，他告诉我，1月27日已经发布了一个布告，不允许任何人去看望日本国的敌人或与他们联系。我通过翻译告诉他，我的



身分是不同的,因为我是中立国的领事,况且,我只是请求得到探视的许可,这是你提到的布告所允许的。听了这些话,他发怒了,命令身边的两个卫兵把我赶出去,我被他们粗暴地从屋子里(香港饭店)推了出来。

18. 大约在1月底,为了给关押在深水埗志愿兵集中营的朋友们送些食物,我到集中营去。我看到了H·V·斯克沃泽娃夫人,一个志愿兵(白俄)的妻子,他们曾住在嘉多利道三十五号,离我家很近,当时,日本卫兵正在折磨斯克沃泽娃夫人,他们抓住她的头发使劲摇晃。事后,在她家里我问她,为什么日本兵那样对待她?她告诉我,过去日方允许给集中营中的战俘送吃的,她常给她的丈夫送面包。但在她挨打的前一天,日本人不允许这样做了,而她当时不在那里,不知道日本人给志愿兵亲属下过这种命令,因此,受到了日本兵的凌辱。她说,日本兵打了她好几次,她让我看被打肿的上唇和胳膊上的伤痕,日本兵抓住她的头发猛摇留下的伤痕还历历在目。

19. 几天后,在同一个集中营,我和许多当时在场的人——志愿兵的妻子、姐妹和朋友,目睹了另一起更严重的事件。两个经常给战俘送饭的中国姑娘,向站在围墙里面操场上的日本兵招了招手,还没等她们完成这个友好且无任何害处的动作,就被两个日本兵抓住,他们凶狠的殴打这两个姑娘,强迫她们跪下,向日本兵鞠躬致敬,而这些日本兵则继续踢她们,用警棍打她们,然后又把她们双手捆到身后,让她们站在路中间给大家做示范。我们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过她们。

20. 有一次,大约在1月底,我和海上电讯公司的副经理马克·佩迪先生从香港回九龙,他的全家当时住在我那里。在星渡,我们得通过有日本兵站岗的装有倒刺铁丝网的哨卡,我们一群人刚到渡口,就听见一个卫兵高声喊叫,我回头一看,那个卫兵正抓着佩迪先生的脖子,使劲按他的头,强迫他给日本兵鞠躬。

21. 1942年2月25日中午12时许,我正从雪厂街往星渡方

向去,突然,日本兵命令街上的每个人都躺到人行道上,说是戒严,我估计当时躺在地上的有五十多人,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街道上布满了枪上刺刀的日本兵,随即出现了大批军车,摩托车和卡车从渡口前驶过,里面装满日本兵。一点二十分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不舒服,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欧洲妇女突然站起身来,一个日本兵立刻气冲冲地跑过去,一边朝她大声吼叫,一边用枪托猛击她的背部,那个女士被突如其来的猛击打倒在地,摔倒在人行道上。即使如此,那个日本兵仍不放过她,一边踢她,一边喊叫。他的哨位在女皇大厦的拐弯处,在往回的路上,这个日本兵还不断地踢那些躺在地上的人,他把一个中国人头上的帽子扔到一边,还用枪托打他。大约两点钟的时候,又有几辆载着日本兵的卡车开过,卡车后面又是一大队摩托车,原来这是新任命的香港总督矶谷廉介将军驾到。直到两点半,日本兵才允许我们爬起来。我起来后,看见那个女士还躺着,脸上流着血。显然已经失去了知觉。直入渡口时,我最后回头看了她一眼,她仍旧平躺在地上,那里只剩下她一个人,没有任何士兵去管她,而宪兵总部离出事地点还不到五十码。

22. 大约在1942年2月初,当我访问圣·德肋萨医院时,遇到了一个加拿大人,名叫弗雷德里克·哈瑞迪,他是加拿大军队中的一员,他给了我他的家庭地址——加拿大马纳特伯,温尼皮格,青年路593号。他请我转告他的家人,他很好。其实,他已经失去了一条腿。他是在九龙的山上被日本兵发现的。当时日本兵正在寻找受伤的士兵,把他当成了自己人抬了回来。他被带到九龙塘会的一间房子里,这时,日本兵才发现他是英联邦的士兵,于是,就把他扔到一边,一天一夜没给他吃的,也不给他衣服。他躺在地上,受伤的腿不停的流血,他站不起来,没法动弹,疼痛难忍。第二天,他被弄到了位于界限街的喇沙利学院,被扔在一个条件同样恶劣的房子里,地是水泥地,地上没有垫子,更没有人管他的伤腿。他痛苦万分,身体每况愈下。后来,一个欧亚混血的护士路易斯偶然发现了,把这件事报告给英皇子道327号的圣·德肋萨医院,医院的

负责人是个爱尔兰神父——G·L·肯尼迪，神父来看他，得到士兵的允许把他带到医院。医生发现他得了坏疽病，决定立即截去他的伤腿，因为他的情况每时每分都在坏下去。几天后，我见到他，他的身体正在慢慢地恢复，问到他时，他只说了几句话。日本人不给他拐杖，我买了些竹子给他。上述情况是他本人、为他动手术的医生和后来到我当女佣的路易斯告诉我的。

23. 1942年3月初，一个耶稣教神父（我记得他叫P·乔德，是爱尔兰人）来访。他在香港华仁书院任职，我是在前面提到的1月13日召开的国际委员会上认识他的，当时分配给他的工作是与日本当局联系。

这位神父问我能否帮助英国驻重庆的总领事和他的妻子，战争爆发后，他们在香港被日军逮捕，关押在列提顿道的圣士提反学院或医院里，住在一个下人的后院的一间房子里，屋地是水泥地或砖地，没有御寒的衣服，得不到食物，又身无分文。马丁先生身患癌症，病情严重，为了维持生命每天都需要打针；而日本当局不提供任何药物。尽管他们向日本总领事提出了要求，强调马丁先生的外交身分，但是日本军事当局，显然是日本宪兵队拒绝承认他们的“官方”和“外交官”身分，而只把他们当做一般的战俘。日方没把他们和其他英军战俘一道关到赤柱集中营，而将其关押在女子学校里，就是他们享受到的唯一的“特权”。他们身上没有钱，日方又不给他们提供食物，处境极其悲惨，特别是生命危在旦夕的马丁先生更令人担忧。

为了替他们说情，我去找日本总领事，见到了副领事松本。他说，他了解这一情况，但是，当局不想给他们任何特殊的照顾。我强调说，鉴于马丁先生目前极其可怜的状况，希望日方能满足他起码的生存需要，当时负责对外事务的小田先生，他听了我讲的情况，也表示同情，认为有必要帮助他们。他打电话给某军政部门，并以个人身分去看望马丁。第二天，他告诉我，军政当局认为他们是“犯人”，不准对他们的任何情况做任何改善。小田先生对此深表歉意。

松本副领事当天下午给了我一个简单的答复，他私下里告诉我，总领事木村先生已经拿出自己的钱给了他们。尽管如此，他们从军事当局那里仍然得不到任何东西。我问他，谁应对这种不人道的行为负责？他回答说：“军政机关现在相当混乱，要找到对这件事负责的人是不可能的。”我设法将一封信交给马丁夫妇，其中夹了一些钱。然后告诉那个来找我的神父：我对此事已无能为力。但几天后，我将去东京，我一定将他们的情况报告上去。

3月18日那天，在离开香港前，我得知，马丁夫妇仍旧关押在老地方，情况十分危急。

24. 与马丁事件的同时，我还经手了英国驻澳门副领事的妻子里夫斯夫人的事。她也是在香港战争中被捕的，和马丁夫妇关在同一个地方。日本人不允许她去澳门，也不承认她的官方身分。她的精神和健康状况极糟，由于前些时候颅骨下部断裂，她的神经机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个病把她折磨得很苦。她的处境同样相当悲惨。我将她的情况详细地报告给日本当局，与对马丁夫妇的态度一样，日方对此事的答复同样是否定的。有关里夫斯夫人的情况，我无法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任何安慰。

R·M 拉维尔在我面前宣誓作证，
于英国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
S. F. C.

1943年3月11日

英王陛下

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

屠杀平民

1. 日本兵占领香港的第一天(1941年12月12日)对平民的屠杀是司空见惯的。那一天我所看到的情况与后来得到的消息是一致的,而这一消息的来源是完全可靠的。所有的事件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成批地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的中国劳动民众。

2. 我的孩子,艾伯特·钟·查维斯,是秘鲁人(中国父亲,秘鲁母亲),他是非常诚实可靠的。1941年12月16日下午,他设法通过日本人的岗哨,回到家里时已经是晚上。他给我讲述了日本兵在佐敦道杀害中国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他看见日本兵在上海道追逐两个中国姑娘,两个姑娘拼命地往前跑,日本兵落在后面,眼看追不上了,其中一个日本兵掏出左轮手枪,朝她们开枪,结果打死了两个行人。

3. 强奸,1942年1月7日,一中国旧货商人来到我在香港的领事馆,告诉我,一家著名饭店(巴黎餐厅)的老板,兰登先生非常想见我。我到了他在皇后街的住所,他满面悲伤,处在紧张不安之中。他问我,人们都说有一艘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空船,他能否乘此船离开香港?然后,他告诉我发生的一切——他的妻子和小姨子在他们城外的住所里被兽性大发的日本人强奸了。强奸后,她们又被往前开拔的日军带走了,无法回到维多利亚城。当时,日本兵闯进房子,对她们实施了各种兽行,把她们双双强奸了,他的岳母想去救女儿遭到日军的殴打,一个前去搭救的女佣被日本兵强奸多次,她失去知觉后,日本人把她扔到了石阶上。

4. 在香港最后沦陷的那天早上,我们到九龙后一直给我妻子看病的医生,艾坡博士脸色苍白地跑来找我,请求把他的女儿藏在我家。因为几个日本兵要破门而入,他们不得不从窗户逃出来。那几个日本兵头一天晚上就企图闯进屋子,他家一个帮助他们逃跑

的女佣，尽管上了年纪，仍然遭到日本兵的残酷殴打。

5. 抢劫，日本兵入城后，立即开始抢劫。他们挨门挨户地搜查，抢走了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特别是手表和相机。他们抢东西不分男女，不管是谁，只要身上有值钱的东西，就马上抢走。

6. 1941年12月17日早晨，从香港方向打来的炮火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附近几所房子已被炸毁，特别是日本人在我们的房子附近架设了几门大炮后，香港方向打来的炮火更加猛烈。我们已经不可能在屋子里呆下去，于是我的妻子和许多别的女人、孩子、老人都躲进了住宅区内的防空洞。突然，一群日本兵闯进防空洞搜查、抢劫所有的人。住在嘉多利道离我家不远的王博士的妻子、六十五岁的王太太，为了留住一块对她来说有着巨大感情价值的宝石，被日本兵打倒在地，失去了知觉。在我们领事馆避难的女士中，有一个香港海上电讯公司副经理的妻子马克·佩迪夫人，她也不想把自己的手表交出来，一个日本兵就拿出刺刀要砍她的手腕。她边跑边叫和我的妻子及其他女士逃出防空洞，向领事馆跑去。防空洞离领事馆只有二百米，日兵在后面紧追不舍，一直追到领事馆，此时，那些女士已经跑进了领事馆，日本兵就开始打大门。因为门上贴着用日文写的官方通告，说明这所房子是领事馆，不准入内。所以，日本兵不敢造次。为了泄愤，一个日兵掏出枪朝窗子连开两枪。

7. 一个名叫丽迪亚·王珍的阿根廷女士，一天早晨给领事馆打来电话，告诉我，她的母亲（以前一直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现在香港。）前一天晚上遭到抢劫。两个日本兵和六个中国人闯进她住的公寓，强迫这位年近七十的老太太打开她的保险箱，拿走了她放在里面的全部现金和几个珠宝。

在星渡两边站岗的日本兵搜查每一个从此路过的人，他们的行为极其野蛮。因为我得到了一个特殊通行证，凭着这个证，我可以乘坐日本民政部门的汽艇，从九龙火车站后的小码头上岸，

所以我只遇到了一次日本兵虐待行人的事件——一个外国女士，是白俄罗斯人，因为没向日本兵脱帽三鞠躬，而遭到毒打。许多人，特别是女人告诉我，日本兵对女性极其野蛮，他们把路过的女人叫进星渡的盥洗室，命令她们脱掉衣服，然后，对她们施行强奸。这种事情发生过许多次。日本兵对中国女性更是为所欲为，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中国妇女，她的丈夫是汪精卫手下的，为香港的日本人做事，她也遭到日本兵的强奸。她的丈夫为此向日本驻香港总督矶谷廉介提出抗议。此后，改用女哨兵搜查过路妇女。

9. 公共卫生，日本当局管理下的香港和九龙的公共卫生情况有必要公诸于世。在日本人占领九龙之初，我就提醒日本军队注意流行病的危险。另外，在1941年12月13—14日间，我还向西山上校或少校转达了公共卫生官员菲赫利博士以及他所在部门的工作人员——各位医生及专家的意见——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就很可能产生流行病。由于香港人口高度集中，当地人又缺乏预防措施，霍乱和痢疾极易流行。因此，保持街道清洁的问题急待解决。尽管当时正值仲冬，香港的气候仍很暖和，气温从没有低于华氏五十度。十二月过去了，一月过去了，到了二月中旬，九龙的街道和香港市区仍然没有得到清理，各种流行病和传染病——痢疾、霍乱从十二月下旬开始肆虐，连九龙医院的医生都病倒了。座落在弥顿道和窝打老道，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后面的一家中国医院已经人满为患。腐烂的尸体、堆积的粪便和垃圾等污物遍布城区，有些地方如上海道和几条通往佐敦道的小巷里，堆满了尸体、粪便和垃圾，这些污物堆成了许多一人多高的垃圾堆。无处不在的军马，使空气更加污浊，苍蝇乘机大量地繁殖起来。城里已经长期断水，即使来了水，其价格之昂，押金之高也几近于敲榨，使很多人无法购买。城里没有清洁队，没有医疗组，日本当局对这种不断增长的危险袖手旁观，不予处理。流行病在战俘营里也同样肆行无阻。有关当局不采取任何缓解的措施。一次，我在圣·德肋萨医院见到了一个上

尉，我记得他的名字叫瑞文斯，因为我们曾在一起打过橄榄球，所以彼此相熟。他带着一些病得十分严重的英国士兵到医院就诊。利用看守他们的日本卫兵不在跟前的机会，我问他集中营的情况，他告诉我，集中营里疟疾、痢疾和维生素缺乏症非常严重。另外，我还从一个 NAMI9730 部队的日本中尉古造那里了解到一日军的情况。古造告诉我，霍乱已经蔓延到日本军队中，他能于当晚离开香港，乘飞机到马尼拉去实在值得庆贺。因为流行病对他的威胁与日俱增，他十分害怕。必须说明的是，在日本当局对这种现状置若罔闻的情况下，即便当地民众想有所作为也无能为力。因为所有的药店和医院都被日军查封，日军还勒令药店把药品全部运往日本。这些情况是一位名叫帕瑞克·王的中国人告诉我的。他和我一起打过羽毛球，当时在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大楼“卫生预防”部门工作，一个日本人和他在同一个办公室。

另一个日本军官寺田少校，是一个外科大夫，被派遣到中国南部某地工作。他和他的副官，一名尚未任命的军官广濑，在二月底三月初，几次来我家，告诉我流行病到处蔓延的严重情况。和我有过长期接触的日本副领事松木对流行病的蔓延极其担心。他负责我们到日本旅行的事（实际上，他也和我们一起去日本）。因为香港的卫生条件，他想尽快离开，因此，一连好几天他都得为自己、他的下属和我们去日本的机票奔波。二月六日是日本占领香港的第四十三天，一家日本人办的，作为日本政府宣传喉舌的英文报刊《香港新闻》在这一天发表了一篇关于“公共健康”的社论，值得注意的是，社论中有这样一段话：“这场战争使香港的公共健康在物质供应方面造成了严重阻碍，卫生服务方面的要求也无法得到满足。城市里垃圾成堆，连续几周得不到处理，烂泥、杂物遍地，树上成群的老鹰，到处是团团飞舞的苍蝇。”

这是来源于日本宣传机构的材料，它的上述自白很说明问题。一月的第一个星期，我见到了香港健康部门的负责人郭中兴先生，

他对我和领我去见他的朋友说，无处不在的垃圾都快把他弄疯了，死于流行病的尸体满街都是，药品和设备匮乏，负责市中心卫生的只有六十个人，另外三十个清洁工要清理十一个区的垃圾。这些清洁工干一天的报酬是一斤米。因为有些清洁工没得到报酬，三十名工人全辞职不干了。

1月9日，清洁行会通知其前雇员，他们已经得到搜集“粪便税”的许可。1月15日市政当局命令每户每月交纳“搜集粪便税”，这种用强迫的手段勒索钱财的办法遭到了民众的抵制，到二月的第一周才开始实行。

10. 日本人占领香港后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中就有腾空医院一项，玛丽医院即包括其中。这所医院当时挤满了伤员和病人，日本人强迫那里的患者和医院的全部工作人员在两个小时之内迁出，在此之前，中国籍的医务人员已经离开了医院，搬迁工作只能由为数不多的英国籍护士和行政人员完成。这个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许多危重病人和伤势严重的士兵及市民无法行动，但是日本人的命令不能违背。一些增补的护士（如马里克萨·约翰逊，别处还要提到她）告诉我，由于这次搬迁，一些病人失去了生命。

11. 圣·德肋萨医院的负责人C. L. 肯尼迪教士是个医生，他是个非常严肃的人，我们每天都有机会交谈。从他那里我了解到，战俘们的身体情况是多么悲惨，他接触的一些英国官员患了严重的维生素缺乏症。我见过几个被送到医院的英国士兵，他们的脸上已经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身上没有衣服，赤身裸体，极其可怜。我们不得不找些衣服给他们。

12. 尽管在城里，在九龙和香港有成千上万的危重病人，但是医院却一直被关闭。我的女儿温迪的遭遇使我对有病无处求医的痛苦深有体验。1942年1月20日，我的女儿出现了菌痢的种种症状，1月22日，在海上电讯公司副经理的妻子马克·佩迪的陪伴下，我的妻子到半岛酒店去找军事当局，请求他们允许我的女儿住

院治疗。三宅先生接待了她们，答复说，所有的医院都受军方控制，任何平民都不得住院治疗。她们又去找心地善良，曾给我们很多帮助的生田上校，他安排我的女儿到弥顿道的一个中国医院，我们到了那里，医院的负责人，一个好心的姓马的中国医生告诉我们，医院里的条件极其糟糕，我们最好把孩子留在家里。他带着我们在医院里走了一圈，只见到处都是病人，地上都躺满了。他告诉我们，医院里没有药物，没有食物，没有灯光，没有燃料，在这种病人极多，而必备的东西极匮乏的条件下，根本无法治病。第二天，我们得到消息，英皇子道的圣·德肋萨医院空着，于是，我们请求当局允许我们使用一个房间，但是当局拒绝了我们的请求，理由是这所医院属于军队。当天下午，我们再一次请求当局，说明这所医院里一个士兵也没有，而我们的女儿病情危急，需要立即住院治疗，在家里没法给孩子治病。然而，当局再一次拒绝了我们的请求，理由是日本士兵随时都可能到医院就诊。

在好心的修女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刚从广州到这所医院的王博士，他到家里看了孩子的病，坚持必须马上把孩子送进医院。第二天，我们到半岛酒店一层的卫生部门，再次找三宅先生。他们以种种困难为借口，还是坚持让我们到前面提到的那所中国医院去看病，我们将医院的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竟然拒绝承认。我找到日本总领事馆，见了日本副领事松本，我向他讲述了几天来我们一直努力求得官方批准，以便能使我们的女儿住进医院，但一一落空的经过。还告诉他，圣·德肋萨医院的医生愿意帮助我们，但是没有得到允许，他们不敢贸然行事，因为他们已经为这类事受到了军队的多次警告。日本副领事听罢，给几个部门打了电话，但是没有有一个部门的答复是令人满意的。直到第二天下午，日本总领事向军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我们的女儿住院治疗的事才得到解决。然而，此时已经太晚了。

这所医院像别的医院一样，没有照明，只有交上几千万日元才



能用电。医院里不供应食物，很多药品已被日本人拿走了。

每天都在死人，我的朋友和熟人中已有几十个人得了流行病，有的已经死了。从圣·德肋萨医院的阳台上，可以俯视下面的一个战俘营。2月3日早上，我看见一个印度士兵步履艰难地、慢慢地从营房里出来，出门没几步就倒在地上。几个日本兵把他拉走了。我问一个修女，她告诉我，流行病正在战俘营里迅速蔓延。

12日星期五，我们的女儿病死了，我要求日本当局，特别是负责外事工作的三宅先生派一辆卡车，以便将孩子的尸体送到几公里外的深水埗山坡上的公墓去埋葬。但是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在日方看来，运送一个死于流行病的人去墓地可能是大大地危害了公共健康吧！

第二天，我们背着女儿，冒雨步行到公墓去，路上的情景极其悲惨，大人和小孩的尸体到处都是，有的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子，在一些路口的拐弯处，堆满了粪便和垃圾，简直无法通过。当我们快到公墓的时候，副领事松本乘着一辆私人汽车赶来了，他对我们遭受的一切深感歉意，他告诉我，他本人要求派车来公墓也遭到了拒绝。在一个士兵的帮助下他截了一辆车，强迫司机把他带到这里。一路上的情景也使他吃惊不小。

(签名)R·M· 拉维尔

英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伦纳德·弗勒里·弗洛斯特谨此证明，1943年3月11日R.M.拉维尔在英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为他的上述证词签名。R.M.拉维尔现暂居伊斯坦布尔，我认识他本人，他的签名是他亲笔所写。

(签名)L·F·弗洛斯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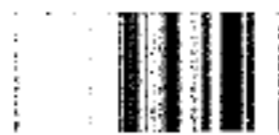
附录二

关于英国陆军军官奥斯勒·托马斯上尉的调查摘录,被调查人宣誓所述为实

我现年二十五岁,英国国籍,生于香港。永久地址是,香港托马斯诊所 C. H. 博士转交。我现住香港告打士旅馆。

1941年12月8日,敌人入侵香港之后的几天里,作为香港志愿防卫队、战地救护队的医务人员,我被派到第三炮兵连。该连的阵地 在鲤鱼门白沙湾。由于当时的炮火极其猛烈,我又被派回设在西里西亚救济会的战地包扎站。站内的部分护理员是从加拿大皇家步兵部队调来的,他们的领导是来自同一部队的斯坦利 M·班菲尔上尉,站里存放着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的供应和贮存物资,由军需军士巴肯负责。站里还有一些英国皇家陆军成员以及平民红十字会的救护人员,领导他们的是奥洛夫博士,在奥洛夫博士的工作班子里,还有一名中国医生周福祥博士和圣·约翰担架队的人员及辅助勤务队的护士。

1941年12月19日晨6时许,我乘着一辆救护车,离开了战地包扎站,车上有两个拉其普特部队受伤的军官(英国军官)和一个负伤的平民。当时我们不知道日本军队已经登陆,更想不到他们就在附近。救护车刚开上马路几码远,就遭到了敌人机枪的猛烈扫射。司机和护里员(都是加拿大人)从车上站起来,一个人的腿被打中了。我赶紧把车掉过头,沿着来时的路开回西里西亚救济会。我跳下车冲进楼里告诉人们敌人打过来的消息,人们急忙跑上顶层,只见下面的山坡上涌过来大批敌人。几分钟后,这所楼就被包围了,一层的玻璃被打碎,日本兵破门而入。由于敌人的兵力占了压倒的优势,加上我们中间有不少妇女和平民,所以我们不得不投降。所有的人,包括中国厨师和服务员,都被赶到楼前的平地上。日本兵对我们进行了逐个的搜查,所有的男性俘虏,除了裤子之外,



衣服都被撕成一条一条的。大约一小时后,日本兵把我们赶到大路上,男女分开,女的被押往鲤鱼门军营方向,男的被赶到西里西亚救济会后面的山坡上。路上我看见那两个拉其普特部队的军官被日本兵扔出汽车,躺在地上。日本兵强迫男人们站在救济会后面的河床边。四周的山上站满了监视我们的敌人,在路边观看取乐的日本兵中有三个人突然端起刺刀朝毫无准备的男人猛刺,有些人被刺了三刀才倒下,日本兵把被刺死的人踢进河床。日本兵的残杀引起了后面人们的恐慌,人们开始四散奔逃,日本兵随即向人群开枪扫射,人们纷纷倒下,我看见奥洛夫博士也被击倒在地。在这猛烈的扫射中,我觉得被子弹击中,滚到了河床下。两个牺牲者的尸体压在我身上,在他们的保护下,我躲过了随之而来的疯狂扫射和刺刀乱捅。

鲜血在河床里流淌,整整一天我都在河床里躺着,耳边响着将死者的呻吟,汨汨的鲜血从我的身下流过,但我不敢动,一个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的厨师,脖子受了很重的伤,从我身边往河床下面爬,我劝他躺着别动,他没理睬。那天晚上,我从河床里爬了出来,但没法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线。我弄了一套中国人的衣服,先在一个防空洞里,后在一个山上的草棚里躲藏,一直坚持到12月23日。痢疾的折磨和身体的虚弱使我不得不转移到铜锣湾的一个朋友家里,他把我藏了起来,给我食物并照顾我。直到1942年1月,我才回到家中,1942年7月我离开香港前往自由中国。

(签名) O·托马斯 上尉

1946年3月9日,被调查人O·托马斯
在我面前宣誓作证

(签名) R·C·库柏少校

战争罪行调查组

附录三

题目：关于军队医药储备的报告。（筲箕湾道）

收信人：香港 实云道 陆军医院 负责人

寄信人：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 N·J·莱斯下士

编号：72625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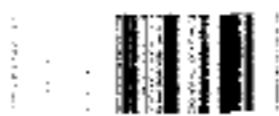
先生：

1941年12月19日早晨7点左右，我们正要吃早饭，正在值班（6:00—8:00）的英皇家陆军医疗队列兵R·里德跑进餐厅，向军需军士N·M·巴肯报告，日本军队已包围了我们所在的楼房，班菲尔上尉、巴肯中士和我急忙冲到楼顶，果然如里德所说，日本军队已经将我们团团围住，只是还没有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回到餐厅，班菲尔上尉和巴肯中士研究了当时的情况后，通知辅助勤务队和圣·约翰救护队的全体成员：如果日军攻击或准备攻击我们所在的楼房，我们就全部投降。在传达这一决定的时候，几个人一直守着窗子观察日军的动静，其中一人报告说，大批日军带着机关枪正向我处运动。几分钟后，楼门发出轰轰巨响，随即传出日本兵的喊叫声。巴肯中士命令列兵莫恩去开门，门开后，我们将武器堆在餐厅的墙角，双手举到脑后，走出大楼。门外大约有一百多个日本兵，他们朝我们叫喊着，连推带搡地命令我们站成一排。然后，他们派了一个小组进楼搜查，看看楼里还有没有人。同时，一个日本兵把一支自动步枪架在三脚架上，在我们前面卧倒，用枪口巡视着我们，进楼搜查的日本兵出来后，我们被分成两队，辅助勤务队的女人们被推到一边，圣·约翰救护队的人们被推到另一边，之后，



他们对我们进行了全面搜身，拿走了手表、珠宝等一切东西，日本兵又命令我们脱掉鞋子和上衣，人们的身上只剩下裤子、背心和袜子，在如此百依百顺地听任日本兵摆布之后，日本兵朝我们打手势示意我们往大路走，我们按他们的要求做了，班菲尔上尉殿后。走到香岛道约二百码远地方，日本兵命令我们停下，圣·约翰救护队中的护士和其他女性则被命令继续往前走。日本兵又命令我们这些男人朝山坡上的一条小路上走，在小路上走了大约十分钟，回头望去，所有的女人已被押往鲤鱼门军营。日本兵命令我们在一个小山谷里站住，这个山谷距离山的一侧约有半公里，地方很隐蔽，路上的人看不见我们。山里已有不少日军，估计有一千多人。日本兵命令我们坐在地上，日军带来的几个中国人走过来把我们身上值钱的东西，如手表、戒指等拿走。过了一会儿，日本兵叫我们站起来，往山坡下走，最后我们来到一块不大的朝山谷倾斜的空地上，日本兵叫我们站住，连推带搽地把我们弄成一排，脸朝着大路，背朝着日本兵。我们听见他们的笑声，突然人群一阵骚动，随即从队伍的另一头传过来高声的怪叫和痛苦的呻吟，我扭头一看，发现E·活特中士被日本兵刺伤了，他倒在地上后，日本兵又朝他捅了几刀。就在这时，我突然感到脖子后面一阵巨痛，原来挨了一枪，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脸朝下倒在地上。我躺在那里，鲜血流进了我的眼睛、耳朵和嘴，但是，我的头脑还清醒，可以听到身边的枪声和周围发出的巨大而痛苦的呻吟声。日本兵说笑着走到我的身边，从装子弹的声音可以判断出，他们使用的是左轮枪。随后，又是一声枪响，紧跟着是一声呻吟，那声音就在我的身边，呻吟停止了，日本兵走开了。我又听见几声断断续续的枪声，枪响过后，呻吟声渐渐地微弱下去。我静静地躺了一段时间后，冒着危险抬起头看看四周，日本兵已经走了，只剩下四个日本兵远远地站着看守着这个屠场。我发现列兵里德躺在我的腿上，从他受伤的程度上看，他显然已经断了气，我左边躺着列兵马考法尔，也已经死了。我推开四周的障

碍物，顺着斜坡滚进河床。在那里，我躺了一会儿，浑身上下一点劲也没有。我看见巴肯中士和列兵威廉姆躺在河床上，从伤势来看，他们也死了。我顺着河床往医药仓库爬去，水沿着河床往低处流淌，我上下透湿，浑身发抖。前面的河床上躺着一个人，我绕过他，刚往前爬了几尺，就听见后面传来低低的口哨声，我向周围看了看，发现是香港志愿防卫队的托马斯中士，他也在军队医药仓库所在的那个楼里工作，是信件组的。他说，他打算在那里躺到天黑再走，我告诉他，我不想那么干，我想尽可能爬到山脚下，乘天亮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说完了我继续往前爬。在约半小时后，我到了一个能俯视医药仓库的地方，从那里，我看见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仓库。我只好向远处转移，在一个临时的隐蔽所里我躲了一夜，这个隐蔽所是塞勒森·法瑟斯在任时建造的防空洞。第二天早晨，我从那里爬出来，向四周观看，我发现在医药仓库附近已经看不到日本兵了，但是在香岛道的一侧有一大群日本人的战马。我转到仓库后面的足球场，从那里一点一点往仓库靠近。到了近前，我才发现厨房里有几个日本兵，我知道了在仓库附近是十分危险的，于是我又转回山地，在经过仓库前面时，我看到几辆小汽车和卡车停在院子里，我这才明白，进入仓库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决定先回山地，然后再到太古道去。这时，我已经筋疲力竭，不得不经常停下来休息，我走的非常慢，走几个小时，就得躺下休息半个多小时，再往前走几乎不可能了，但我还是拖着双腿，慢慢地向前移动。太约下午四时左右，我到了一排房子附近，从那里可以俯视太古湾码头和糖厂。我知道，我已经不可能再往前走了，于是我钻进一间房子，在地板上坐一会儿。这些房子都遭到过炮火的轰炸和土匪的洗劫，那些趁火打劫的土匪估计是中国人。屋子里扔满了被砸烂和被烧坏的家俱，我发现一个长靠椅还算完整，就把它拖进房间的壁橱；我坐在靠椅上发现这个位置可以将两条通往这所房子的小路尽收眼底。坐了没多久，我就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我醒了，借着外面射进来



的微弱光亮，我在房子里找吃的和水，吃的没有，所有的水龙头都被砸坏了，水流不出来；我又到附近的房子里去找，还是一无所获。摆在眼前的是大批军人的尸体，弹壳和战地电话遍地都是，牺牲在这里的军人多半是印度兵。我回到原来的房子里坐下，过了一会儿，外面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只见三个日本人进了这所房子的厨房，厨房就在我所在的房间的下面。当听到他们上楼的脚步声时，我立即轻轻地推开窗户，翻出窗口，掉在距窗口十尺左右的地上，之后，我绕着房子的一侧爬到一些灌木丛中躲起来。没多久，那几个日本人从房子里出来，往山坡下走去。于是我又回到那所房子里，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不到半小时的功夫，又传来一阵脚步声和说话声，低头一看，又有四个日本兵朝这所房子走来，我又重演了上次的避难术，他们离开后，我又回到房子里。这时，我明白了，要在这所房子的主要房间里呆下去是十分愚蠢的。于是我下了楼，躲进地下室。那一天剩下的时间我都呆在地下室里。伤口疼得很，饥饿和口渴又折磨着我，我昏昏睡去，直到第二天早晨。醒后，我回到那个房子的一层，迎面碰上三个中国平民，他们跟我搭话，显得很同情我，然后，其中的一个人问我，有没有钱，我说，没有。他们不信，其中一人想搜我的身，我当然极为反感，把他推开，他和他的同伴出了门，没一会儿，一人拿着一个耙草用的耙子进了门，朝我冲过来，我用一把破椅子抵挡，但还是被刺破了，其实刺得并不太深，但足以流出血来，于是，这三个中国人心满意足了，带着胜利者的喜悦离开了这所房子。我又回到地下室，那天就在那里休息。我发现那所房子前有一个人造喷泉，喷泉池里还有一些水管流出来的水，尽管不太干净，我还是喝了大约一品脱，几小时后，我的肚子一阵剧痛，好在没多久，剧痛就消失了，我又恢复了正常。我在这所房子里一直呆到12月26日。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具体日期。在这期间，除了那一品脱水之外，我没喝过一滴水，没吃过任何东西，也很少走出地下室到房子里去观察外面的动静。可能我在前面提到

过,当我第一次到达太古湾的时候,那里的糖厂和码头已经驻扎了大批日军,当时还有不少日军沿着英皇道向前推进,同时,柏架山道也出现了大批日军。这就意味着我已经落入敌人的控制区内,逃出去的可能性极小。因此,我只能在附近活动。但是,到了12月26日晚上,我决定另想办法,而不能这样呆下去——我没吃没喝,伤口又得不到治疗和包扎。所以,我冒险走上大路,没走多远,就看见四个日本兵朝我走来,他们上下打量着我,叽哩咕噜说着日本话,还指点着通往皇道的小路;我按他们说的沿着小路往前走,随时都准备身后挨上几枪,走了大约二十五码远,我回头看了看,惊喜地发现那四个日本兵已经看不见了。我继续往前走,上了大路。当我往铜锣湾方向走的时候,又遇到几个日本哨兵,他们只是打量着我,或是推我一把,顶多用枪托捅我一下,大约半个小时后,我到了北角战俘营,一个手持红十字会三角旗的日本人把我领进战俘营,他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就出去找人,过了一会儿,几个欧洲人,有男有女进了屋,他们把我带到一间草棚,两个辅助勤务队的护士开始给我处理伤口,这期间,一个叫斯图尔德的先生走进来,告诉我,他是原英皇家陆军医疗队的工作人员,同时护士们继续给我清洗、包扎伤口,他们待我非常好。伤口包扎完毕,他们给了我一大碗炒豆子,然后让我在一张床上躺下。几个已经当了战俘的英皇家医疗队的成员非常焦急地听我讲发生过的事情。过了一会儿,一个日本军官进来了,给了我一套干净的衬衣和一条法兰绒裤子,并告诉我,如果我穿上这套衣服,他就允许我到玛丽医院或法国修女医院去,他说,他不知道这两个医院是否收战争中的伤员,所以我最好换上平民的衣服。他还给了我一张纸,上面满是日文,并对我说,如果有人阻拦我,就把这张纸给他看。之后,我被抬出大门,外面有一辆汽车在等着,是塞温尔·克拉克斯博士的车。这位绅士坐进汽车,我们上了路,先到了法国修女医院,但医院已满,于是,又到玛丽医院,这个医院把我收下了。我在那里住到1月5日,那天,英国



皇家陆军医疗队的汤姆森下士从实云道医院来,把我接到了那里。1942年1月6日晨,医院给我动了手术,同年3月26日我出了院。

您的

(签名)N·J·莱斯

下面是地方部队护理工作队的护士A·F·戈登女士对1941年12月23—24日圣士提反学院伤兵医院在日军占领之初所发生事件的陈述。

“12月23日晚,费德女士和我及其他志愿辅助勤务队的成员,回到护士宿舍(波普博士的住宅)时,发现此处已经成了加拿大军的司令部,加拿大皇家步兵的霍姆中校见到我们很惊讶,他劝我们回到医院去,但是我们还是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天亮才回医院。一路上,我发现带着机枪的日军已经切断了全部交通线。

12月24日是个可怕的日子——到处都遭到炮击、机枪扫射和飞机的俯冲轰炸。但是我们太忙了,没有时间注意外面发生的事,从监狱医院来的哈凯奥博士想让我们医院接收最重的伤员,最后总共来了十二个人。一起来的还有林奇上尉、斯彭斯中士、阿斯顿·罗斯博士和几个护理员。

12月24日、25日的两天夜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呆在医院里。我、费德女士和其他五个志愿辅助勤务队的护士在医院的货物仓库(办公楼附近的主要建筑物)过夜。但是外面的枪炮声又可怕又扰人,我们不得不回到大厅里。那里一片混乱——人们在黑暗中紧靠布莱克中校和威特尼上尉,挤成了一团。这一夜根本不可能睡觉。

天亮前夕,外面传来一阵可怕的嚎叫,随即,大批日军来到大门口。当时,我和志愿辅助勤务队的一名护士正在门口站着,那个

护士见此情景，跑进主楼，我和其他人留在大厅里。日本人把斯克特上尉拉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指示我们把手放在脑后出去。日本兵摘下我的钢盔，用它敲我的脑袋，翻我的兜，撕下我的红十字臂章并拿走了我身上所有的值钱的东西（如手表）。日本人喊话，命令所有的人都出来，别人都照办了，只有英皇家陆军医疗队的帕金中士想逃走，日本兵马上把他打死了。看来，日本人根本不把这里当作医院，而是把它当成了要塞。我们排成单行进入旁边的一间教室，伤员也被塞进这个教室，大家人挨人地挤满了整个教室，没有躺和坐的地方。一个后背受伤的伤员，是个来福枪手，名叫斯威特，本来已饱受伤痛的折磨，其左臂又被刺伤了，鲜血汨汨地往外流。那天日本兵杀害了一些伤员（估计有56—60人）。约两个小时后（上午九点左右），日军又命令我们排成单行下楼，一些日本兵站在楼梯上打我们，楼梯上到处是尸体和鲜血。后来，我们被关进了不同的教室，我和辅助勤务队的四个护士（史密斯、贝格、巴克斯顿和西蒙斯女士）被赶进一间小屋，那里还关着五个中国妇女（英国军人的妻子）。我们在那里被关了一整天，日本兵在我们门口架起一挺机枪，还进来威胁说要打死我们。后来，日本人给了我们一听牛肉罐头和一听牛奶。那些中国妇女享有较多的自由，可以得到一些水。几个特别坏的日本人（共五个）下午四点半钟时进来把史密斯、贝格和马里克斯特三人带走了，她们三人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中国妇女告诉西蒙斯女士，她们已经被日本人杀害了，再过一会儿，日本人就要来杀我们。这个中国妇女告诉我，日本人说了，如果香港当晚不投降的话，他们就杀死所有的英国人（男女都杀）。半个小时后，几个日本人命令我们出去，我们和安德鲁·洛文及费德女士一起被带到走廊尽头的一间房子，其中一个日本人向我们宣布，香港“现在已经属于日本”。

这间房子挺干净，地上还铺了毯子和垫子。中国妇女也被带进同样的房子里，五分钟后，日本兵用英语命令我们出去，给受伤的

日本兵包扎伤口。然后，他们把我们带进一间可以看见下面网球场的屋子，里面有五具红十字成员的尸体，日本兵命令我们坐在这些尸体上。（此时天开始黑了）过了一会儿，两个日本兵带走了费德女士，另两个日本兵带走了我，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那里有两具尸体。两个日本兵动手剥光了我的衣服，然后，脱他们自己的衣服。但是他们显然是害怕什么人进来，所以还没碰我就又让我穿上了衣服。我被送到西蒙斯和安德鲁·洛文女士呆的那间屋子。不久，费德女士也被送回来，她满面泪痕，告诉我们，她被日本兵强奸了。我们急忙回到原来那间有垫子的屋子里，原来的那几个中国妇女已经不见了。我们刚刚安静一会儿，就进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把我带到邻近的一间小洗澡间，日本兵把我打倒在地，然后轮奸了我。一个完了，另一个，全完了才放我回去。日本兵又把费德女士带了出去，她的遭遇和我一样。不久，我和费德女士又一次被带了出去，又遭到了像头一次那样的轮奸。西蒙斯和安德鲁·洛文女士没有被奸污。在极度绝望之中，我们发现屋门上有一把弹簧锁，就把门锁上。日本兵夜里来了几次，但没有强行闯进来。

26日上午8时，两个日本军官和一些日本兵命令我们下楼，所有被俘的人都在楼下集合。日本人发给我们每人一听牛肉罐头和一些牛奶，然后，日本人清点我们的人数，又把我们搜查了一遍，我们四个女人被叫去打扫鸡毛。

后来五个日军军官为伤员指定了房子，允许护理员来取包扎伤口用的各种东西，整个早晨，我们都忙着给日本人做饭。一个日军叫梅杰·贝格中士去辨认一下三个女人的尸体，看看其中是否有他的妻子。那个加拿大随军牧师和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的皮斯格特中士也走上前去。认出被杀害的三个女士是史密斯、贝格和巴克斯顿。

中午过后，一个英国陆军志愿队的军官斯托克上尉带着一个病人从赤柱要塞来到医院，我问他能不能把我们四个女人带走。晚

上六点左右,他来了,对我们说,他将把我们偷偷带出去,但是动作得快。我们马上爬上他来时乘的那辆救护车,从此,我们就到了赤柱集中营。”

(签名) 地方部队,护理工作队
护士 A·F·戈登

附录四

下述材料是从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的两名资深军士的报告中摘录的。日军占领圣士提反医院期间他们在该院工作。

J·H·安德森中士,(编号:7262360)陈述如下:

“……四个日本兵来到医院大门口,这是厄运带来的最初征兆。

布莱克中校和我出门应付他们,随我们出来的还有威特尼上尉、诺布尔下士和英皇家陆军医疗队的二等兵穆尼已在院子里,被日军监视起来。日本人把布莱克和威特尼这两名军官带到楼房的拐角,我们其他的人则被命令靠墙站成一排。然后,日军检查我们的臂章。一个被派回来的日本兵进了大厅,显然,他要向不久就要到来的某些人汇报情况。他命令所有的护士和部分病人出去,人们往外走的时候,一直在屋里睡觉的英皇家陆军医疗队的帕金中士突然冲向窗口,日本兵立即开枪,子弹穿过了他的头部。随即大群日本兵涌入大厅,在病人中横冲直撞,吼叫声和开枪声响成一片,那些下床动作稍慢的伤员和因伤势太重无法行动的伤员,或被刺刀捅死,或被开枪打死。一些香港志愿防卫队的战士试图逃走,被日军打死,有的战士试图反抗也死于刺刀和枪弹之下。圣·约翰救护队的工作人员被带进一间屋子,全部惨遭日军杀害。这是其中一个还没断气的人告诉我们的。起初,日本人把医院所有的工作人员



和伤员都关进一间库房，等到他们把所有的残存者都赶到一起时，天已经开始亮了。这时，日本人把人们带上楼，关进一间学生宿舍。女人则被带进另一间屋子，与几个中国妇女关在一起。

包括我在内的八十六名伤员和医护人员被关进一间长 12.3 英尺，宽 9 英尺的房子里，日本人用手榴弹吓唬我们，警告我们不准逃跑，又在门外的走廊上架起了机枪。在我们的再三要求下，一个日本兵给我们送来了一壶水和一些燕麦粉，这是一天中我们得到的全部东西。那天，成群的日本兵不时地到我们的屋子里，盯着我们看，他们不时地从人群里叫出一个人来，把他拉到外面的走廊里去。后来我们看到了这些人的尸体，一共四具，都是被刺刀捅死的，身上还有拷打的伤痕。那一天，走廊里不断地传出被拷打的惨叫声和死前的呻吟声。直到晚上七点左右，我们还听得见被关押的女人的谈话声。”

“晚十时许，一个下级军官来了，准许我们把一些尚能走动的伤员挪到别的房间，原来的房间里还留下了四十几个人。即便如此，屋子里仍旧拥挤不堪，连躺下的地方都没有。就这样，我们度过了从 12 月 25 日到 26 日之间的长夜。在我们要求下，那个日本军官允许我们用消防水桶打几桶水，但是没有食物，从 26 日那天起，日本人就没给过我们任何东西。贝格中士（一个伤员）请我们给被关押的女人们弄点吃的，他的妻子在志愿辅助勤务队工作，也在关押之中。

12 月 26 日天刚亮，日本人就把所有能走动的人集中起来，命令人们打扫卫生。我和另一个伤员得到允许下楼弄了些水。在扫卫生时，我们发现了圣·约翰救护队和香港志愿防卫队工作人员的尸体，是用刺刀捅死或用军刀砍死的。三个失踪的女人的尸体是在院子里发现的，身上盖着毯子。她们已经被碎了尸——贝格女士的头几乎和身体分了家，验尸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共找到了 60—70 具伤员的尸体，25 具工作人员的尸体。日本人命令我们点起一



堆火,所有的尸体都被焚烧了。”

“在节礼日(圣诞节次日)下午,日本人告诉我们可以使用医院顶层东侧的房间。于是我们搬进了这些房子,并且尽可能地多找些药品,但是我们中间却没有了医务官员。那天晚上,斯托克上尉和几名香港志愿辅助勤务队的工作人员从赤柱集中营来到医院。黄昏时分,他们开着一辆小货车回去,成功地带走了剩余的女人,他们还答应第二天给我们送些水来。”

27日星期六,水的情况到了绝境,日本人切断了整个大楼的热水供应管道,此后的两天中根本不可能得到足够的水。

斯托克答应我们送来吃的和水,却没有送来,可能是来时迷路了。幸好我们从损坏的仓库中偷出了食物,每人都分到了一些。

29日傍晚,一个日本军官主动提出用一辆卡车把我们和剩下的伤员送到赤柱集中营去,我们同意了,并且尽可能的往车上多挤一些人,就这样我们到了赤柱集中营。

英皇家陆军医疗队的大多数人留在了赤柱集中营,其余的人(十三名列兵)经鲤鱼门,最后抵达设在实云道的北角战俘营。

(签名) D·H·安德森

附录五

调查摘要,叶洪对当时情况的正式陈述。

我现年28岁,中国国籍,生于中国广东省窝坪村。我的永久通信地址是:香港,大潭湾。现住址:香港,赤柱,马里克农传教馆。

1941年12月25日,中午时分,几个日本兵把我和阿龙(一个男孩)带走,带到了救济会大楼的斜坡上,离卡迈克尔修道院不远的

地方。我可以证明，日本兵在那里杀死了 12 名英国军人，其中有上尉 1 人，中尉 4—5 人，中士 3 人，下士 2 人；还有一人是护理员。他们是被三十几个日本兵用刺刀捅死的。当时在场可以作证的中国人有 30 人左右。日本人强迫这些中国人做苦力，我是其中之一。他们杀死英国军人后，命令我们去找些干柴。第二天，1941 年 12 月 26 日，日本人抓了大约 60 名中国人，强迫他们挖个两个大坑，埋葬那十二名英国军人的尸体。我现在能够指出两个大坑在什么位置。

(签名)……

译者：在证人签名之前，我确信我如实地翻译了证人用中文撰写的证词。

(签名) T·E·耶芝 上尉

附 录 六

调查摘要，布拉泽·迈克尔·霍根宣誓所述为实。

我现年五十岁，美国国籍，生于美国费城。

我的永久通信地址是：美国，纽约，马里克农传教馆外国社团办事处。

我的现住址是：香港，赤柱，马里克农传教馆。

1941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7 点，日本人来了，他们命令我们所有的人(大约 34 人)下楼。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日本兵带来了 6 名英国军官，他们是在附近被俘的。他们中有几个因为过去常到这里用餐，所以我认识。这些军官双手被反绑着，劳伦斯中士被捆得最

狠，一根绳子紧勒着他的脖子。我担心，他随时都可能因窒息而死。不久，一个日本宪兵走过来，松开了他脖子上的绳子。我们一直在外面呆着，到下午三点钟时，日本兵将那些英国军官押上大路，并命令我们脱下长衣，将我们的手反绑在后面，也把我们赶到了大路上。他们命令我们靠山坡站成一排，那6名英国军官在我们前面三英尺远的地方排成了一排，一个日本军官给什么人打电话，在一番简短的对话后，他命令6名英国军官站到离拐弯处几码远的水沟里，紧接着，我听见因疼痛引起的可怕的惨叫声，我扭头一看，一名英国军官跑过来，在离我们五码远的地方，一个看守我们的日本兵，端着刺刀强迫这个英国军官退回到原处。这个英国军官被刺伤了，但伤势不重。过了一会儿，所有的惨叫声和哭喊声都停止了。估计他们都死了。这时，那个负责的日本军官又给什么人打电话，并在电话里争论了很久。后来，我们被带到一座楼里，在那里被绑了三天三夜。

(签名) 布拉泽·迈克尔·霍根

上述证词撰写人在我面前宣誓，特此证明。

香港战争罪行调查组

T·E·耶芝 上尉

附录七

调查摘要，麦秀鸿的正式陈述。

我现年五十二岁，中国国籍，生于广东。

我的永久通信地址是：中国信托中心转交。



我现住：广州

1941年12月22日下午6时许，我正和家人及几位朋友约二十个人一起吃晚饭，突然听见几声枪响，一个人走到后窗往外看，发现日本人已经包围了整个房子。当时我的家住在香港跑马地，蓝塘道42B号。大家站起来准备迎接日本人。过了大约五分钟，日本人开始敲后门，一个女佣被派去开门，三个日本兵进了屋子，命令所有的人都到一层厨房前的门廊集中。我看见日本人还进了邻近的44B号公寓——英国渣甸公司的一个中国雇员的家。日本人命令他家人也到我们的公寓集合。然后，日本人就开始搜查我们的公寓。搜了约半小时之后，日本人命令我们从后门出去，人们鱼贯而出，我大约是在倒数第三、四个出去的。我出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看见一个日本兵正在打我的一个朋友，估计是因为他不愿意出去。由于门的光线太暗，我没看清他的脸。下楼的时候，日本人搜了我的身。到了院子里，发现小巷的右边已经坐了不少妇女和孩子，日本人命令我往左边走，到楼房的后面去。走了不到十步，只听见一声叫喊，随即刀光一闪朝我刺来，我赶紧用手去挡，腿上已被深深刺了一刀。我倒在地上，发现地上已经躺下了三、四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轻轻地动了动，日本人上去补了一刀。我一动不动地躺着，过了一阵觉得头有点不舒服，就稍微动了一下，这一动弄出一点声音，日本人走过来，打开电筒照了照我，还踢了我几脚——我想日本人是看看我到底死没死，我一动不动地装死。同时听到日本人发命令和做饭的声音。

我在地上躺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听见女人的哭声，估计日本人已经走了，我才睁开眼睛。抬头一看，发现院子里有三十多具中国人的尸体，几个女人正在费劲地挪动她们亲人的尸体。我想找我的儿子，但是站不起来。有人说，日本人又要来了，我只好爬下山坡，爬上大路。路上我遇到了我的一个朋友，他开着一辆车，

车上有两个被日本人杀害了丈夫的女人,其中一位是交通部长赵禹的妻子屈女士,另一位是在交通部供职的赛特先生的妻子赛特女士。他们把我抬上了车,送到跑马地附近 T·H·万博士家,这时我才发现我身上共有九处伤。就我所知,当时在我的公寓里一起吃饭的九个男人中,我是唯一的幸存者。

我不知道干这件事的是什么部队,但是我知道他们是日本人。我记得他们后来朝黄泥涌峡的方向走了。日本军队的这次暴行,是他们屠杀平民狂潮的第一浪。

(签名)……

上述证词撰写人在我面前宣誓,特此证明。

香港战争罪行调查组

R·C·库柏少校

收信人: 香港,实云道,陆军医院负责人

寄信人: 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T·C·坎宁安

编号:7262319

先生:

1941年12月18日,派往黄泥涌前线救护站的工作人员,除我之外还有:

英皇家陆军医疗队上尉 B·D·巴克利

英皇家陆军医疗队列兵 埃文斯

英皇家陆军医疗队列兵 约翰

救护队司机 马普

还有十名圣·约翰救护队的工作人员,分配到救护站附近的两个医疗掩体中工作。林顿 L 下士和米德尔塞克斯团的布里格·克拉克 L 在前线救护站过夜。



那天晚上,一名到黄泥涌警察站上任的印度籍警察的面部等处被弹片所伤,因为黄泥涌警察站正在敌人炮火的轰炸之中,所以,巴克利上尉安排他到附近的一个医疗掩体中休息。

那天下午,加拿大皇家步兵旅情报部军官,伍德塞德中尉通知巴克利上尉,由于炮火轰炸,无法调动旅部的车辆,请熟悉当地地形的巴克利将他的车准备好,因为罗逊旅长要到各个阵地去看看。

上午九时许,伍德塞德中尉通知我们,日本人已经登陆了。巴克利上尉打电话请示战地救护队总部,我估计总部的答复是:原地待命,观察战况的发展。几小时后,我们得知日本人已经到达司徒拔道和大坑道的接合处。据我的记忆,这时巴克利上尉曾打电话给战地救护队总部和圣艾伯特医院,问他们我们是否还在原地待命。我不知道上级指示的要点,但是,从巴克利与伍德塞德的对话中,我听出来,上级的意思是,因为我们和旅部之间可以随时用电话联系,所以我们还应原地待命。就这样我们在原地待命,几小时后,日本人突然包围了我们的驻地,要想逃走已经不可能了。当时是12月19日凌晨4时许。天亮时分,我们听到一帮日本兵上了房顶,企图打开通风口,但是没有成功。之后,日军对医疗掩体进行了一系列的轰炸,我们看见圣·约翰救护队的队员和那个印度警察从他们的掩体中走出来投降,他们都程度不同地负了伤。虽然救护队员们都戴着红十字会的臂章,但是日本人还是把他们全部杀害了。

19日的一整天和20日的早晨,我们一直在楼里等着,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部队的反攻上。但是,从我们的观察来看,日本人已经无处不在了。有几次日本兵想进楼,但他们朝门、窗扫射一通之后,又放弃了这一打算。巴克利上尉对我们的处境非常担心,逃走是不可能的,他又不想投降,可我们的食物已经不多了,指望援兵前来解救看来是极其渺茫的。从我们听到的声音来判断,下面有一些伤员无人照顾。巴克利说,不管他们是哪国人,我们都有责任去救死扶伤。于是他做了一个临时性的红十字会会旗,上面钉了一张纸

条,说明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并无武器等情况。他刚刚把这面旗帜伸出窗口,这个表明生命存在的最初迹象就招来了日本兵的一阵扫射,巴克利险些送了命。大批日军马上包围了我们的救护站,有的日本兵大砸楼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走出救护站向日军投降。日本兵先是殴打我们,然后,将我们紧紧地捆绑起来,还撕掉了我们的红十字会臂章。之后,又把我们带到几个并不懂多少英语的日本军官面前。

经过一番审问之后,我们又遭到了毒打,巴克利上尉首当其冲,因为他竭力向日本人解释我们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另一个战俘——一个拉其普印度兵也成了我们中的一员。后来,在日本兵的押解下,我们沿着小溪走向救护队对面的山谷。那里似乎驻扎了不少日军,估计至少有一个营的兵力。一路上,我们遇到的大多数日本兵都对我们拳打脚踢,在两面夹攻之中我们被带到一块山坡上的露营地。从那里,可以看到下面的救护队驻地。日本兵把我们紧紧地捆在了树上。日本人似乎有一种挖双人战壕的制度,我们的周围布满了这种战壕。除了挨打时,我们都被蒙住了眼睛。下午五点左右,列兵约翰和司机马普被日本人带走了。估计在晚上10—11点左右,林顿下士L把我从树上解了下来,原来那个印度兵裤兜里有一把刀子,他用这把刀子先割开了自己的绑绳,尽管在日本人的营地中心,十分危险,但他还是爬到绑我们的树旁,救下了巴克利、埃文斯,我也因此得救了。巴克利上尉离开了我们,估计是往赤柱去了。我们几个人匍匐前进,爬过日本军营,朝山丘和笕箕湾爬去。我们发现除了赤柱外,别的地方都投降了。我们想逃到大陆去,那里逃出去的机会要多一些。当时,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林顿和埃文斯给我很大的帮助,事实上,他们也很累了,但他们没有丢开我。

爬了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到了塞西尔先生的跑马场,但是我们遇到了敌人的火力,火力来自于离我们十码远的地方,我们在黑暗



中失散了。我再次爬上山坡,在那里等了一阵,希望和失散的战友联系上。可是,除了日本人的声音外,我听不到任何别的声音,所以我决定继续往前爬,希望林顿和埃文斯也和我采取同样的办法。这时是在12月20日到21日的午夜时分。第二天早晨,我遇到了印度部队,他们指引我到—个连部的所在地——云地利台去。当时是1941年12月21日晨7:30许。

您忠实的

(签名)T·R·坎宁安

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中士

编号:7262319

附 录 八

日军中尉加藤彻太郎罪行证据摘录。

根据起诉书提供证据,被告供认如下:

“1944年9月至1945年8月21日期间,我担任日本新泻5B战俘营的指挥官。这里陈述一下处死美军战俘弗朗克·斯皮尔斯的理由。事情发生在1945年7月,离战俘营不远的地方。以前,斯皮尔斯逃跑过,被抓获后,我曾警告他:根据日本军队的规定,我有权处死他。我要求他保证以后不再逃跑,但是他说,如果有机会他还要这样做。

在第一次逃跑未遂后,他被监禁在卫兵室里,但他又在那里逃了出去。于是,我命令一队士兵去追捕他,他们在离战俘营不远的树林里抓到了他。

我得到斯皮尔斯被捉的报告后,就带着一些士兵和平民雇工前往他被抓获的地点,并抬了一口棺材。这棺材是我事先指示战俘中的木匠做的。

到达他被捕的地方后,我告诉斯皮尔斯,因为他违反了日本军队有关逃跑的规定,所以我必须执行对他的死刑。然后,我给了他一张纸,让他把他想写的话写下来。他表示他无话可说。

于是我命令两个士兵各抓起斯皮尔斯的一只胳膊,我用刺刀朝他的心脏捅了两刀,他向前扑倒。我告诉在场的日本人,他们也可以用刺刀刺斯皮尔斯,把他当作军事训练用的靶子,一些日本人照我说的做了。

斯皮尔斯被当作靶子刺完后,被放进我们带来的那口棺材里,我们把他运到火葬场火化了。在处死斯皮尔斯之前,我告诉他,处死他是根据日本的法律,这条法律我给他念了。”

签名……加藤彻太郎

这里应该提及的是,被告曾命令战俘营的高级军官费洛斯少校在他的报告里,用斯皮尔斯“下落不明”或“正在某军事反省院坐禁闭”这样的谎言来掩盖他杀害斯皮尔斯的真相。



译者后记

我翻译这本书多少有点偶然——两年前，此书的作者肯·凯姆本博士的女儿，传播学硕士玛俐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这位研究三十年代上海电影的加拿大姑娘，居然对中国古典文学发生了兴趣，选修了我那枯燥乏味的课。

在研讨孔、孟、老、庄、三李、二杜的空闲，她不无骄傲地提到她的父亲，提到她父亲写的这本书。我与人合译的一本书恰巧在那时出版，于是她问我能否翻译她父亲的书。因为我很吃过翻译的苦头，也深知出版的艰难，所以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

过了一段时间，我答应先看看难易再说，没想到，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作者从战士到战俘到医学博士的传奇般的遭遇，日本军队在香港烧杀淫掠的兽行，盟军战俘在集中营所受到的非人待遇以及作者对人生与人性、战争与和平、政治与社会制度的独特思考吸引了我。或许是由于被其内容所感动，或许是因为我的个人遭遇与作者在某一点上发生了共鸣，九二年夏，我告诉玛俐，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打算翻译这本书。

为此，我翻阅了一些有关香港二战时的书籍和史料，如，李树芬先生的《香港外科医生》，谢永光先生的《战时日军在香港暴行》和《广东文史资料》等。

然而，这一允诺直到1993年4月17日我肝炎住进第二传染病医院才真正付诸实施。

住院是很无聊的，无聊之外还有对死亡的恐惧——医生告诉

我，我的肝正在走向硬化。看到那些因硬化而腹水，而吐血的病友渴望活下去的眼神，听到走廊里不时传来的哭喊和太平间里传出的阵阵哀乐，我觉得死神也离我不远了。

为了排遣生的无聊和死的忧虑，为了兑现诺言，也为了养家糊口，我从住院的第二天起就开始翻译这本书。我想，以我之渺小，本来是干不了什么大事的，何况衰病若此；但是在离开这个让人难以形容的世界之前，我或许能为译完这本书而少一分遗憾和愧疚。

我每天译三面，精神好时五页，到七月中竟译完了。十几天后，我出了院。我庆幸肝炎病毒并没有因此而猖獗起来，庆幸自己还没有过早地撒手尘寰，物化归西。是盟军战俘的悲惨命运和顽强意志使我摆脱了自悲自怜的情绪，从而提高了抵抗力，还是肝炎病毒自愧不如日本军队的暴虐凶残，只得退避三舍，我不得而知。但是我敢肯定，战俘营中的“嬉皮士”，詹姆斯·莫蒂默以幽默和微笑面对死亡的精神气概是足以使懦夫勇，恶人惧，鬼神为之动容的。

出院后，肯·凯姆本博士先后两次来信解答我在翻译中遇到的难点，玛俐给我寄来了港岛和九龙的街道图以及日本友人——此书的日译者毛利先生为书中的部分日本人名提供的中文译法，今年五月，凯姆本夫妇来到北京，委托民族出版社此书的中文版。他们的到来，也为我解决了译文中的最后几个难点。最值得感谢的是，北京外交学院的钱安期教授不厌其烦地为我在英文方面遇到的问题排忧解难。我的妻子，北京图书馆馆员，叶冰冰女士则为此书的输入、编辑和打印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民族出版社的领导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安平平女士、王维强先生为此书付出的辛勤劳动，亦使我深为感念。在这些人的帮助下，这本书才得以在今年一月定稿。当然，译文中的任何错误，都应由我负责。

有一个问题需要向读者交代，经过四十多年的变迁，香港某些地名有所改变，比如，PRICEEDWARD ROAD 现译为“太子道”，而以前则译为“英皇子道”，又如，KADOORIE AVE 现译为

“嘉道理道”，过去则译为“嘉多利道”。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性，我在翻译时尽量使用四十年代初的地名。但因对香港地名的沿革未做深入考证，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望有识之士不吝指教。

* * * * *

1995 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胜利 50 周年，1997 年中国政府将收回香港的主权，在这两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即将来临之际，翻译、出版这本书是不无意义的。

日本人在广岛喊出了“宽恕不等于忘记”的口号，本书的作者希望后人“生活在一个更健全、更合理的世界”。饱受日本军国主义者蹂躏的中国民众，显然更有权利告诉世人：“宽恕绝不等于忘记”，也更有责任去争取一个更健全、更合理的社会。

译者

1994 年 1 月 24 日

于北京西郊金沟河寓所